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



摇动龙尾巴：正在兴起的参与式扶贫实践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PLA)——以前叫做《PLA 笔记》和《RRA 笔记》——每年发行两次。始建于 1987 年,《参与式学习与行动》使世界各地的参与式方法的从业者能够互相交流田野经验、概念性反思和方法创新。这些期刊是非正式的,但致力于发表真实的记述、当下实际的价值观,并且鼓励创新,是“来自田野的声音”。

我们十分感谢英国国际发展部、瑞典国际发展署、爱尔兰援助、丹麦外交部、挪威发展合作局和荷兰外交部对《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的慷慨资助。同时,感谢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中国分部对这期特刊的额外支持。本刊中的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第 62 期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2011 年

序号: 14605IIED

封面照片: Johanna Pennarz

封面设计: Simon Lim, Su Luo, Nicole Kenton

艺术设计: Su Luo

设计排版: Smith+Bell

印刷: Park Communications Ltd, London

客座编辑: Johanna Pennarz, 宋浩昆, 邓维杰, 王建萍

编辑: Holly Ashley, Nicole Kenton, Angela Milligan

编委会: Nazneen Kanji, Jethro Pettit, Michel Pimbert, Krystyna Swiderska, David Satterthwaite

特别感谢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 James Keeley 和 Lila Buckley, 以及 Arjan de Haan 的专业指导。

国际编委会:

Oga Steve Abah, Jo Abbot, Jordi Surkin Beneria, L. David Brown, Andy Catley, Robert Chambers, Louise Chawla, Andrea Cornwall, Bhola Dahal, Qasim Deiri, John Devavaram, Charlotte Flower, FORCE Nepal, Ian Goldman, Bara Guèye, Irene Guijt, Marcia Hills, Enamul Huda, Vicky Johnson, Caren Levy, Sarah Levy, Zhang Linyang, Cath Long, PJ Lolichen, Ilya M. Moeliono, Humera Malik, Marjorie Jane Mbilinyi, Ali Mokhtar, Seyed Babak Moosavi, Neela Mukherjee, Trilok Neupane, Esse Nilsson, Zakariya Odeh, Peter Park, Bardolf Paul, Bimal Kumar Phnuyal, Giacomo Rambaldi, Peter Reason, Joel Rocamora, Jayatissa Samaranayake, Madhu Sarin, Daniel Selener, Anil C Shah, Meera Kaul Shah, Jasber Singh, Marja Liisa Swantz, Cecilia Tacoli, Peter Taylor, Tom Wakeford, Eliud Wakwabubi, 和 Alice Welbourn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为贫困人群和边缘人群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支持民主的、全民参与的决策过程和治理。我们力求在《参与式学习与行动》中践行这些理念。

IIED 联系地址: 80-86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1X 8NH, UK。网址: www.iied.org

本刊不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欢迎联系《参与式学习与行动》,详细信息和指南见封底。

以前和现有刊物,可从网站 www.iied.org 免费下载。

订阅

南部发展中国家免费订阅，更多信息，敬请联系：Research Information Ltd., Grenville Court, Britwell Road, Burnham, SL1 8DF, UK。

电子邮箱：info@researchinformation.co.uk

网址：www.researchinformation.co.uk

过刊购买

敬请联系：Earthprint Ltd., PO Box 119, Stevenage, SG1 4TP, UK。

电子邮箱：orders@earthprint.co.uk

网址：www.earthprint.co.uk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是一个关于方法和方法论的宽泛性概念，包括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农村快速评估（RRA）、参与式学习方法（PALM）、参与式行动研究（PAR）、耕作制度研究（FSR）以及计划参与式研究的方法（MARP）。共同的主题是，人们要充分参与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机会的过程，以及实现这些需求的行动。

近几年来，参与式的范围和侧重点发生了多次变化：重点关注亚国家、国家和国际决策，而不仅仅是地方决策；从项目到政策过程到制度化；对差异和权力问题进行深入认知；强调评估的质量和对参与的影响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推广参与式。《参与式学习和行动》反映出这些发展，认识到分析和克服权力差异的重要性，正是这种权力将贫困人群和边缘化人群排除在外。

编者的话

欢迎阅读《参与式学习和行动》第62期，本期重点回顾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参与式扶贫行动。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出版一期关于中国的《参与式学习和行动》的特刊，这个国家正在改变其传统的政府导向型发展模式。从中国本土作者以及在当地工作的人们所写的文章中，我们将看到，参与式方法和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改变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中心。正是人民在“用一种积极和强有力的方式撼动龙尾巴”。在西方，中国经常被称为“龙的国度”，而在中国，龙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本期关注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改变的前提下如何消除贫困。大众参与通过改善人民生计成为扶贫的关键、同时也保护了环境、保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多样性、并确保良好的国家治理。

良好的治理不仅表现为政府机构的作为，更体现在政府机构与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团体和市民之间的关系性质，以及关系好坏程度(Bass et al., 2005)。换句话说，也就是权力转移，这也是本期的关键主题。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普通市民开始参与决策。当国有企业难以为继，无法在国际竞争

中立足时，国企私有化正式开始，中国也从此向世界开放。90年代初期，在一些国际基金的支持下，参与式方法被介绍到中国。政府也逐渐给公民社会组织更多的独立性。这就为提高公民在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的参与程度提供了更多机会，正如 Johanna Pennarz 和 Arjan de Haan 在本期概述中所写的那样。与这些机会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层面政治决策程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主要是由村委会选举、政府部门增强服务意识，以及更加重视咨询过程等一系列举动带来的。概述之后是 Andreas Wilkes 写的序言，他对参与式方法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和好处做了深入反思。

关于特刊

第 62 期《参与式学习和行动》的主要内容是从世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中国分部所资助的一系列项目中选出的案例研究。¹其中包括 2005 年开始在中国西南部实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世行 Alan Piazza 在为特刊写的序言中提到，世行对贫困问题逐步深入的认识以及与政府扶贫机构的密切合作，使他们更好地锁定目标项目，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贫困人群的参与是有效扶贫的关键。

PRCDP（参与式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旨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采用公平、开放的方式减少贫困（见 16 页地图）。生活在这些偏远山区的人们是中国最贫困人群之一。对这些项目的参与，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也使他们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本期的许多作者都来自这些贫困社区，他们以前从未有过机会与这么多的人们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观点。他们都是参与者，其中很多是在社区层面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特刊中的照片突出了社区成员的多样性——这些照片和西方人眼里的“现代中国”差的可是太远了。中国有官方承认的 56 个民族，占人口比例 92% 的汉族构成了文化主体。

其它的少数民族则坚持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²本期的作者有两名少数民族代表：娜体（第一部分，第 4 篇文章）是拉祜族——一个在中国人口非常少的民族，虽然在亚洲其它地区有大量人口存在（特别是泰国）。覃祖荣（第二部分，第 15 篇文章）是毛南族——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¹ 参见 34 页框盒 1 项目概要

² <http://no2.mofcom.gov.cn/aarticle/aboutchina/nationality/200903/20090306117655.html>



正等着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开始的广西瑶族妇女—自从越来越多的男村民到沿海地区打工，妇女更多地承担了农业生产劳动
摄影：广西外资项目扶贫中心

本期中的许多文章都来自 PRCDP 的案例和反思。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最初是为 2009 年在昆明举行的研讨会准备的，在会上他们进行了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分享。为了这期特刊，这些案例进行了重加工，以便在程序和经验教训方面提供进一步的中肯的反思。这些文章将会被译回中文，并在线出版，希望能够为中国读者提供宝贵资源。

本期文章格式不是很统一。在每篇文章的开头，我们大概介绍了作者。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留中国作者的联系方式，因为他们基本不说英语。如果您对这些作者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联系宋浩昆一本期的客座编辑之一，他和很多作者保持着密切联系。³

本期分为若干部分，包括介绍性概述和结论性概述。第一至第三部分介绍了在 PRCDP 中如何通过项目推动人员的作用和改变的管理职能来加强地方层面的参与。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了甘肃的一个参与式项目，该项目评估了一个大规模流域复兴项目对生计的影响。第五部分突出了参与式方法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应用，第六部分则关注参与式方法在中国加速推广的过程和行动。在“培训者秘方”部分，我们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来自 Maruja Salas——一个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过的经验丰富的项目推动者。第二篇文章是 PRCDP 项目参与者对工作经验的回顾。第三部分由中国西南地区参与式培训机构的部分工作人员完成，他们提供了培训活动和培训资源的相关信息。

常规的“联系我们”部分包括一些来自中国的关于参与式的资源细节和其他来自 RCPLA 网络的最新信息和资源。在 209 页有 IIED 关于更新《参与式学习和行动》作者分析的新闻。

关于特约编辑

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四位经验丰富又有专长的特约编辑： Johanna Pennarz、宋浩昆、 邓

³ Email: songhk@ynu.edu.cn

维杰和王建萍。 Arjan de Haan 在构思阶段进行了广泛参与，也对这期特刊贡献了很多宝贵意见。

Johanna Pennarz 是最主要的特约编辑。从 1991 年起，她就以贫困与地方治理研究人员以及顾问身份在中国工作。从 2001 到 2004 年，Johanna 在四川农村对生计策略开展了长期的研究。从 1997 到 2004 年，她在中国做项目管理和扶贫建议工作。2002 年，Johanna 开始成为 PRCDP 的参与式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Johanna 与许多致力于扶贫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的基于田野工作的参与式发展的文章。从 2004 年起，Johanna 开始在英国为 ITAD.⁴工作，职位是社会发展顾问。我们非常感谢 Johanna 倡议了这一期的《参与式学习和行动》，并提供了大量的专业建议，还帮助我们联系作者、其他客座编辑，以及协助我们完成编辑工作。

宋浩昆是云南大学副教授和云南参与式协会（前参与式网络）执行理事。他主要的专业方向是农村发展和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2004 年，他以项目协调员的身份参与了 PRCDP 的工作，并编辑了《参与式手册》，⁵他还以本地专家的身份被邀请参与项目影响的评估。我们特别感谢宋浩昆在协调本期作者方面所做的大量努力。

邓维杰是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他在中国参与式发展领域中已经工作了 10 多年。作为培训者和项目推动者，他参与了包括 PRCDP、CWMP.⁶在内的很多国内、国际项目。在本期特刊的编辑过程中，邓维杰对中国本土作者提供了大量帮助。



第 62 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特约编辑邓维杰在作反馈汇报

王建萍博士是云南大学副教授、云南参与式协会（前参与式协会）会员。除了大学的教学工作，她在与地方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

⁴ www.itad.com

⁵ 参见: www.itad.com/PRCDP 6

⁶ CWMP 是中国流域管理项目的缩写（见第六篇）。

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和扶贫、尤其擅长于用跨学科方法评估政策干预和发展项目的影响。在本期特刊的编辑过程中，她也做了大量的联系中国作者的工作。

Arjan de Haan 在中国的最后三年，也就是 1998-2008 年，是 DfID 的社会发展顾问。后来他去了海牙社会研究院做高级讲师，又在 2011 年转到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主要的研究兴趣包括移民、贫困分析和社会政策，在这几个领域内，Arjan 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中国的文章。⁷他为本刊特刊提供了大量宝贵建议和意见。

致谢

谨代表所有此项工作的参与者，我们衷心感谢 DfID 和世界银行对 PRCDP 和昆明研讨会的资助，他们为本期特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DfID 中国办的资金支持使特约编辑和作者们一起完成了这期特刊的出版发行。DfID 对中国的双边援助项目在 2011 年 3 月结束，所以这期特刊也意味着 DfID 对该区域的支持告一段落。DfID 在中国的工作为中英两国一起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 DfID 将主要关注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对英国、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还感谢 DfID、瑞典国际发展署、爱尔兰援助、丹麦外交部、挪威发展合作局和荷兰外交部对《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期刊的慷慨资助。

我们也要感谢版面设计机构“Smith+Bell Design”非常专业的排版，Cath d’Alton 为本期绘制的地图，Simon Lim，苏洛的封面设计，以及马志彦的全文校对。

特别感谢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 Lila Buckley 和 James Keeley 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Lila 还在第六部分贡献了一篇关于如何制定参与式政策的文章。

最后感谢《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编辑团队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建议。

来自《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编辑团队的消息

当我们正为本刊的发行做最后准备时，我们听到了一个让人非常伤心的消息，Neela Mukherjee 博士于 2011 年 6 月去世了。Neela 是我们团队中宝贵的一员，也是 PRA 的开路先锋之一，还是 PLA 和 IIED 最亲爱的朋友。我记得在 90 年代初，她在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修了一次假，以后她定期回来看我们，总是带来很多有趣的故事。。Neela 也为本期特刊做了大量工作，她与 PRCDP 的协调员和省级管理人员密切合作，启发了许多有意义的行动，在本刊里有所体现。。是她建议将中国的经验与更多的参与式工作者们分享，我们很难过她不能看到出版后的特刊。我们将牢记她在激励和推动中国及其它地方参与式工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多媒体双语 DVD – 第 61 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大粪的传说：社区主导的非洲全民卫生行动》

⁷最新发表的著作是 *Towards a New Poverty Agenda in Asia: Social Polic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2010), *Narrative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How Does China Cross the River?* (edited volume with Zhang Xiaobo and Fan Shenggen) and *How the Aid Industry Work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我们很高兴附上一张第 61 期的多媒体双语 DVD（英语/法语），那期的主题是社区主导的非洲全民卫生行动。DVD 里有几个关于社区主导的非洲全民卫生行动的纪录片，以及其他材料。我们衷心感谢 IIED、国际计划、联合国儿基会、爱尔兰援助和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我们的主要捐款人共同资助了这张 DVD，也要感谢我们的翻译 Maryck Nicolas，他总是出色地将所有资料都翻译成法语。

在线订阅的变化

从 2011 年开始，电子版《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期刊将完全免费，因此不再需要在线订阅。IngentaConnect 不再负责电子版《参与式学习与行动》，而是一经出版就直接可以从 IIED 网站免费下载。也就是说，订阅者们不再需要在线订阅，可以通过网址: www.planotes.org 直接下载。

新网站

我们目前的网站正在改版中，新网站将在 2011 年末开始使用。对于访问目前的网站而无法看到最新内容的读者，我们表示歉意。未来我们计划出版一些大众文章和多媒体资源，我们的网址将依然是原来的 www.planotes.org

下期预告

第63期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涟漪有多宽？从地方参与到国际性的有组织学习》

下一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由 Kate Newman 和 Hannah Beardon 两位特约编辑负责。

当一颗鹅卵石被投到水里以后，其影响是明显的：水花四溅，然后涟漪扩散出去，然后逐渐变弱，直至完全失去动力。同样，一个好的基层参与过程也能产生强烈的地方影响：比如，更有代表性地优化地方开支，更平等的家庭权力关系；重点更突出的集体行动等——但距离最初产生的环境越远，其影响和冲击也会自然地逐渐消散。然而参与式过程中发生并记录下来的心得、分析结果、证据与故事，正是制定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所依据的信息。

在这一期的《参与式学习与行动》中，特约编辑、作者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将地方知识和信息带到国际层面上的经验和思考，以及加强这些行动的策略。他们强调了作为有参与能力的个体，有意识并积极参与改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通过这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激发更多的为国际非政府机构工作的有能力的活动家们带来更透明、更公平和更多人参与的发展。

第 64 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非洲青年和参与式治理》

2011 年 3 月，IIED 和英国计划与发展研究所将整个非洲参与了“非洲青年和参与式治理”项目的中、青年人组织到了肯尼亚的内罗毕，在那里他们参加了“写作研讨班”，这为期一周的研讨班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学习、分享经验、提高写作技巧、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并为 2011 年 12 月那一期的《参与式学习与行动》准备文章。这期的特约编辑是 Rosemary McGee 和 Jessica Greenhalf。

全世界都在进行“参与式治理”的试验，这些新方法很振奋人心，但它们适合所有人群？——还是有的声音被忽略了？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它们适用吗？

内罗毕的写作研讨班揭示了年轻人可以为决策过程带来活力、精力、坚持、激情和热心。参与治理和政策决定过程可以有力地重塑年轻人的认知能力和应用公民权利的能力。这一研讨会显示了年轻人可以用创新的、无法预料的方式来进行变革——对治理工作来说，这是一项特别的前景光明的特性。

我们希望未来一期的《参与式学习与治理》能突出年轻的非洲人是如何克服年轻人和治理之间的鸿沟的，同时也能让别的参与式发展工作者们——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上岁数的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东西。

第 65 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生物多样性、文化和权利》

我们的新战略成员 Krystyna Swiderska, 正在为 2012 年出版的《参与式学习与治理》特刊收集文章。这一期将用英语、西班牙语出版发行，并将在印度举行的“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的国际会议上发放。这一期的目的是分享如何在参与式过程中制定社区生物文化协定，以及确保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权(FPIC)。

其他新闻

IIED 将于 2011 年 9 月从 Endsleigh 街的办公室搬出，他们已经在那里办公 27 年了。新地址是 Gray's Inn 路 80-86 号，这是一座上世纪 50 年代修的房子，目前正在提升绿色等级。多余的空间会建一个小咖啡厅，人们可以在里面开会、办公等。新办公室欢迎您！

Nicole Kenton,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联合编辑

参考文献:

Bass, S., H. Reid, D. Satterthwaite and P. Steele (Eds.) (2005) *Reducing Poverty and Sustaining the Environment: The Politics of Local Engagement*. Earthscan: UK.

缩写词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亚洲发展银行
ARA	Action-reflection-action 行动—反思——行动
CBD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社区为主体的发展
CBO	Community Based Organisation 社区组织
CDD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社区主导的发展
CGCO	Chengdu Gay Care Organisation 成都同性恋关爱组织
CWMP	China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ject 中国流域管理项目
DFI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发展部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环境影响评估
EP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环境保护法
FCPMC	Foreign Capital Project Management Centre 外资项目管理中心
ID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K) 英国发展研究院
II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
INGO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国际非政府组织
MEP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管理
MWR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水利部
NRM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自然资源管理
PM&E	Participator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参与式监测与评估
PAD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fice 扶贫与发展办公室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PP	Participatory Planning 参与式规划
PPA	Participatory Poverty Analysis 参与式贫困分析
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参与式农村评估
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PMO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项目办
PPMO	Provincial Project Managment Office 省项目办
PRCDP	Poor Rural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Project 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RMB	Renminbi (or Chinese yuan) is the currency of the PRC 人民币
SLCP	Sloping Land Conservation Programme 退耕还林项目
VDC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村委会
VDP	Village Development Planning 村发展规划

前言

ALAN PIAZZA

PRCDP 是世界银行在中国资助的一系列农村多部门扶贫项目之一。这个过程开始于 1992 年世行对贫困的细致分析，那份联合研究报告叫做《中国：90 年代的扶贫战略》¹。该报告指出在中国最贫困地区，多部门合作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具体内容包括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基本健康护理、农业生产，以及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等。这些建议在最初的两个扶贫项目中付诸实现。这两个项目是：

- 西南扶贫项目（开始于 1995 年）
- 秦巴山区扶贫项目（开始于 1997 年²）

参与的重要性在这两个项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实际上，西南扶贫项目是世行总裁 Wolfensohn 的“参与式旗舰”项目之一。然而，由于延续了项目准备期间和早期实施阶段对参与的大力重视，该项目后来将重点放在了对参与式概念的推广和传播上，这在当时是一种首创。

2001 年，世行在中国关于贫困的第二项重要研究报告——《中国：战胜农村贫困》³提倡通过“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更广泛的社区参与”来实现中国扶贫资金的更有效使用。中国政府在那段时期的扶贫战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也提倡加强在扶贫工作中使用参与式方法。⁴ 政府文件中提到“贫困人群是扶贫开发行动的主体和主要收益人群”，并提出具体步骤来支持村级层面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一种简化的参与式方法被应用到了村级扶贫规划中。在全国范围内，140,000 多个重点贫困村制定了参与式的村级规划。中国政府对参与式扶贫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使大量国际组织在世纪之交来到中国，帮助评估和深化参与式的应用。

借助于这种良好的政策环境，PRCDP 在设计和发展参与式方法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使参与式在中国整个农村地区许多项目中得以使用。从 2001 年 10 月明确项目使命开始，参与式方法在六个项目组成部分的设计和实施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其目的是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赋与地方社区更多权力，同时在项目整个周期内加大对所有弱势群体的纳入。参与式方法成为一种赋权工具，其重点在于使社区内部不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选择。它建立了社区自力更生发展的自主权和能力。在项目准备阶段，项目组编制了《参与式手册》，用于指导管理人员和县级、乡级协调员如何去实施和监督参与式方法。《参与式手册》介绍了参与式方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化了参与式项目周期的主要步骤；详述了使用参与式方法的制度和管理问题；讨论了参与式方法的投入和产出；还提供了一些参与式方法和工具的参考

¹ <http://go.worldbank.org/70Z1WCW200>

² 更多信息参见: www.worldbank.org

³ <http://go.worldbank.org/MN1DQS5690>

⁴ www.gov.cn/english/official/2005-07/27/content_17712.htm

资料。⁵

在过去十年里，广西、四川、云南的省项目办在项目准备、实施、评估等不同阶段对于测试和发展参与式方法起了关键性作用。省项目办为参与式方法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而且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对参与式方法的支持和热情与日俱增！县项目办，以及基层的乡、村项目工作站也在发展和推广地方层面的参与式方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140万的项目村民们才是地方参与的主体，他们对 PRCDP 和参与式方法的热情也是与日俱增。此外，中央政府在项目准备、实施和评估阶段都提供了大量支持。

没有 DfID 的慷慨支持，在 PRCDP 中采用参与式方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 DfID 的大规模资金支持，就不会有 PRCDP 这个项目。更不用说 DfID 还提供了巨额资金来帮助设计、监测对 PRCDP 中参与式方法的评估，以及对整个项目的系统的、定性的项目参与式评估。过去十年里，ITAD 的主要工作人员和世行工作人员，共同完成了每一个 PRCDP 的准备和监管使命，这是 PRCDP 中使用参与式方法之所以成功的关键。⁶ITAD 的年度参与式项目定性评估，也起了重要作用，它们完备地总结记录了项目的优势和缺点，并为中国的参与式定性评估制定了标准。对 PRCDP 的参与式影响评估的终期报告正在准备中，很快将与读者见面。

显然，PRCDP 的参与式方法是一个巨大的集体努力的成果。在项目村民、省项目办和各级项目管理部门、DfID、ITAD 以及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PRCDP 参与式方法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我看来，PRCDP 是中国参与式方法的先锋，在推动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的社区赋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系方式:

Alan Piazza

世界银行社会发展部高级经济师

地址: MC9-355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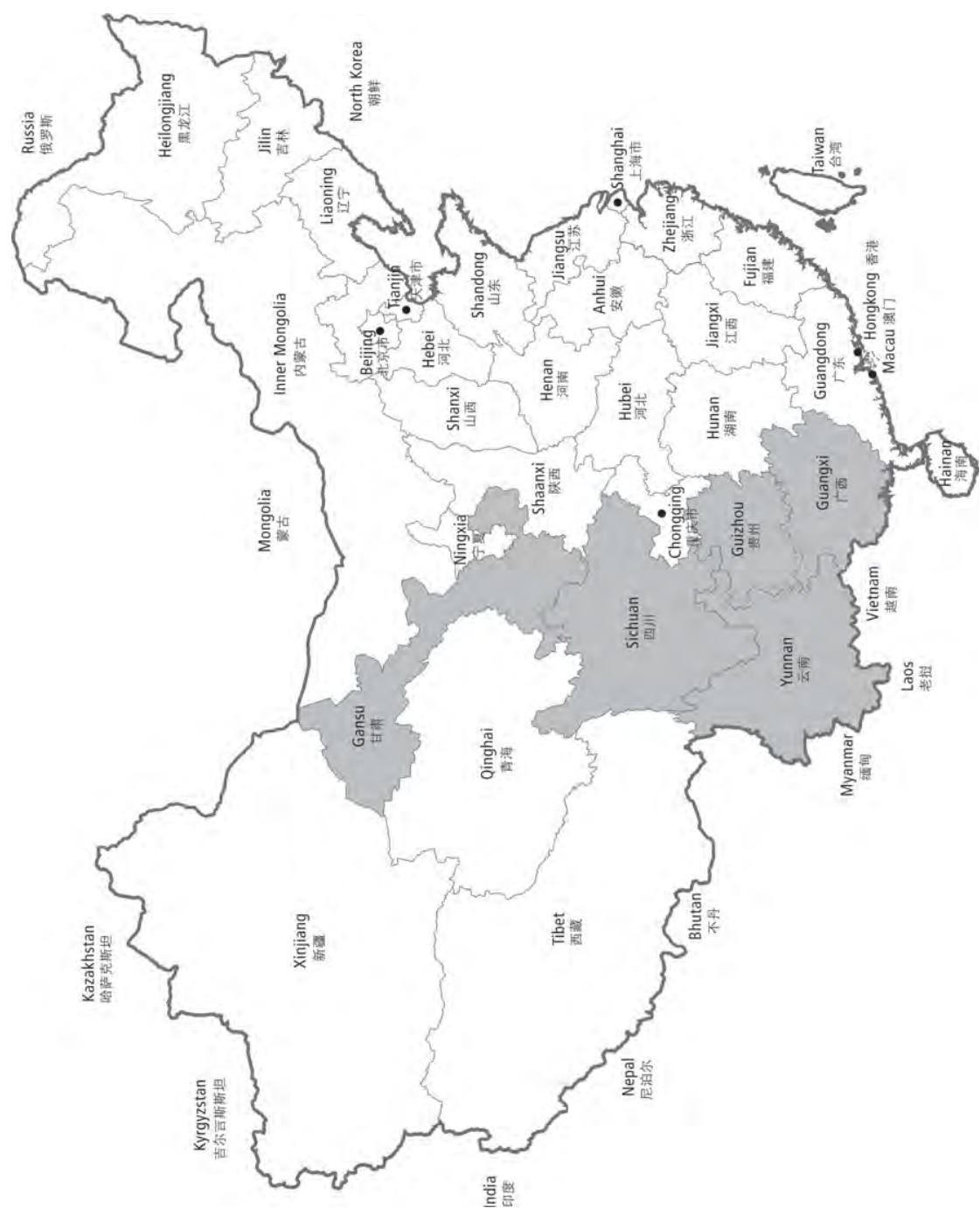
电子邮件: apiazza@worldbank.org

参考文献:

UNDP and World Bank (2000) *China: Overcoming Rural Poverty*. Rural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Unit,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Joint Report of the Leading Group for Poverty Reduction, UNDP and the World Bank.

⁵ www.itad.com/PRCDP

⁶本期首席客座研究员 Johanna Pennarz, 是 ITAD (www.itad.com)的一个顾问。



地图中的阴影部分是本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所涉及到的省份

第一章 综述：改变中的中国政府与地方社区关系

作者：JOHANNA PENNARZ、ARJAN DE HAAN

简介

2009年3月，在昆明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的工作人员们第一次坐到了一起，分享了他们在教育、健康、农村发展和扶贫领域中推广、应用参与式方法的经验和心得。这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因为好多参与者都是生平第一次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案例，同时也从别人那里学习。这表明在全国各地的基层，有大量参与式方法的拥戴者。这次研讨会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它让许多过去以为自己是孤军奋战的个人和组织认识到，他们不是这种创新式方法的单枪匹马的开路先锋，而是一个志趣相投的大团体，他们在同一系统中面对同样的挑战，解决同样的问题。此次研讨会是在参与式被引进中国15年之后，以及被正式纳入政府扶贫策略（见图一中的时间线）9年之后举行的。本期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此次研讨会上分享的案例研究，不过进行了深加工。

参与与扶贫，有何联系？

这一期的《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特刊特别回顾了参与式方法在中国扶贫中的应用历程。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依然还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本刊讨论了为什么以及如何引进参与式方法，以及为什么这个方法在解决中国贫困问题上非常有效。本刊展示的许多案例表明，发展和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条件以及正在变革的治理环境下不断演变着，这与中国不断试验并试用新方法的独特能力是一致的，尤其是借鉴实用的国际经验。对于想了解中国发展的特殊办法，及其对于国际扶贫的意义来说的国际人士来说，这次讨论是高度相关的，并极其重要。同时，对于了解参与式方法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在具体的环境中得以应用，也是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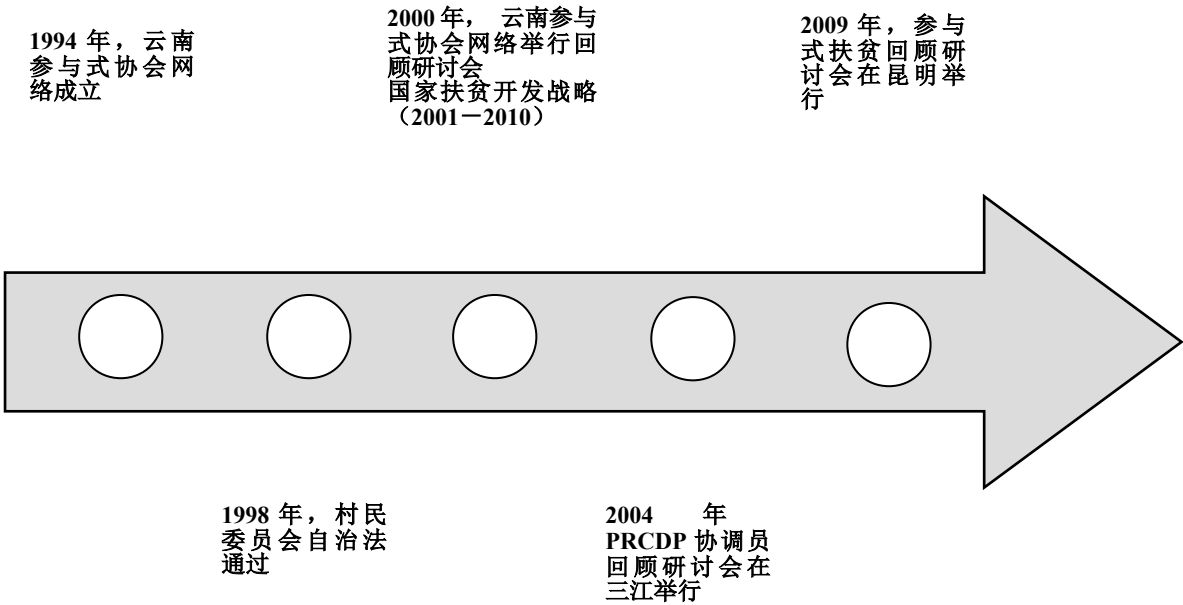
大家普遍认为贫困人群需要并有权力参与扶贫活动，以社区为基础项目的正面影响也得到了充分的整理和记录。Robert Chambers 在2005年注意到，参与终于被主流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大规模扶贫项目中，因为广泛参与所带来的实际受益人群增多，以及扶贫更有效的证据还是有限的。在对世行资助的以社区参与为主导的项目回顾中发现，社区主导式扶贫方法对于帮助贫困人群并不是特别有效。还发现某些社区主导和社区驱动项目有效地改善了社区基础设施，但具体哪些成果是由于参与式因素带来的还不确定，包括参与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Mansuri、Rao, 2004)¹，参与所带来的有形成果被记录下来的很少，比如社会资本的增加。而负面成效，例如精英主导以及逐渐增加的不平等却越来越明显。

¹ <http://ssrn.com/abstract=501663>

比较而言，中国的案例似乎说明了有效扶贫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来实现的。中国政府对于参与式方法长期持怀疑态度，不过最近以来，他们对参与式方法的理解有所增加认识到参与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而且贫困人群的参与可以带来更有效和更可持续的扶贫。。因此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对参与式方法实践和应用的兴趣不断增加。

在扶贫工作中引入参与式实践大约有 20 年时间了，下表显示了本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所涉及到的这一历程中的主要事件。

图 1—时间表



因为逐渐增加的不平等、社会动乱以及对治理改善的需求成为了政府的主要关注点。**2005 年**，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和谐社会”——一个致力于增加社会平等、公信力以及公共参与的概念。紧随这个号召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项由政府发起的大规模活动，目的是解决不平等问题，以及加大农村发展力度，其基础是广泛的社会参与，这样在中国的现代化进城中，农业和农村发展就被提上了重要日程。本刊中的案例为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变化提供了重要机会，因为政府高层在致力于减少不平等和创建“和谐社会”中的投入原来原多。

本刊的重要贡献者是参与式的实践人员，其中不少是政府工作人员，在如何相信参与是有效的，并能够带来更好的扶贫效果方面，他们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和事实依据。举例说，第四部分中，中国流域管理项目的案例说明了“社会管理”的强化是参与式项目的成果之一，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与最近的政策议程保持一致的。

本刊有几个案例比较了社区主导方法与传统政府主导方法所带来的不同结果。根据这些事实依据，我们得出结论如下：中国更加平等的关系正在创建中——很慢——还有反复，但却是稳步朝前的。

● 中国的参与式方法：从 PRA 到更广泛的咨询

PRA 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引入到中国的²。从那以后，研究人员与发展从业者在很多领域和主题上实践了参与式方法，其中大多数是由捐助人和非政府组织援助的项目（详见本期 24 页的前言）。直到最近，旨在加强扶贫中的参与式方法的倡议活动的规模和质量问题才被直接提上日程。多个捐助项目，比如世行、DfID 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捐助的项目，过去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地方政府层面将参与制度化。

PRCDP 开创了一种能力建设、建立当地创新和参与式学习体系的新方法。在参与式推广过程中，这是平衡深度和广度的一个主要挑战。因此，项目目前格外关注参与的基本原理，以及为了适应当地情况而采用的方法和工具。³这使得中国西南的三个项目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参与式实践方法（云南省，四川省和广西区）。例如，广西区项目办提供的案例显示了当地政府是如何采取“学习系统”来确保持续的学习进程，以及持续的改进实践（详见第六篇 28 章）⁴。在四川省的案例中，参与式村级规划的方法被很快的应用到了 5.12 地震灾后重建的工作中。（详见第六篇 29 章）。



侗族舞会是社区成员聚会交流以及展示社区团结的机会，同时用于分享相关信息以及发布相关通知等（广西区龙胜县）

摄影：广西外资项目管理中心

● 示范项目的角色

² Robert Chambers 和 James Mascarenas 的来访，促进了云南参与式网络在 1994 年的成立。详见 PRCDP 参与式手册（www.itad.com/PRCDP），以及第 33 篇文章：学习体系。

³ 参见 PRCDP 参与式手册（在线版网址：www.itad.com/PRCDP）。

⁴ 详见第 33 章学习系统。

与国家大量投资的扶贫项目比较，外国援助中国的项目就显得非常小。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多数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就被限制在小试点项目中。然而，国际合作已经在很多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环境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改革、教育和扶贫，以及项目管理本身等（世界银行，2007）。国际资助的项目尽管在规模上比较小，但在示范创新方法、能力建设、提供有用的案例，以及为政策过程提供参考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参与式方法最初就是由外援助项目引入的，对这个问题目前有所贡献的从业者，很多都是从这些外部援助项目中获得最初的经验。

从小规模试点项目（通常是资金充裕的）转变到大规模的政府主导项目，其有限的能力建设资金与雄心勃勃的目标成为一个关键的挑战。从2000年起，扶贫办开始尝试把参与式乡村发展规划作为扶贫战略的一部分进行推广，然而却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推广的规模过大、对参与式方法不熟悉，以及基层能力的薄弱（见第二篇）。作为结果，参与式规划推广活动只能暂缓，只有一半的村庄准备了自己的参与式规划（Park and Wang, 2006）。

在本期特刊中，好几个从业者都描述了他们将在小规模试点项目中成功的方法应用到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项目中是多么的艰难。邓维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参与式培训方法不得不去适应政府培训项目的条件（详见第四篇）。

● 改变角色、态度、行为和思维

有效扶贫依赖多种因素，其中很多是项目的外在因素，还有很多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的常常很难把握和控制。参与式方法常常意味着态度、行为和彼此关系的改变。这些变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发生，但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出现并应用到相关政策中。因此，了解这些态度、行为和关系的变化是如何导致（或者没导致）更有效和更持续的扶贫是非常重要的。由当地参与式从业者撰写的案例证明了这种方法、思想、政府官员和市民对公共政策的态度是如何在中国发生改变的。

由于地处边远，过去中国许多贫困社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很少，即使有些互动也是单方面的并且缺乏对社区的赋权。本期特刊第一篇中的文章描述了社区如何承担起项目的管理责任，以及如何从中获得自信，并相信社区有能力来承担责任的。娜体的案例（第4章）从社区视角提供了一个少有的案例，这是由拉祜族的一员写成的，而这个民族在中国是最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之一。

传统上，政府官员对贫困群体是否有能力为自己的社区发展做出贡献（投工投劳例外）是持怀疑态度的。几篇由当地政府人员撰写的案例描述了对贫困传统看法的变化（详见第一篇的介绍，以及第四篇第19章王保军的文章）。由邓维杰负责协调的培训过程（第六篇第29章）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在政府系统内，是存在着职业偏见的，也描述了这些偏见是如何经历挑战的。这些经验表明了政府官员介入的学习过程是多么庞大，他们也认识到如果社区对项目进行掌控的话，项目将会产生更好的效益。无论是PRCDP还是CWMP的案例，都描述了政府官员态度和意识因为参与式方法而发生的转变的。

中国各级的扶贫开发办（扶贫办）都较早地应用了参与式方法⁵。例如，参与式村级规划提

⁵中国在各政府层面都建立了扶贫与开发办公室，负责协调“十年扶贫规划”中的所有的扶贫项目，然而，项目资金来自不同部门和技术单位。

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促进了跨部门的合作。这也是将参与式方法引入到不同部门中的一个巨大挑战，通常这些部门的工作都是以技术标准和目标来衡量的。在教育改革背景下进行的案例研究尤其有趣，因为这些案例展示了人们对教育的作用，以及教育在快速变革的中国对民众的重要性的认识的根本性变化（详见第五篇第 24 章）。中国的医疗部门也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本期中的一些案例展示了参与式方法是如何让这个正在兴起的部门更加以人为本和公平公正（详见第五篇第 23 章）。

● 为什么将经验记录下来并进行分享很重要？

如前所述，本期特刊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为昆明研讨会准备的。这些文章为从业者们如何艰难地在当今中国进行参与式实践并将参与式原则制度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研讨会与会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实践并推广了参与式方法。他们中有当地社区的代表，其中还有少数民族代表，比如娜体，她以前从来没有在全国性会议上过发言，而这次却非常激动的分享了她们的赋权经验。也有一些与会者来自国家部委，他们分享了他们对社区参与的实用性的见解，这是宽泛的政策变化的一部分。还有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员，他们在庞大官僚机构和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孜孜以求的使参与式方法发挥作用。

除了研讨会的材料以外，我们还增加了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目的是为当前中国的参与式方法进行一个全面的概括（见 **Andreas Wilkes**，王建萍，还有 **Lila Buckley** 的文章）。

我们将 **Andreas Wilkes** 的文章放在这期特刊的前言中。那篇文章介绍了 21 世纪最初几年中国对参与的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发生在第一波的参与式方法刚刚引入中国时，在从田野收集到的证据的基础上，从业者们意识到了对参与式的影响进行一次批判性的反思的必要。反思的目的是要向政府领导证明参与式方法是有用的。

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参与式更多的是研究人员的领域。在第 37 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笔记》中，吕星指出，许多研究人员将参与式方法作为实施调查或者评估的常用方法（吕星，2000）。将参与式工具集中应用于研究领域内，意味着哪些参与式从业者们（大多数都有学术背景），和政府官员在扶贫项目中常用的参与式方法是脱钩的。PRA 的一个遗产是，重视方法，提高洞察力，吸收地区文化，但较少关注能力建设，特别是从业者之间问题解决和谈判的技巧。

发展从业者把政府部门内部参与的能力建设看作了主要挑战，远非孤立的项目可以实现。如同吕星在先前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的一样，“参与式发展的采纳和应用挑战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思想，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度安排和工作流程。”

将参与式参展原则整合到政府中——渐进的——这一挑战又花费了十年时间来解决，这期余下来的文章分析了如何才能做到。

为什么会有本期的《参与式学习与行动》

我们相信，本刊的重要性基于如下三个原因：

- 首先，我们很高兴这些文章和以前的研讨会能够使参与式从业者能够分享彼此的经验，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内使用这种创新性方法的先锋。我们亲眼看到人们从其他人身上学习的兴趣有多大，从业者们又是如何快速的从自己的发言中获得自信的。我们相信本期特刊会成为参与式方法的旗舰。

- 第二，我们希望本刊的出版将帮助世界各地的参与式从业者更好的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坚定地认为人们能够从中国以及和中国一起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中国近期开始的国外合作项目。
- 最后，我们也相信，这些参与式实际案例为人们了解中国在发展领域取得成功的原因提供了新视角——中国担负着全球三分之二的千年发展目标，以及依然在继续的挑战。尽管中国的机构设置是独一无二的，但不同治理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急剧地重建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本期的文章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这些戏剧化的变化。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Johanna Pennarz ITAD Ltd 12, English Business Park

English Close Hove, BN3 7ET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址: www.itad.com

Arjan de Ha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 PO Box 8500 Ottawa, ONK1G 3H9
Canada

电子邮件: arjande@yahoo.co.uk

参考资料:

Chambers, R. (2005). 'Ideas for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Lu Xing, L. (2000) 'Searching for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findings of the Yunnan PRA Network' in *PLA notes* 37. IIED:

Mansuri, G. and V. Rao (2004). *Community Based (and Driven)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209.

Park, A. and S. Wang (2006).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valuation of China's Poor Village Investment Program'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Bank's China Poverty Assessment.

Poor Rural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Project Participation Manual (2005), prepared by PRCDP with ITAD for DFID/World Bank.

World Bank (2007).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A Partnership for Innovation*,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第二章 前言：中国西南地区 21 世纪最初几年的参与性反思

ANDREAS WILKES

ANDREAS WILKES 先生自从 1997 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主要是促进参与式方法在乡村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他受过经济学和人类学教育，有环境人类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过中国非政府组织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项目总监，美国高山研究所（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的负责人，以及世界混农林业中心（总部设在肯尼亚的研究机构）中国—东亚协作项目的副国家协调员。他目前的工作集中在草地管理和畜牧管理方面，特别是在改善了草地管理基础上，设计项目来应对气候变化。

从自身经验出发，参与式方法从业者习惯于宣传这种方法的好处，但对参与式方法的不足和局限性注意的不多。在其他方法也被证明可以有效地带来变化的情况下一比如快速地改变中国农村—仅凭参与式方法的经验和劝说是无法说明什么是参与式方法，有什么用途，特别是和其他方法相比，参与式方法的好处是什么的。对这些经验教训—包括好处和局限性的反思—可以更好地收集证据来说服其他人，同时也改变从业者本身对于影响参与式方法的问题的理解，以及如何推广该方法的理解。

在 21 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在参与式方法被介绍到中国西南地区 5—8 年后，一些从业者参与了一个反思过程，目的是为了确定参与式方法究竟能做什么。这篇报告主要是关于那个反思过程的重要发现，以及该过程带来的认识上的变化。

简介

云南参与式农村评估网（简称 PRA）建立于 1994 年，此后大概有 50 名成员参加了由英国发展研究所（IDS）的 Robert Chambers 先生在昆明主持的培训研讨会。多数参会者来自研究机构以及负责云南高原管理项目的政府部门，云南高原管理项目是一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扶贫项目。随后几年，云南大多数参与式方法的应用和推广都与 PRA 成员有关，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和行动项目，就是通过他们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工作，或者他们对政府项目的参与，以及他们对国际捐助项目提供的咨询服务来进行。四川省和贵州省的参与式从业者大多数也来自研究与教育机构，并在 90 年代中期的国际资助项目中获得了实践经验。到二十世纪末期，参与式方法已经广泛应用到多个行业中，一些项目在国际组织支持了几年以后，地方机构就将这种工作方式制度化了。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云南和贵州省的 PRA 以及区域性的培训研讨会为交流经验、方法和

教训提供了机会。在世纪交替之际，从业者都有了各自的经验，三省的从业者都要求“清理一下家底”，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彼此都学了什么，并确定在进一步推广参与式方法中所面临的共同挑战。2000年，云南PRA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支持中国西南三省的参与式从业者（贵州省、四川省和云南省）反思和分享相关的经验和教训（Wilkes, 2000）。大概有七十名参与者出席了省级和地区级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议题广泛，包括学习、培训、推广PRA的经验，PRA的影响，以及实践前沿所出现的新问题等。这些讨论确定的关键问题包括，进一步推进参与式方法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中国农村地区决策的机构环境也来自政府、捐款人以及非政府机构项目所面临的特定环境。确定的共同需求是，说服相关领导为扩大和深化参与式实践创造更大的制度性空间，当务之急是向领导示范并证明参与式方法的影响。PRA从业者们，无论是来自研究机构还是政府部门，还多次指出了参与式方法的成本问题（主要是人力和财力）。有些政府项目已经将PRA在日常工作程序中制度化。但是，开展PRA活动的时间，以及将PRA的产出与现有规划体制所要求的信息整合起来的困难，被从业者视为参与式方法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社区参与所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在项目的关联性和可持续性方面。但是，从业者们仍然认为，高级官员们依然需要对参与式成本和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更好的理解。

为了回应这些确定的需求，2000年，云南PRA利用英国发展研究所（IDS）和香港乐施会的资助，开展了“参与的路径”项目。该项目资助了14位实践者回到参与式方法曾经应用过的项目点，去明确参与式方法所带来的影响。14个研究案例涉及了各行各业，包括自然资源管理、供水设施管理、农业技术推广、小额信贷、城市地区应用PRA以及RPA与社会性别等。有些案例是研究人员实施的，有些则是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实施的。大多数研究并没有采取正式的控制性的比较方法，但有两个案例是关于同一个社区的，相同的项目在该社区设计过两次，一次是传统的方法，另一次则是按照参与式程序设计的。两个案例比较了传统方法和参与式方法的成本，有几个案例还检验了扩大参与式方法所面临的挑战，两个案例还研究了当使用传统的政府管理办法快速扩大参与式项目时，对参与式项目的质量和结果带来的影响。尽管缺乏正规的研究方法，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弄清楚参与式方法影响的研究，而不是像文学作品那种，仅仅对参与式方法进行歌功颂德。

为了整合这14个研究案例的发现，在对参与式过程中参与者的角色的理解基础上，我用了一个诠释性工作框架，即将参与者分成“发出声音的”和“有影响的”两种。“发出声音的”指的是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参与信息或知识的形成和分享，而“有影响的”则是指参与者能够对决策过程进行实际影响。在分析每个案例的时候，我确定出“发出声音的”和“有影响的”这两种参与式方法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和好处，并确定带来这些好处的关键因素或者前提条件。主要结果总结在了表格1中。很显然，这需要对丰富的案例信息进行大量的简化。

表格 1：“发出声音的”和“有影响的”的影响、好处以及前提条件的总结

	影响与好处	前提条件
‘发出声音的’	1. 信息收集与分享得到改善 2. 关系得到改善 3. 个人态度和意识发生变化。	• 相互尊重、透明的工作程序 • 必要的重复过程 • 渐进的学习过程、充足的时间、实际经验、可以接触到全部的、可靠的项目信息，并了解组织希望他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有影响的’	（总体来说：） 4. 形成了社会力量的驱动器 5. 改变了角色 6. 承诺继续跟进	• 对于被期待的角色，村民可以获得完整和真实的信息 • 开放和公正的讨论和决策体系 • 良好的协助服务 • 开发符合村民利益的项目 • 开创对共同利益的意识 • 尊重和创造自信 • 提供释放大家能量的社区结构 • 村民角色和意识的增长 • 村民和政府工作人员渐进、持续的的学习进程（边实践边学习） • 实现角色转换的社区机制 • 项目管理的支持机制 • 决策中的主动介入
总体	7. 正在形成支持社区参与的机制化框架	• 社区自我管理机制 • 支持项目的管理机制

来源: Wilkes (2001)

有关参与性的影响及其好处的主要发现

“发出的声音”能够做什么？

案例研究以事实依据证明参与式方法能够改善沟通以及项目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有几个案例指出，从传统工作方法到参与式工作方法的转变，对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例如地方官员、技术人员以及项目人员等）信息产生与共享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参与式方法使得项目人员能够与村民直接沟通，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在避免主观偏见的情况下开展调查工作，降低被社区拒绝的可能性，并允许村民发挥其创造力，比如利用其传统知识等。沟通得到改善最根本的原因是村民感觉到项目人员对他们的尊重，这也改善了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改善的关系表现为平等、合作、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等，这些都是通过较长时间的反复互动才逐步建立起来的。

村民与项目人员在相互理解以及态度方面的改变，是在项目中改变各自角色，以及实施更广泛的社区发展的前提条件。项目人员具体态度的改变包括增加对村民能力的欣赏、改变对村民在发展活动中角色的看法，把村民当作发展的主角。这种转换也依赖于村民对自身角色态度的转变，包括对自己在追求自我发展过程中的潜在角色的意识提升，并认识到他们应该并且能够为自己做事情的。在大多数案例中，态度的改变以及双方关系的改善需要项目人员与村民经过长时间磨合才能逐步建立。有时候这种关系的改变在项目人员反复深入社区一年内就可以实现，但是也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在实行参与式活动之前，村民与从事自然资源保护的工作人员存在冲突，实施了参与式活动之后，彼此关系的改善则花费了大约5-6年

的时间。透明的工作流程以及完整可信的项目信息也被认为必要的前提条件。

参与式决策有什么好处？

在14个案例中，村民在项目活动的不同环节广泛地参与了决策，从需求评估到基础设施或者自然资源的后续项目管理。

有几个案例指出，村民在决策中的参与使村民能够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共识，并一致认为通过合作来实现这些利益是多么的重要。有一个案例是关于协助村民制定新的森林资源管理条例的，在那个案例里，除了发现需要支付协调员的费用外，没有项目方面的新发现。这个案例表明，在获取项目资金方面没有必要将利益定义为农民利益，虽然人们一般是这么假设的。

其他一些案例指出，参与式过程给了村民被尊重的感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使他们充分调动他们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使“精神力量”在个人和社区层面都释放了出来，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促进了发展过程中的地方参与。

引进参与式方法，也使政府人员改变了工作重点。例如，他们从解决冲突转换到提供服务，从实施规章到协助社区发展。在机构层面，参与式发展意味着政府部门角色的重要转变。随着在参与式项目中把部分决策权下放给村民，政府部门就能够更集中的提供服务和培训、保证组织架构、协助村民以及提供信息等。

总的来讲，这些案例为村民有效参与决策程序的前提条件提出了建议，包括：

- 能够接触到完整、可靠的项目信息（知情同意）；
- 外来者应该相信村民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 村民应该非常清楚他们在项目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 是否参与，自行决定；
- 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决策体系，确保“发出来的声音”能够转换成“有影响的聲音”；而且
- 协助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协商。

体制结构与作用机制被认为是使参与成为可能并对其提供支持的重要因素。我们分析的一半的项目都建立了这些机制。这些机构对于确保村民进行合作、具备相关途径并获得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也确保了项目结束以后，相关活动还能继续下去。这些机构设置了合理的结构、程序以及激励方式来促进行动。村民们也指出，新的管理制度和机制给了他们发展的自信，增加了他们对项目的责任感和热情。社区机构也可以通过转换机制来促进项目人员和村民的角色转换，有些以前由项目工作人员负责的工作(例如蓄水池修建位置的规划、自然资源利用的监测等)，现在都可以由村民来承担了。

在有资料可查的项目中，参与式方法被用到了更广泛的项目管理机制中。有些机制特别支持引进参与式方法。例如，需要有证据说明某些技术设计是获得了社区会议批准的，或者将项目人员工资与社区活动结果挂钩等。其他机制（例如在供应链的每一阶段进行实物交接时需要提供发票，对资金使用进行公示等），并不是为了引进参与式方法而特别设计的，但被认为有助于建立一个透明的工作环境，这也减少了公民参与的潜在障碍。

参与式方法的风险和局限性？

研究发现村民们在技术方案选择以及外部的市场机会信息方面知识有限。还发现农民通常选择他们已经熟悉的项目，这些项目投入低，风险也低。大多数案例都为这一局限性提供了解决办法，并得出结论，参与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而是一个“多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在那一过程中，成功的规划就是把村民和外来者的智慧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村民的喜好偏爱，或者对自己需求和能力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外来者提供的有关市场和技术选择的信息。

参与式方法的成本，特别是人力成本，经常被当作局限性。有三个案例研究了在项目中应用参与式方法的成本，其中的两个案例与传统方法的成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项目中的参与式部分的成本大概占总投资的0.1%到3.6%之间。尽管这数字看起来很小，但官员们仍然明显地倾向于采用成本最低的方法，尤其是在没有参与式工作专门预算的情况下，这在政府的大型项目中也很常见。

参与式方法，和其他传统方法一样，几乎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引入中国的。通常情况下，工作人员和村民在开始接受PRA时都持消极态度：他们要么是被要求应用此方法，要么是不确定此类方法到底能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什么好处。参与式方法要求村民、地方工作人员以及政府官员进行循序渐进的学习。对于身处一线的工作人员和项目管理者来说，学习主要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因此充足的时间是一个前提条件。将重点放在循序渐进上看起来是及其重要的，这也是大多数案例的主要结论。如果给予循序渐进式学习的时间不充裕，或者并未认识到这一重要性，即使采用了参与式方法，也可能导致被动参与。盲目加快加大学习力度也会增加农民的风险，因为这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能力。

参与式学习过程中反思的作用

中国西南地区对参与式的反思是在很多从业者对PRA的认识发生了转变的时候发生的，以前他们把PRA当作一套调查工具，后来认识到参与式方法是支持发展活动的一个过程。通过对以实际行动为导向的发展项目中的参与式实践的影响进行整理、分析和分享，这些反思过程与案例研究帮助从业者深入的理解了参与式在发展行动中的潜力、前提条件以及可供选择的参与方式。

个人态度和行为改变的重要性已经被Robert Chambers (如1995, 1997)多次强调，而且很多研究案例也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他们也表明，个人态度和行为是由村民和项目人员在体制背景中的地位决定的。村民激励体系与决策程序被认为是政府部门改革的障碍。那些研究加快加大应用参与式方法所造成的影响的案例，强调了参与式方法需要广泛的机构和制度支持。除了项目周期中的参与以外，一些从业者从更高的角度考察了将参与式方法在各部门的工作程序中制度的可能性。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颁布，第一轮村民选举刚刚开始时，几个案例强调了通过建立社区机制来支持村民介入决策过程的重要性。

在反思过程中，参与式方法的更广泛的治理环境被坚定地提上了PRA从业者的日程。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发展从业者，都已经“超越项目范畴”来研究实施机构内的管理问题（例如

Wang and Sun, 2002; Han, 2002; Zhao, 2006), 以及使社区有机会发出声音和影响决策的更广泛的体制环境 (如Zuo, 2003; Zheng, 2006; He *et al.*, 2007)。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得到了政府部门相关活动的进一步支持, 例如要求制定参与式扶贫规划 (PADO, 2001)。从那以后, 中国农村政府体系中持续实施了很多项机构改革。

更多信息, 敬请联系:

Andreas Wilkes

Almondbury Albert Street Bury St Edmunds Suffolk UK

电子邮件: andreas.wilkes@yahoo.com

参考文献:

Han, W. (2002) 'Practice and lessons of applying participatory metho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Guizhou Agricultural Sciences* 30 (1): pp. 50-53.

He, J., B. Hillman and J. Xu (eds) (2007) *Rural governance, village autonomy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PAO (2001)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2001-2010)*.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AO): Beijing.

Wang, W.Y. and D.J. Sun (2002)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participatory meth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tual aid groups.' *Yunna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14(1): pp. 1-9.

Wilkes, A. (2000) 'The practice of and reflections on PRA in Southwest China: a report on the PRA Reflection project in Yunnan, Sichuan and Guizhou.' Unpublished manuscript, Yunnan PRA Network.

Wilkes, A. (2001) 'What can participation really do? Report of the PRA Reflection Project in SW Yunnan.'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summary). Printed Manuscript, Yunnan PRA Network.

Zhao, Y.Q. (2006)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icipatory work methods in rur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 Yunnan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d) *Participation: Extension and Deepen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pp. 188-197.

Zheng, B.H. (2006)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return of power to the people.' In: Yunnan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d) *Participation: Extension and Deepen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pp. 152-164.

Zuo, T. (2003) 'Performance and stakeholder analysis on decentr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43 (2): pp. 21-25.

感谢:

The PRA 反思项目是由英国发展学会和香港乐施惠赞助, 由云南地理协会主办的。



第一章

社区主导

第三章 简介

JOHANNA PENNARZ

本篇着眼于社区是如何经历角色和责任改变的。尽管社区希望负起责任，但向新的工作方法转变，对于社区和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学习过程。

在中国农村地区，农村社区是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单位。而在西南地区，农村“社区”可能会下辖一系列在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以及民族构成上千差万别的村落。农村基层管理单位是“行政村”，具有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包括村长）和村干部（包括党支部书记）。

行政村来自于农业集体经济年代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通常下辖几个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拥有大部分的耕地。生产大队再组成人民公社——最基层的地方政府。随着1979年农村改革的引进，大集体时代的生产体系被废除，农业生产又决定性的回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体系中¹。一个行政村可能包括几个地域广阔的自然村。自然村则是更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单位，在那里，有着相同历史和民族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

如今，行政村在提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参与到扶贫、社会福利、基础教育、公共健康等活动中，尤其是在比较富裕地区。理论上，村民是“自治”的，而且中央政府一直强调社区应该在自己的事情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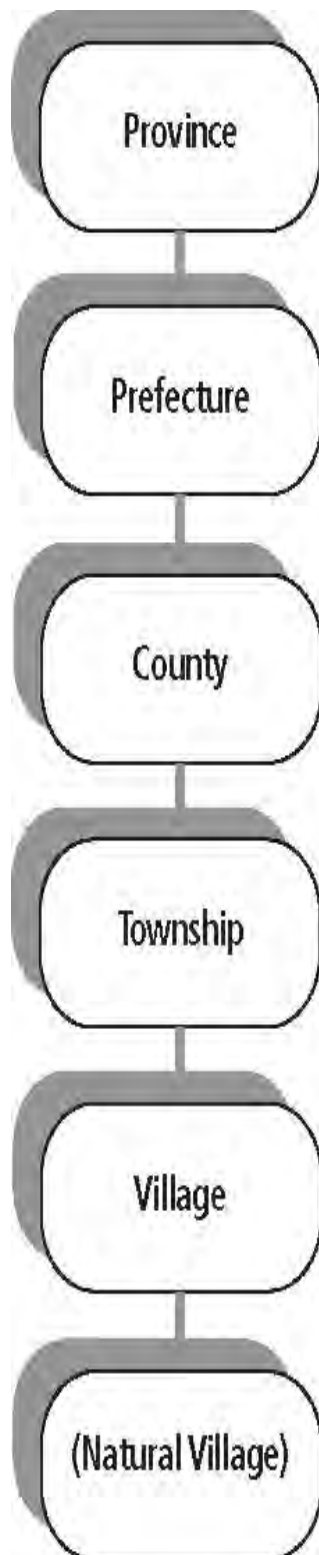
社区参与的法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²该法律规定了基层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公共参与。根据此法律，村民应该参与所有影响到他们生计的项目。中央政府认为村民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参与项目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一事一议）。社区参与旨在提高、叫停不需要的项目并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来接受投资。³

¹参见“简介——1949-1989年发展历程指南”（Cannon and Jenkins, 1990）。

²《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98年11月4日通过的，为农村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提供了法律基础（详见www.china.org.cn/english/government/207279.htm）。

³该决定（CCP Central Committee 2008, pp. 13-14）反复重申了建立村规民约讨论制度（一事一议）的重要性。引自Christiansen and Zhang, 2009。

图1 行政架构



PRCDP 是由世行和 Dfid 资助的旨在帮助西南三省（云南省、四川省和广西区）脱贫的项目。总投资为 1.4 亿美元，以参与式方法和跨部门合作的方法支持中国政府实现西南部的发展目标，减轻项目区中边远社区、资源匮乏社区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绝对贫困状况。PRCDP 覆盖了 1000 多个行政村（四川省 519 个，广西 305 个，云南省 187 个），总人口 140 万。该项目的主要内容

- 包括：
- 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山地农业；
-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 基本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
- 项目管理与支持；
- 村级培训。

PRCDP 的总目标是实现特困人群的持续参与。这意味着 PRCDP 将从项目规划设计、项目实施、项目监测评估等所有环节让社区进行参与。在项目准备阶段，PRCDP 开发了基于三省现有经验的社区参与方法，并相应调整以适应三省的具体情况。PPA 和 PP 在 PRCDP 可行性研究期间曾经在云南省和广西区率先进行了尝试。参与式方法已经在参与式手册中进行了记录，该手册详细描述了以参与式方法在社区层面进行项目规划、实施和监测的方法。手册还包括了各省的实际案例。

尽管中央政府承诺要增加社区参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和社区常常分不清楚彼此的界限。行政村的具体权利和财政额度是完全没有规定的，而且在实际中各个地区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政府仍然在学习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向社区授权（见第三篇）。为了在项目管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社区常常需要建立自信和技能。

对于政府而言，给予社区更大的所有权和责任，是希望就此解决现有基础设施的维护问题，以前因为没有所有权，很多基础设施情况恶化，而不得不重复投资。过去，因为安排不明确以及缺乏所有权，导致了后续维护工作的缺乏，整体而言，村级基础设施是不归村所有的，而是由乡镇拥有。这意味着社区可以拒绝承担相关的后续维护责任。这种情况使地方政府更支持参与式方法（见第二篇第19章，作者覃国政）。

像PRCDP这样的国际资助项目，在确定政府和社区之间的责任界限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PRCDP致力

于在项目设计、项目实施、项目监管评估等方面让贫困农民完全参与（见文本框1）。这为地方政府和社区体验全新的角色和责任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因而推动了参与式进程向前发展。PRCDP已经帮助地方层面相关各方的角色和关系的重新定位，如同下面的文章中所描述的一样，地方政府把管理责任交给村里以后，社区是如何承担其相关责任的。

PRCDP的参与式方法对社区的参与产生了深远影响，基本是第一次对他们村庄的投资进行管理。通过这些项目，地方政府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得到改善，彼此增加了相互信任和信心。第一章中的三篇文章描述了这些方面的体验。这些文章都是那些以社区成员和协调员身份介入了这些过程的人撰写的。

娜体来自云南省西盟县的一个小山村，这是中国最边远的山村之一，与缅甸交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贫困村民到东南部更发达的工业化省份打工。娜体的案例显示项目从劳动力回流中受益很大，这些回流的劳动力贡献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娜体还描述了社区是如何主动的参与到项目的各个方面的，作为结果，社区对项目的成效非常满意。

覃国政来自广西区罗城县。他的案例描述了当社区决定不按照惯例选取地方精英对项目进行管理时，地方政府官员是多么的震惊。相反，村民们选了一个普通的农民作为项目负责人。该社区确认在一个水利灌溉项目中，他是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也一致同意他的动机将是这个项目成败的关键。他们是正确的，事实上项目的成功已经使政府官员反思他们的惯性思维，过去他们认为普通村民是没有能力来承担相关责任的。

宋浩昆的案例（四川省屏山县）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在本案例中，他们采取了传统的管理方法，只有村干部参与管理，其他的关键的利益相关者都被排除在外。当社区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抱怨的时候，他们才得到政府的支持。文章显示了社区关系和传统意识向更加民主的社区自治转变是多么的困难。

这些案例都强调了政府常常忽略这些社区力量。社区一旦获得相应的空间，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快速的认识到，这是代表社区来更加主动参与并要求承担更多责任的良好机会。文章强调了因角色不明和责任下放不够而导致的紧张情况，但是，通过沟通协商，不仅澄清了彼此的角色问题，也澄清了政府管理体制中不同的职责范围问题。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Johanna Pennarz ITAD Ltd 12, English Business Park

English Close Hove, BN3 7ET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址: www.itad.com

文献参考：

Cannon T. and A. Jenkins, eds (1990) *The Geograph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outledge: London.

Christiansen, F. and H.X. Zhang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Reflections on Current Rural Policy'. Duisburg Working Papers on East Asian Studies 81.

第四章社区如何参与项目的规划与实施

娜 体

娜体是云南省西盟县木鼓坝村的一位拉祜族村民。作为社区代表，娜体参与了PRCDP。2009年，在昆明研讨会上，娜体为众多的参会者介绍了她在参与式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下面的文章是根据她发言的资料整理而成的，提供了她所在社区是如何体验项目提供的赋权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她的发言非常实际，但她的参与和贡献给参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代表能够在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上发言。娜体为研讨会的讨论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此次活动，自信也进一步得到提高，并将这些体验带回到她的社区。

芒亨行政村是PRCDP的一部分，项目活动始于2005年。我们村共有85户，村民315人，都是拉祜族。我们村距离中缅边境只有1公里距离。

2004年8月，我们村成立了项目工作小组，召集了宣传和参与式规划会议，我作为木鼓坝自然村的负责人参与了这个会议。项目工作小组的成员是由村里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户代表选举产生的，不同经济状况的群体各占20%的代表，其中至少30%必须是妇女代表。会议期间，我们使用了参与式工具，包括分访谈（贫困户组、妇女组和男性组等），以及一些特殊农户访谈（例如离婚农户），来讨论项目的优先性以及他们的想法。

在会议开始阶段，妇女的参与力量非常薄弱，特别是男女混合讨论时。但是妇女逐渐赢得了男人和项目工作组的尊重，她们贡献了更多的想法，特别是她们对美好未来的看法。

讨论会后，我将项目工作组讨论的结果与村民分享，在分析我们村所面临的困难时，所有人都贡献了想法。当我们选择项目时，每个农户至少有一名代表参与讨论。

2006年5月，我们村开始实施第一个项目，重建饮水系统。在开始实施之前，县乡项目办的工作人员同村民召开会议来讨论水源选择，并确定了恰当的地方修建蓄水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阶段，他们持续地咨询妇女的意见。例如，各家水管铺设的地方等。为了确保项目实施质量，村民选举了12位村民代表，包括5名妇女组成项目监督小组。这些人员经常在外面务工，因此具有各种建设工作的监督的技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组织村民积极参与体力劳动，比如挖掘水渠、往工地运输沙子和碎石等。监督小组成员每天轮流到工地检查建筑材料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的标准。如果发现任何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材料，他们马上要求工程队采取补救措施。

项目完工后，我们——包括妇女代表也主动参与项目的最终验收。检查验收小组也征询了村民

的意见。工作组协助村民设计了后续维护管理制度，这样项目设施就可以很好的由社区组织维护



娜体在昆明的研讨会上做大会发言

摄影: Johanna Pennarz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几个项目：人畜饮水工程以及三条1.5公里长的水渠（可以浇灌200多亩的稻田）。¹全村85户农户都受益于这些项目。

我们村实施的PRCDP，村民都参与了整个项目过程，包括决定具体项目、监测和监督、项目管理以及最后的检查验收。同过去实施的项目比较，村民对PRCDP更加满意。受益群体对项目的满意度是所有项目成功的重要指标。村民在项目决策中参与的越多，他们对项目的满意度就越高。良好的参与意味着村中不同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决策。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云南省西盟县芒亨村

娜体

电子邮件: songhk@ynu.edu.cn

参考资料：

Cannon T. and A. Jenkins, eds (1990) *The Geograph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outledge: London.

Christiansen, F. and H.X. Zhang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Reflections on Current Rural Policy'. *Duisburg Working Papers on East Asian Studies* 81.

¹ 15 亩 = 1 公顷

第五章 一个普通农民是如何

被选为项目领导的？

覃国正

覃国正是广西区罗城县纳翁乡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筹备阶段，他就参与了世行 PRCDP，起初是在镇工作站，随后又进入县项目办公室（请参阅第二篇第 10 章中他的工作总结）。在本文中，他描述了发生在参与式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事件，即一个普通农民是如何被选为项目 PRCDP 负责人。他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整个选举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社区群众的一些想法。

在广西区罗城县纳翁乡社甫村的水渠项目监督实施小组推选会上，与会村民一致推选覃胜贵为组长，这大大出乎县乡项目协调员的意料。本文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村民如何成为项目负责人的故事。

社甫村有 10 个自然村，11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1327 人，总户数 322 户。总耕地面积 957 亩，其中水田 807 亩。50% 的自然村位于半山地区，村民由壮、苗、瑶、汉等少数民族构成。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杉木林和水稻。在社甫行政村，社甫和红洞两个自然村的农田从地形上说比其他自然村要优越，因为地势较为平坦。

过去，这里的村民种植双季稻谷，产量很高。上世纪 80 年代包产到户以后，村里的主灌渠在很多年里无人护理，因此灌渠的很多部分坍塌，野草丛生，部分渠道被堵，再也装不下很多水。村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人愿意出钱出力去修复这条沟渠。

2005 年，当世行 PRCDP 被引进社甫村的时候，村民们非常高兴，希望这个项目可以帮助村民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灌渠修理问题。然而，村民们也担心他们是否能够参与到项目中，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来做出决策。此外，由于过去缺少修理灌渠的经验，村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为了让村民可以有效地参与到项目中去，世行项目的协调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首先，通过倾听、访谈、田野调查和文献回顾等方式，世行项目的协调员逐终于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次，他们向村民介绍了诸如社区地图、季节日历、时间表、趋势线、风险矩阵和优先级设置、因果流程图和优劣势分析（SWOT）¹等参与式工具。通过项目中应用这些工具，村民们确定了他们的核心需求、致贫原因、找出可能的资源和解决方案等。作为结果，村民们对参与式方法的认识、知识和技能大大提高。

通过参与式讨论，村民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对于重建水渠也充满了积极性。大家纷纷表示，只要世行扶贫项目提供资金和物质保障，两个自然村的群众热衷于参与筹划，也愿意

¹ 详情参见第三章，参与式贫困分析和规划过程

在项目施工时投工投劳。

在讨论水渠如何修建时，有的群众表示，如果由群众自己来维修，村里没有懂技术的人才工程质量难保证，工程进度也慢。而且，时下正是杉木砍伐和运输季节，两个自然村的村民都没有时间组织施工。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施工队来组织施工，并同意允许两个自然村的部分群众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施工，以便管理和监督工程质量。



纳翁乡社甫村修好的水渠

摄影：覃国政

于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召开了村民大会，选举水渠施工管理和监督小组成员。村里要求每户至少要有一人参加这次大会。大家首先设定了成为这个小组成员的一些标准，然后再按这些标准选举出了7个小组成员，4男3女。他们的主要职责包括在施工过程中管理物资，监督施工质量，参与竣工验收等。

下一步是选举主要负责项目管理和实施的项目组长。一般来说，项目办官员和村民们通常从村或者组的干部中或者比较富裕的村民中选举项目组长，和普通村民相比，村和组干部社会关系比较丰富，通常情况下，他们和政府以及其他部门的关系都很好。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交和管理经验，经常被当作“人才”。因此，他们在村里很有影响力或者深受上一级政府的信任。

然而这一次，在一次村民会议中，一个代表提名由覃胜贵——一个普通村民，来担任组长。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其他全体村民的同意。覃胜贵接受了提名，并被正式选举为社甫村PRCDP组长，他还接到了热烈的祝贺，大家为他的被选上热烈鼓掌。因为覃胜贵既不是村干部，也不是组干部，更不是有钱人，村民戏称他为“平民组长”。

项目协调员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覃胜贵被选为组长。村民的答案简单的出人意料：覃胜贵家的

水田都在水渠下游，如果水渠修不好，覃胜贵就是水渠修护的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直到那时项目协调员才意识到：村民都认为，水田的灌溉需求会促使覃胜贵想尽办法把项目实施好，他对项目的主人翁感和责任感是最强烈的。只有通过覃胜贵的努力工作和承诺，项目才会取得成功，他也才能向全组村民一样受益。



罗城县社甫村等着灌溉的水田

摄影：Johanna Pennarz

最简单的理由却体现了村民最真实的想法，参与式过程的结果是大家将管理的责任赋予了与项目成功最休戚相关的人。实际上，在修建水渠过程中，作为组长，覃胜贵工作的非常努力。他组织管理监督小组认真履行职责；他还承担了施工过程中所有的协调工作；他纪录了群众提出来的全部问题，并及时向村、乡项目管理人员反映。然后他与工程队进行交涉，确保那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他还向村世行项目执行小组和乡世行工作站汇报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毫无疑问，从第一天起，覃胜贵和他领导的水渠建设管理和监督小组，就面临着挑战：由于普通村民没有任何项目管理经验，他们缺乏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去管理这样一个大工程。特别是一些和修建水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如工程管理、预算管理、质量控制等，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同时，因为这份工作是志愿的，无报酬的，承担这份工作需要很强的承诺，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弃自己的家庭事务来为大家服务。作为组长的覃胜贵，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需要随时随地的动员他的组员们尽可能地参与到项目管理中来。

2005年10月，通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以及一个复杂的“边学边做”的过程，共用水渠修建修补项目完工，一共历时4个月。社甫、红洞两个自然村的群众对完工的水渠都非常满意，因为两组的所有居民都受益。水渠完工后，两组无论是引水还是用水都更加方便，无论

是灌溉还是饮水，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到现在为止，每年该水渠灌溉水田近 200 亩，如果需要，水渠的含水量还可以实际灌溉 300 多亩。彻底解决了过去群众找政府要水、常常为争灌溉用水打架的问题。

社甫、红洞两组的村民对覃胜贵的评价是负责任的“平民组长”。大家对覃胜贵完全信任，对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感到满意。他们对水渠非常满意，很高兴看到世行扶贫项目在覃胜贵的领导下取得成功。



罗城的贫困村

摄影：宋浩昆

对于我们来说，当地政府的协调员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发现，当地选举出来的社区组织和项目组长对工作都非常投入，严肃对待他们的责任。民主选举过程可以保障制度的透明性。为了保证选举过程的效率和公平，来自外部的项目协调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选举之前，他们可以帮助村民明确好项目组长的标准。

从这次经验中，我们还总结到，如果参与式方法的原则和世行项目的核心理念能够融入当地村民的知识体系，这对当地未来项目的管理将起到非常大的指导作用。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广西区罗城县纳翁乡

覃国正

电子邮箱：songhk@ynu.edu.cn

第六章 农户如何在他们

负责监督的项目中维权

宋浩昆

宋浩昆是云南大学的一名副教授，也是云南参与式网络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成员。作为研究人员和项目经理，他是该省最早的参与式实践者之一。从 2004 年起，宋浩昆开始成为 PRCDP 的协调员。他的这篇文章讲述了来自四川的一个有趣的案例：村干部玩忽职守时，社区开始在项目质量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

下意识地，人们对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关注的更多。当地方社区修建一条水渠时，工程质量和项目的实际影响是当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本案例说明当各种问题产生时，建立相关机制来保障信息交流畅通，同时找到符合乡情的解决矛盾的方法非常重要。

项目背景

四川省屏山县楼东乡西村是世界银行 PRCDP 在平山县最早启动的项目村之一，该村有 12 个村民小组，420 余户人家，是一个大的贫困村。该村的基本特点是土地零碎、海拔差异大。根据不同的地形特色来分，该村可以划分为沟谷区、半山区和高山区。沟谷区相对平坦，但人口密度大，土地面积小。西村大部分的耕地位于海拔较高的地方，远离河流，所以每年的干旱时节必需抽水灌溉。

在正常情况下，西村每年每户用于抽水的开支在 200-300 元左右。随着柴油价格上涨，抽水费用也逐年递增。因此，修建一条可以从河流上游引水的灌溉渠，就被村民投票决定为优先实施项目。2008 年，终于被县项目办列入了实施计划。这条灌渠将从距离西村约 800 米外的一条水量全年都很丰富的河流引水。一旦灌渠完工，这条河流的 10% 的水量将被引到西村，这既满足了西村的灌溉要求，同时对下游社区的用水也不会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

项目实施和监管

为了鼓励当地村民参与项目过程，项目办决定该项目由村民自主修建，根据这个原则，由村民推选出来的项目实施管理小组负责组织和具体实施。项目实施管理小组成员包括村干部和一些村民代表。对村民进行咨询，并分析了曾经实施过相同建筑项目的邻村的一些经验教训以后，项目实施小组决定，村民自己挖水渠的地基，而将砌石头、浇水泥这种技术性要求高的工程承包给地方的工程队。村项目实施小组成员和乡项目办成员负责施工质量的监管和检查。要想工程最后完工，还必需经过县项目办和技术部门的正式验收，然后乡项目办再拨付工程款。

尽管项目实施之前，规定了村管理小组的全部成员对该项目的日常监管都负有责任，但实际上村长却担任了主要的日常监督工作。然而，由于村长经常要忙于村里其它的行政管理事

务，从项目一开始，他就没有足够时间投入到水渠项目的监督上。与此同时，许多普通村民对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表现除了很大的兴趣和关心。村民认为虽然指派了相关的工程质量监督人员，但村项目管理小组的成员们太忙了，不可能全天候的在工地实地监督。

2008年9月的一天，村民郭元贵经过一段刚浇灌好的灌渠时，出于对灌渠质量的关心，她顺手拣了一块石头，在灌渠上进行敲打，发现混凝土浇灌的沟壁发生破裂，还有干沙从里面流出，显然，合格的混凝土浇灌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于是，她将发现的问题向施工方反映，但施工方对她的反映却不屑一顾，无视她的投诉。见问题得不到解决，郭元贵又将发现的问题向实施小组的管理人员进行汇报，希望他们能出面处理。然而，她反映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重视，村里个别的管理人员还说，“你没出钱修水沟，所以质量如何不关你的事”。

听到这样的答复，郭元贵很生气，她反驳道“为什么不关我的事，虽然不是我出的钱，但我是受益者，如果灌渠质量不好，影响到灌水，我还得花钱抽水”。郁闷中，她又打电话给村支书，将看到的情况进行了汇报，村支书说他本人没有时间去处理，但将情况向乡项目办王主任进行了汇报。

不到半小时，王主任赶到现场，和郭元贵等村民一同核对了情况。同时，从技术角度进行了分析，确定这属于施工质量问题。事实面前，施工队只好承认这个问题是由于使用搅拌不均匀的水泥而产生的。在村民和项目办的要求下，施工方不得不对整段15米的灌渠进行返工，由此造成的1000多元损失由施工队自己负责。事情处理后，村民们意识到，虽然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没人能保证将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质量问题，和组里其他的妇女商量后，西村妇女决定以后每家轮流出工，义务监督工程质量。而工程队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控制好每一个施工环节，保证了工程质量。



郭元贵在新修建的灌渠上

工程终于完成后，农户非常满意，县里检查人员的技术验收也顺利通过。

反思：

实际上，村民郭元贵只是一个当群众参与普遍缺乏时，具有强烈责任感并愿意出面解决问题的个体。和传统的以干部为中心的管理系统相比，成立项目实施和管理小组已经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然而，由于缺少充分的参与和具体的责任分工，项目实施和管理小组在监督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作用依然很弱。如果没有像郭元贵这样的村民来发挥监督作用，灌渠的质量肯定会出现严重问题。即使有了郭的参与，问题的解决依然困难重重，因为她没有被授予监督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她只能把问题反映给项目办公室的原因，因为只有项目办才有改变并最终解决问题的权利。所以，本案例中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没有被赋予相应的责任。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充分赋权给像郭这样的当地人，让他们参与到整个的监督和评估过程中来加以最终解决。

经验和教训

社区实施和监测项目时，必需将责任和权力下放给有能力的村民：作为项目实施的主体，社区不应该将所有责任和权力全部赋予村项目实施小组成员，因为他们往往也同时是村干部。而村干部往往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通常没有足够精力充分完成所有派给的任务，另外，将所有权力集中赋予他们时，不利于他们正常履行职责。相反，如果将一部分责任和权力下放给其它农户，特别是主要的利益相关农户，他们会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做好监督工作。

作为监督者，农户需要充分的权力来保障其监督行为的有效性：当社区农户发现问题，并向施工方提出时，后者可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拒绝农户的意见。相反，如果监督农户有一定权力，比如得不到农户的认可，施工方就不能通过验收和拿到工程款，这样他们就会被迫认真听取、接受农户的意见和建议。

社区农户的监督也需要外界的支持：工程质量的监督，往往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而社区农户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结构的限制，可能发现不了具体的技术问题，或者不能确定有些问题是质量相关的，因而无法说服施工队整改。这种情况下，村民需要外界，特别是技术部门的专业指导，以便更好地监督工程质量。尽管也需要一些专业知识的培训，但村民参与日常监督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而一旦这些知识为村民所掌握，将来还可以应用在其它项目中。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

宋浩昆

电子邮箱: songhk@ynu.edu.cn



第二篇

改变角色和关系 ——协调员

第七章 简介

JOHANNA PENNARZ

本篇探索了方程式另一边的经验。当地方政府正在尝试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以及与农村社区的关系时，他们发现了社区承担责任的潜力。乡镇是中国实施政府政策和相关项目的最基层的政府部门。他们是与农村社区互动的关键窗口。

PRCDP 中由政府采取参与式方法实施的项目主要是依靠政府工作人员来完成。对于政府协调员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克服政府与社区之间长期积累的各种不良关系，尤其是不信任关系，以及彼此对对方的偏见。本篇包括三篇短文，是由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开始实施参与式进程不久之后撰写的。这里所反应的主要问题是希望对参与式过程进行最好的协调。

覃诚提出了协调员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从传统角度看，为了避免冲突和矛盾，政府总是尽量避免召开开放式的讨论活动。作为协调员，他们需要有效的去管理参会者的期望，平衡不同的利益，管理好社区内部的冲突。**覃诚**的文章反应了如何在社区内部达成共识、强化共识。主要的结论是，任何项目都应该要求社区作为整体来参与。

PRCDP使用两类协调员。在启动阶段，乡镇级协调员在少数村庄对参与式贫困分析和规划方法进行介绍。稍后，村级协调员接受相关培训后，再在更多的村庄推广应用参与式方法。在研讨会期间，参与者们对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交流。**覃诚**指出，村级协调员可以更好的推广参与式方法，因为村民信任他们，冲突发生时，村民愿意也接受他们的调停。

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也能够充当更加独立的协调员角色。**蒙顺辉**描述了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条账通常是由现有机制的缺陷所导致的。例如，赋权不充分以及为其他日常工作所牵累等。他的案例显示，协调员需要花费巨大努力才能获得高层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支持。

非政府组织常常被看做诚实的中间人，因为他们是中立方，而且能够更加开放的倾听社区的需求。然而，正如**王建萍**的案例所显示的，作为外来者，他们常常发现，在如何适应当地具体情况方面面临挑战。她的案例非常有趣的反映了这些出于好意的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制约（和妥协）尤其是一些充满挑战的少数民族社区。适应当地社区特有的文化和社会偏好能力成为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本篇的案例反映了中国的参与式协调员们所面临的困境，特别是在如何处理当地的权力结构和不公正方面。在处理外来力量介入时，当地社区表现出了高度的优势和弹性。外来协调员必须在社区文化、社会敏感性的需要与民间机构自身对社区发展和变化的希望之间找到平衡。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Johanna Pennarz

ITAD, Hove,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站: www.itad.com

第八章 来自三江研讨会的反思

JOHANNA PENNARZ

2004 年，当广西区扶贫办在 PRCDP 准备阶段实施参 PPA 时，这项突破性举动深深的影响了政府扶贫工作格局。¹广西区大约有 4800 万贫困人口，多数是生活在喀斯特山区的少数民族。通过 PRCDP，广西区扶贫办尝试了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方法。在这些地区，社区被彻底的动员起来介入到项目活动中。这个新的扶贫方法改变了扶贫办的角色和与社区的关系，如文本框 1 中的摘要所述。

广西区在政府体系内部参与式能力建设上走了很长的路。在 PRCDP 准备阶段，项目在广西组织了一系列的参与式经验的培训和分享研讨会。

这些培训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定期的分享和反思来支持参与式贫困分析过程和参与式项目规划过程。少数来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研讨会的参与者介入了整个过程。2005 年初，在广西区三江县举办的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下面的三篇文章就是在本次研讨会上介绍过的有关参与式反思的文章。

文本框 1 来自广西省级报告的摘要

广西区政府过去规划的扶贫项目，通常都是由相关政府部门和乡镇政府来实施的，项目区群众并不清楚具体情况。受类似项目实施的长期影响，社区在项目实施方面缺乏自信和热情，并担心他们是否有能力承受相应的集资，尤其是大型的、技术密集型的项目。

在具体项目的实施阶段，我们只指出一些方向性的问题，而把更多的具体工作安排、资金的使用管理等方面的决策交给社区。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我们完全允许社区村民讨论和决定如何能够顺利地实施项目并按照工作计划完成项目活动，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农业生产，并顺其自然的安排劳动季节和劳动力，相关农户根据大家的决定贡献相应的劳动力。一旦他们碰到技术等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向县乡项目办管理人员报告相关情况。无论是什么时候，也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回答社区提出的所有问题和请求，并设法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获得社区村民的信任和合作，并依赖这个基础顺利地实施完成项目。

我们让社区村民清楚了解项目并参与各个环节，从项目的确定到资金的拨付、资金管理和项目设施的后续维护等。另外，在项目实施阶段，社区的项目管理小组负责张榜公示所有项目信息，尤其是社区敏感的相关信息，包括资金的使用、材料消耗、投工投劳数量等，以及项目进展等等。这使得社区在项目是否需要集资等方面具有决策权和管理权。这样的手段和方法的结果，就是社区村民对项目过程和结果都非常满意。

来源：广西PRCDP中的参与式省级报告（2005）（未出版）

¹ 在广西境内的项目县有 6 个。



覃国政（左在三江研讨会上）

摄影：Johanna Pennarz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Johanna Pennarz

ITAD, Hove,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站: www.itad.com

第九章 协助社区层面的参与过程

覃 诚

覃诚是广西区环江县下南乡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在PRCDP准备阶段，他是参与式贫困分析与参与式规划工作的协调员。以下是他对这个过程的反思学习结果。

我相信在一个具体社区决定是否实施一个项目之前，了解当地村民对项目是否有兴趣以及他们的优先需求是非常必要的。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我相信我们就应该召集社区会议讨论此事，并让所有的农户户主签订承诺书。其次，我们应该知道项目实施是否会涉及到其他的自然村。如果是，那我们应该首先让双方签订一个协议（避免今后闹矛盾）。最后，应该让村民感到是“我需要这个项目，而不是上级给我们强制安排的项目”。

只有当项目资金到位后，村民才会有兴趣参与讨论项目资金如何管理等事宜。要考虑资金存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村民最关心的资金使用是什么？如何确保他们能够有效（权利）控制好资金的使用。



环江县毛南族社区村民对完成的人畜饮水工程非常自豪（广西区）

摄影：Johanna Pennarz

一旦村民能够有效的控制资金的使用，那他们就会思考如何安全使用这些资金，同时既便利又有效。在项目安排中常常会出现多种矛盾。由于村民都非常渴望早日脱贫，他们认为一旦项目投资到位，村民就能立即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不过，那些没有从中受益的农户对项目的参与性就不太高。其中一些村民甚至成为项目实施的绊脚石。因此，举行全村社区大会，让农户代表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项目的看法和建议就变得非常必要。各个自然村的村民代表都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有权代表村民的意愿。在社区大会上通常都是村民代表发言。假如大会上有不同的意见乡镇的项目协调员就需要向这些村民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假如不同农户之间的意见很难处理和解决，有时就有必要与他们进行私下沟通协调。

由于贫困的多样性，我认为在选择项目活动以及分配项目资源（资金）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关注那些特困户，也需要考虑其他多数村民的感受和想法。假如一个项目仅仅只在特困户中实施那很可能出现特困户孤立无援的情况，得不到其他农户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全社区的成员都参与到项目中，但是特困户和边缘户要得到有效考虑和照顾，包括补助和劳动力减免等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村民就更加认可项目并从项目实施中受益。这不仅使得社区村民更加具有凝聚力，而且会在改善环境和提高全村经济水平的活动中更加主动的扮演角色，以更好的实现项目目标。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广西区环江县下南乡

覃诚

电子邮件：songhk@ynu.edu.cn

第十章 村级协调员的作用

覃国政

覃国政是广西罗城县纳翁乡乡政府的一名官员。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世行 PRCDP 的筹备工作。他开始在镇工作站工作，随后又进入县项目办公室。在本篇文章中，他讲述了村级协调员在项目准备阶段推动参与式方法所起到的作用。

在项目试点村开展参与式工作的时候，因为大家对参与式方法都很陌生，县项目办就把所有能干的项目协调员都派到了乡和村一级，去应对项目村初步遇到的问题。形成了由县和乡级项目协调员作为主要力量，由村级协调员辅助开展工作的格局。

到了项目推广阶段，由于有经验的项目协调员数量有限，而许多项目村都需要参与式评估。就出现了县、乡一级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县充分依赖培训过的村级协调员，让他们发挥作用。县项目办和镇工作站则主要负责质量控制。



参与式规划过程 —— 罗城

摄影：覃国政

我们决定赋予村级协调员更多的责任。我们训练了一批村级协调员，提高了社区的参与能力。其中村级协调员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 他们是社区的一分子，也和其他村民拥有相同的发展需求。村民们愿意听从和信任村级协调员，他们对项目的主体感也因此加倍了。
- 他们有相对强的组织能力。长期在农村工作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有

些是县、乡协调员所不具备的。

- 他们特别熟悉村子的情况，非常利于开展工作。
- 他们在当地的权威使得他们更容易去协调各种矛盾。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广西区罗城县纳翁乡

覃国政

电子邮箱：songhk@ynu.edu.cn

第十一章 乡镇协调员的角色

蒙顺辉

蒙顺辉是广西区龙胜县回水镇政府工作人员，并从PRCDP准备阶段就一直在项目上担任协调员。最初是在乡镇政府，后来是在龙胜县项目办从事项目工作。文本表达的是他自己在项目期间的感受和反思。

在示范村的村级参与式项目规划与推广期间，我们县考虑了当地的实际情况。这里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协调这个参与式过程的一些感受和反思。

摆脱控制，让乡镇协调员大胆实

乡镇协调人员非常努力的将参与式方法介绍给社区群众，在启动培训结束后，乡镇协调员便到社区组织村民开展了参与式试点工作。他们动员村民并召开了村民大会，让大家分析和了解了贫困的表现与贫困的根源与特点，并探索解决贫困的办法。大约工作了一个月以后，他们再次组织了一个减贫的参与式项目规划会，形成了规划报告。

为乡镇协调员提供培训以及游说乡镇领导的机会

由于乡镇协调员不是全职人员，他们在负责项目的同时还有其他的工作必须做。因此，这些人员通常都比较忙。为了帮助这些协调员正确处理好日常工作与项目工作之间的关系，我们主动与乡镇领导沟通，寻求这些乡镇政府及其领导对乡镇协调员的支持和理解。乡镇领导表示，他们将全力支持PRCDP。因此，无论PRCDP组织什么会议，乡镇协调员都能全身心的投入到项目工作中而不受到日常工作的干扰。县项目办总是设法让这些乡镇人员参与相关会议，以及确保他们工作的相对稳定和持续。结果显示，我们的工作方法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努力为乡镇协调员创造愉快的参与环境，强化他们的拥有感

县项目办总是强调乡镇协调员参与县级相关会议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使乡镇协调员能够及时了解项目相关信息。另外，在所有有县领导和乡镇领导出现的相关会议上，县项目办的负责人都会表扬乡镇协调员，对他们的表现给予正面和积极的评价，包括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效方面。会议也表明这些领导和相关同事也从相关考察中受益。这有助于他们更好的了解了PRCDP工作，并愿意投入时间和体验项目。另外，大家一致认为，PRCDP的启动工作进展顺利，得益于乡镇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乡镇协调员的辛勤劳动。



打分作为参与式规划的一个部分 —— 广西环江县

摄影：邓维杰

为了进一步加强乡镇协调员对项目的拥有感，每次PRCDP专家来到现场的时候，¹我们都会及时通知他们参与相关活动包括会议，使得他们可以及时了解专家的想法和建议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些乡镇协调员的意见通常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来自基层，更了解当地社区的情况、需求和想法。同时，我们也要求他们记住专家的相关建议并在实际工作中参考执行。

¹作者指的是世行和 DFID 相关专家实施的项目检查活动。



蒙顺辉正在广西区三江县举办的项目研讨会上发言 摄影: Johanna Pennarz

PRCDP项目人员在我们县组织了村级参与式规划的培训。他们设计了一个合作式的方法开展工作，包括将工作划分到不同人员并分不同的培训主题。每个培训部分都非常成功，气氛融洽，启动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推进。

在整个项目前期准备阶段，县项目办主要担任了组织协调服务的角色，以及协调员的角色。而乡镇协调员则承担更多具体的实施任务。因此，我们制定了未来工作的实施战略，上级以及PRCDP在资源、物资和财务方面对乡镇协调员的培训投入是非常大的。项目几乎都是在基层实施的，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培训更多的乡镇协调员。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将来才能依靠乡镇协调员启动项目，同时我们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工作和学习方面，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参与到项目实施过程中，PRCDP才能在今后实施得更加顺利。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广西区龙胜县扶贫办

蒙顺辉

电子邮件: songhk@ynu.edu.cn

第十二章 外部项目推动如何适应地方实际

王建萍

王建萍是云南大学的一名副教授，也是云南参与式协会成员。她有长期与地方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和地方政府合作的经验，她的研究领域主要关注自然资源管理和贫困问题。这篇文章展示了她对国际混农林业中心的一个参与式项目的产出评估研究。

介绍：

在中国农村，大量由政府主导的发展项目正在改变社区传统的资源管理方式和地方景观。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和政府主导的项目管理很少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意愿。与此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基金会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地方能力建设和加强地方参与程度的可能。在云南的平掌村，国际混农林业中心在推动社区的社会学习和参与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好地补充了政府的职能。¹

与自发的社会学习相比，由非政府组织推动的能力建设过程往往在快速引进一些新的想法和概念方面有很大优势。有的时候，当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和任务与当地老百姓的兴趣一致时，当地群众和地方组织也更愿意参与到这样的外部干预行动中去，因为他们会把这些外部干预看做是获取资金和人力资源的一种机会。然而，因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项目都是基于外部推动，它们都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因为这些项目往往不是建立在村民自我的选择和自我认同之上的，所以无法带来根本性的态度改变。推动改变的过程往往面临很多挑战，很多时候，当外部干预项目结束后，村民的行为可能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状况。下面就是从平掌村这个案例中抽取出来的一些经验和挑战。²

平掌村概况：

平掌村是一个彝族村，它由5个自然村和大约2000村民构成。平掌村位于保山城外25公里的山区。村子位于一座海拔1000-1800米的山体一侧。由于土地稀少，气候寒冷、作物产量低，人口密度大，该村一直比较贫困。耕地总面积3300亩。其中43%属于陡坡山地，水田较少。平掌可耕种的作物种类也比较少，水田夏季一般是种植单季稻，而玉米和小麦是主要的冬季作物。

因为退耕还林的压力，土地不足一直是过去10年困扰平掌村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许多陡坡地在政府退耕还林项目的要求下，要在较短时间内必须退耕成为林地，转而种植为数不多的几种植物。

尽管许多发展项目都尝试过帮助这个社区，这些项目的产出却非常有限。村民们反映他们的

¹ 国际混农林业研究 (ICRAF)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77年，参见: www.worldagroforestry.org

² 该案例研究基于2006年10月在平掌村的调查。

生计没有多大改善，在重大的资源管理方面也缺少真正的参与。正如一个村民说到的：“各种项目来来去去，没有一个给我们带来真正好处”。



高山峡谷提供了多样性生机，云南保山

摄影：Johanna Pennarz

认识到以往的项目都没有意识到和充分发挥地方制度的能力，从 2005 年开始，国际混农林业中心在平掌村开始推动一个以社区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向社区介绍参与式方法和新的农业和林业生产模式，来改善贫困社区的生活，同时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国际混农林业中心决定从地方组织的能力建设入手。在项目刚开始阶段，由平掌村村委会主要负责项目的指导和实施。然而，为了保证资金能直接到农户手中而不发生渗漏，5 个独立的，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发展小组在 2005 年—2006 年间陆续成立了起来。

这些发展小组的成员和组长是通过村民大会由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这五个发展小组的职责包括参与式的规划；资源，如种苗、化肥、小额贷款等的分配；森林管理和冲突管理等。尽管国际混农林业中心对小组的人选并没有明确要求，5 个发展小组中的 3 个组的组长都是村委会的成员。

经过两年的实验，那 3 个由村委会成员担任组长的发展小组工作都开展得非常顺利。小组制定出来的各项规章制度都被村民严格地监督和执行着。而其他两个小组却面临困境。因为缺乏和乡政府和村委会的联系和交流，这两个小组得不到来自行政系统的帮助。一年的志愿工作后，小组的成员失去了工作的热情。他们承认他们缺少管理项目的经验和能力。同时，当几次项目尝试失败后，村民们对小组组长和成员都失去了信心。

经验：

平掌村的经验表明，社会和文化接受度是能力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将项目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只有 35 户人家的小寨子，平掌村的陆家地村民小组有一个在每年春节的第二天集体聚餐的传统。在这次晚餐上，所有的村民会坐到一起讨论村子的发展规划和其它公共事务。这样的聚会有时还可以发挥调节邻里矛盾和召集集体行动的作用，但却又是在一种比较轻松、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所以很容易达到一致意见。

村长和村发展小组的成员们说，他们非常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参加这样的活动，表明他们愿意服从集体的规范和义务，可以给他们在社区中带来好的名声。而且这也是动员和鼓励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好机会。此外，因为村干部和小组成员是作为普通成员参加这样的社会活动的，所以普通村民的声音也更容易以一种比较随意的方式被村干部们听到。村民们更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真实需求，因为这样不容易激怒地方领导们。这些活动更符合地方的文化和社会实际。所以，公众的监督和传统认同的一些道德标准让村干部们更愿意做到公正透明。平掌村发展小组的成员们也承认，在一些社会集体活动中，更容易说服村民们服从小组的一些决议。

采用一些符合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加强项目的透明度

平展村的案例表明，当向地方社区介绍一种新的财务管理方式的时候，对文化和传统的敏感性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国际混农林业中心的专家向平掌村介绍了例行财务报告和审计系统。这个系统有助于建立社区成员对自己财务系统的信任。一个小组长介绍到，为了让财务系统更加透明，他所属的村发展小组已经把财务报告张贴到公告栏上。但是，村民们没有检查这些数据真实性的习惯，也缺乏相关的财务知识。

这个小组长说：“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人们只是本能地怀疑我们的手不干净。”与此不同，另一个小组则采用了一种更符合当地文化的做法：财务和出纳在春节的聚餐会上给大家逐项地解释财务记录和收支情况。村民们于是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也不会得罪小组领导们。

精英控制的挑战

中国的乡村社会，社区精英支配社区事务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在一个社区里，精英们从现存的制度中受益的程度要比普通人高。社区精英，包括村干部、富裕家庭和一些有社会政治资源的家庭，往往拥有足够的势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解决冲突、资源分配和决策时也往往具有更多发言权。

在平掌村，不同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地方权威的社区成员有不同的发言权。穷人是无法与村里的精英抗衡的。换句话说，虽然大家都可以加入某个地方组织，但在资源分配上却不一定平等。例如，据反映，在平掌，村干部和村干的亲戚们在村民大会上和决策的时候往往比普通村民活跃得多。



水田、旱地和林地是生计来源的主要部分（云南保山） 摄影：Johanna Pennarz

当地意义上的“公平”并不意味着“平等”

有的时候，公平和平等是两个不同的目标，没有办法同时实现最大产出。例如，一个村发展小组的成员说到：“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国际混农林业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玉米种子。但没有人愿意冒风险在他们的地里试种。于是，第一年很多种子被浪费了。只有我和其它三个小组的成员在自己地里种了一小部分。在第一年收获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新玉米非常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生态条件，产量很高。于是，在第二年，所有的农户都向我们要种子。国际混农林业中心提供的种子总量是有限的，满足不了要求。于是，我建议选土地靠在一起的几家人来种，这样第二年我们就可以收获更多的新品种的种子。然而，没有人愿意放弃这次机会。没有办法，种子只好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每家只得到一点点。你知道，小面积种植是不利于玉米的传粉和保持种子基因的纯粹性的。”

参与的动机不一定能可持续下去

很多政府或非政府的发展项目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因为往往被老百姓视为一种潜在的资金来源。一位平掌村村民说：

“无论什么项目，我们都欢迎，只要它们能给我们带来资金和看得见的好处”。

当地人参与到这些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参与后可能获得的经济收益。但他们缺乏去持续这些项目的热情。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是，当这些组织被建立起来之后，当地人却失去了维持项目的动力。一些村民的投入只是表面的或装样子的，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参加会议可以得到一小笔钱或其他好处的时候。



狭窄的山路上运输仍然依赖动物（云南保山） 摄影：Johanna Pennarz

反思：传统制度的建设

国际混农林业中心在平掌村的项目经验表明，在一些贫困社区，外部推动的组织建设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当地人由于可见的收益较低，缺少能力或足够的社会资本而导致集体资源管理的动机不足的时候，这样的外部推动显得尤其重要。实际上，在平掌村，当地的发展严重依赖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或其它组织的帮助。然而，当外部的帮助撤离后，这些行动能否持续下去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项目的经验是否可用于更大的范围？没有足够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一些社区的情形在外部干预撤离后可能还会变得更糟。

从这个案例研究中获得的证据表明，成功的外部干预依赖于一个关键的要素：是否社区有一个强有力的制度结构，或是否外部项目有能力从传统制度中抽取重建一种适应地方的管理机制。特别是当地方社区的内部社会差异很大（如收入来源、资源状况和兴趣等），将能力建设与地方制度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一些当地文化所接受的奖惩规则和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云南大学

王建萍

电子邮件： kmywnwp@yahoo.com.cn



第三篇

管理实践:进行更公平 更透明的资源配置

第十三章 简介

JOHANNA PENNARZ

中国二十多年的扶贫努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定位贫困人群方面，政府的策略还明显有值得调整和改进的地方。在这种改进中，从区域扶贫转到以人为本的扶贫是最重要的一次转变，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贫困人口의 主动参与是扶贫的最好途径¹。扶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贫困人群是成功减贫的关键。

文本框 1 扶贫的新理念是渗透

云南省扶贫办主任王智先生在2010年全省扶贫工作研讨会上指出，成功的扶贫工作是：

.....在所有的乡镇中，主动动员社区力量参与扶贫工作，激励社区群众全面参与试点工作，将社区群众视为决策主体、建设主体和受益主体，动员他们建设自己的家园，实现双向受益，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质量，并享受这些成果。

在最近一期的十年规划中，主要的创新是将扶贫目标定位于贫困村。而之前的扶贫规划，目标都是贫困县和贫困乡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很少的资金能够到达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山村。为了尝试更好的目标定位，以及更好的反应贫困群体的需求，国家扶贫办引进了参与式村级规划，所有项目村都要求准备一个参与式的村级发展规划作为项目投资的前提。但是，许多村从来没有准备过类似的村级发展规划，而即使是有规划，在向负责资金分配的政府部门汇报时(Park & Sangui, 2009)，也常常以失败告终。

文本框 2 PPA 在广西：乡级协调员的反馈

谁是社区中的贫困户？谁是扶贫发展项目的目标群体？之前的扶贫项目都是基于村民的年度人均纯收入来确定的。凡是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628元的就被认为是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在628–924元之间的被认为是低收入农户。纯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生产成本-生活费用-固定生产成本-税收-人情来往费用等。

这种计算方式对于普通政府工作人员来讲都是困难的，更不用说普通农民了。我曾经访问过一户村民并和他一起计算他的家庭纯收入，没有半天时间无法搞定。因此，谁是贫困户？运用这种方法很难确定。许多乡、镇和村干部通过估计来确定纯收入，这就存在很多主观和偏见的情况。这种估计不但无法得到社区的承认，而且许多人为了成为“贫困户”而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

¹ 中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区域性的扶贫项目，1994年，政府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主要内容是在20世纪内最后7年（1994–2000），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八七扶贫计划主要包含3项内容，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和财政补贴。2000年，政府又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目标是解决5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通过PRA方法，社区自己讨论出他们认可的基于社区实际情况的贫困标准并对社区农户进行贫困分类。他们可以很快的并且是完全一致的确定贫困户，并准确的确定目标群体。我们从中学到，社区农户的贫困状态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假如中等农户被确定为相对富裕，但他们很快就可能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一场疾病变成贫困户。同样得到项目支持的贫困户则可以很快改善其贫困状况成为相对中等户。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如何确定扶贫项目的有效性？我们使用了贫困趋势分析和贫困季节变化表来了解这种变化。

将参与式规划与资金分配决策联系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原来具体项目资金通常都是通过漫长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过程分配的。地方政府也可能寻求解决地方的优先发展需求，但通常是临时性的。它与参与式村级规划的互动通常也是以不主动，不透明的方式进行的。

四川省的杨刚提交的案例介绍了一种创新性的以参与式和透明的方式来有效分配项目资金的实践。参与式的规划过程，是提案在竞争中获胜的前提条件。该实践的主要收获在于，项目的选择标准是公开的，过程也是公开的，因此资金的分配更具有公信力。

政府在行政村以下的机构中没有扶贫措施⁹。在西南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些地区，行政村通常比较大而且地域辽阔，常常涵盖十几个自然和社会条件差异巨大（参见前面有关项目背景描述的文章）的自然村。当在行政村内分配项目资金时，往往依赖非正式的关系。村政府主要是通过村干部来决定最需要的是什么，哪里需要。广西区在2004年实施的参与式贫困分析则是一个全新的和完全不同的识别贫困群体及其需求的方法。

文本框 3 什么是参与式贫困分析（PPA）

PPA关注的是贫困户和边缘群体的发展视角。它的目的是更好的理解和学习社区内部的贫困问题，关注贫困群体对贫困的理解意味着这种分析将更加实际和可靠。它可以帮助做出更好的决策，使项目更好满足贫困群体的需求，并瞄准特定群体，例如妇女或者特困群体等。

基于PPA，农户识别出了他们的优先需求，并据此形成满足其优先需求的项目规划。项目资源分配的过程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协调员需要协调各种矛盾和冲突，学习如何通过透明和公正的方式协助决策过程。与此同时，他们也学到了如何保护贫困户和边缘户的兴趣，以确保项目更加公正。

在PPA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脆弱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村民通常使用他们的标准和打分方式来识别贫困农户，然后讨论贫困根源。

- 村民自由讨论，所有讨论的要点都记录在大白纸上；
- 他们对贫困的主要原因进行排序和打分，这些都是贫困户认可的；
- 然后进行贫困趋势分析，了解社区的贫困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是在减轻还是在恶化，包括粮食、收入、自然灾害和其他相关因素；
- 贫困的季节性分析，侧重粮食安全、花费、收入、灾害比较多和比较少的季节；
- 这个过程是通过5-6个特困户的访问和分析确定的，包括其粮食、衣物的充足程度等，以及贫困的变化和转移等；

- 妇女代表也必须进行随机选择和访问，以了解他们的地位和状况，以及她们对贫困的看法等；
 - 然后，举行社区会议，以协助村民学习和分享这些讨论结果；
- PPA是参与式规划(PP)的过程之一，因此其过程和结果要整合到实际的村级发展规划中。

覃祖荣描述了他所在的村是如何识别特困自然村和特困农户的。他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贫困户的识别可能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过程。因为这涉及到谁有资格获得资金帮助，因此必须小心管理。对于覃祖荣所在的村，谁有资格得到资金帮助是需要达成共识的，如果这个决定是外人作出的，可能会产生很多阻力。

社区贡献是另外一个长期问题，那些由PRCDP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社区的贡献，通常是以劳动力形式的。是否需要？以及需要多少劳动力常常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讨论，而且分歧巨大。在PRCDP中，地方政府已经知道，类似的具有争议的问题需要通过开放的讨论来找到解决办法，而非回避。陈春云的案例（云南省龙陵县）描述了两个社区是如何在有关劳动力贡献方面达成共识的。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Johanna Pennarz ITAD, Hove,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站: www.itad.com

参考资料：

Park, A. and W. Sangui (2009)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valuation of China's Poor Village Investment Programme.' Paper prepared as part of the World Bank China Poverty Assessment.

Zhifei, Z. (2005) 'The roles of PPA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of Ercun Village, Rong'an County.' Presentation at the Guangxi Workshop, Beijing December 2005.

第十四章 从村内参与到村间竞争性选择

杨 刚

杨刚是四川省屏山县扶贫办副主任，也是PRCDP的县级协调员。他的案例描述的是通过竞争性过程强化项目资金分配透明化，这一实践很具有创新性。该项目一开始就使社区进行了有效参与这一做法已经推广到了四川省的其他地方。

屏山县是四川省世界银行扶贫项目的项目县之一，其中一些社区被选为PRCDP项目村。在屏山县，我们将竞争方法引入到PRCDP中，目的是动员基层小组参与到项目中，改进项目的成效和影响，并从有限的资金中获得最大化效益。在形成年度项目计划之前，我们要求各个项目村先参加竞选。我们要求各个项目村自己先组织村民开会形成项目实施计划，然后要求村干部作为代表村民参加开放式的项目竞选大会，所有项目都要在这个大会上讨论，然后投票确定后，再与县项目办签订项目实施责任书。下面是我们根据这些实践所总结的这种竞争性项目选择的相关经验。

过去的经验与新的期望

过去，通常是县上确定项目后分配给相关单位，我们通知相关村准备项目实施计划并据此组织实施相关活动。这种传统的项目做法意味着项目管理存在以下不足：

- 决策者基于他们的个人印象安排项目，很难做到公正、公开和公平；
- 由于项目是上级部门安排确定的，社区的态度就是简单的做事、集资。社区在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参与；
- 项目农户缺乏足够的主动参与，对项目的监督和管理也很弱，项目成效也差；
- 重建设轻管理，过去实施的许多项目活动都没有持续性。因为无人管理维护，设施最后都毁坏了。

在总结学习了过去的不足以后，我们在PRCDP中引进了竞争性项目选择制度。它的指导原则是应用参与式方法，利用社区动力让村民参与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管理和最终检查验收等整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希望加强社区基层组织的能力，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要我做到我要做。我们希望引进竞争元素到参与过程中并实践之，主动的促进参与，从而加强参与式过程并促进广泛的社区民主建设。

资金分配的创新方法

竞争性选择是一个新方法。基于不同部门的意见和要求以及项目村的想法，我们形成了如下制度并通过三步实施：

动员群众，准备实施计划



项目公开辩论

摄影：杨刚

2007年5月，我们发布了关于申请和竞争PRCDP的通知，项目资金包括100万人民币的政府财政扶贫资金、200万人民币的项目贷款。在这个通知中，我们说明了申请和竞争项目的范围、条件等要求，并强调项目村应该证明项目是通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等恰当的形式以民主讨论和倾听不同村民意见方式形成的。因此：

第一步：在社区举行村民大会，请村民提出不同的项目设想，以及选择村民代表；

第二步：社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收集村民的各种需求，并筛选优先需求的项目。村民们进行详细的讨论并准备一个详细的实施计划包括后续管理措施，然后提交投标。与此同时，村民撰写介绍报告用于投标竞选中的演讲。

第三步：形成项目选择的标准。县项目办牵头负责。倾听参与部门和社区村民的意见，并形成如下项目选择标准：

- 项目实施计划的技术可行性和必要性？
- 项目规划设计过程是否通过参与式方法进行？
- 项目活动是否是通过村民大会讨论形成的？
- 项目实施计划涉及的劳力需求、后续维护管理措施是如何讨论的？
- 是否有具体的劳动力投入和集资计划？
- 是否形成了后续维护管理措施和保障措施。

为了评估这些实施计划，县里成立了评估委员会，成员包括11个涉及项目管理和实施的专家（扶贫办、财政局、社保局、农机局、畜牧局、水保局、教育局和卫生局等），这些成员将评估每个项目并给出打分。另外一个监察小组也建立起来，成员包括县人大、县纪委、监察局、审计局等，负责监督整个打分过程和结果的封存。



公开评估方案

摄影：杨刚

下一步就是以公开辩论的方式确定项目村。有 11 个合格村参加了屏山县的公开辩论。出席者包括 9 位 PRCDP 项目乡、镇的领导、乡、镇世行项目工作站的执行负责人、11 名项目村的村民代表（基本是村干部）以及 50 多位相关部门的人员。屏山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副县长也出席会议并做了讲话。四川省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也派了两位官员参加。本次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

当地电视台的主持人主持了此次公开辩论，11 个村的代表通过抽签方式依序陈述了他们的项目建议书。随后进入问答阶段，然后各位代表进行了总结性陈述。最后，11 位评审人员根据选择标准对各个村进行了打分。主持人对候选村的得分情况进行了排序并得到了全体参会人员的确。最后，据此确定了项目村清单，获胜的项目村随即与县项目办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整个辩论期间掌声非常热烈，随后监察小组公开启封文件，宣读各个候选村提交的实施计划的得分情况，以及各个村在公开辩论中的得分。最后总分前五名的候选村获胜，他们是全和、高田、碾米、街基和汉溪村。这 5 个村被官方正式选定为 PRCDP 的优先村，每个村将获得国家扶贫资金 20 万元以及世界银行贷款 40 万元。副县长与这些项目村签订了项目协议。

下一步就是改进实施计划并组织各村的项目实施活动。根据规划和设计，所有的项目村将动员群众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当公开辩论结束时，来自鸭池乡周家村的代表（他们落选了）激动地对记者说道：我们落选了，辜负了乡亲们的期望。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落选意味着我们还落后，但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准备得更好来参加类似的比赛。

成效与经验

这种竞争选择的方式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和经验。

调动了项目农户积极性

高田村是楼东乡最边远的山村，靠近云南省的水富县，是典型的边远贫困村。得到世行项目后，村委会开会并决定每人集资 500 元来支持 15 公里村主道的建设。村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参与到“修建自己的公路”的活动中，大家非常热心和积极。为了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村民们主动贷款种植了 1200 亩的毛竹，建设了“高田小竹海”。

基层小组能力得到建设

为了争取到项目，碾米村村支书陈善洪同村民举行了会议，讨论制定实施计划。他还专门去县交通局和县水利局咨询专业人员，研究和掌握了有关村道建设和供水系统建设的技术标准和相关知识，相关专家和评审委员会对其专业知识给予高度评价。在公开辩论结束后，他说道：“为了改善我们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争取到项目并尽快实施。群众看着我们并期待我们尽早干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工作精心准备。我们必须掌握相关知识。竞争选择的公开辩论促使我努力学习，这不仅是一场比赛，对我也是一个很好学习机会。”

展示了透明公开和阳光操作

项目单位通过竞争性选择审批项目，体现了真正的阳光操作（公开、公平、透明和接受监督）。避免了决策者个人控制决策。实施计划首先提交给县项目办并封存。评审实施计划的人员受到游说则说是专家评估负责，专家受到游说则说有监察小组全程监督封存的实施计划这样就无法作弊，使整个过程真正展现了公正、公平和公开。

本次公开辩论选择项目村引起了县委和县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我们县的首次尝试，在全县产生了广泛影响。所有人都相信这一创新性扶贫机制尊重了社区群众的愿望。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标志，也是实现行政公开透明的具体手段。竞争性选择过程现在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其他政府部门中，例如新农村建设项目、以工代赈项目、水保项目和交通项目等。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四川省屏山县扶贫办

杨 刚

电子邮件: songhk@ynu.edu.cn

第十五章 社区参与贫困分析和项目规划

覃祖荣

覃祖荣是广西环江县城隍村毛南族的一个农民。从 2005 年起，他开始参与世行 PRCDP，并被村民选为村级项目协调人。和其他村民一道，覃祖荣积极推动了参与式方法和参与式规划工具的使用。从 2006 年开始，作为 PRCDP 的执行小组成员，他负责参与式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监测。在这个案例中他描述了参与式工具在社区的创新实践，即如何帮助村民鉴别出他们最急迫的需求和优先项目。

村情介绍

城隍行政村包括 10 个自然村，12 个村民组，共计 210 户人家，1160 口居民。71.1% 的人口为壮族，其余的为汉、瑶和苗族。城隍村距乡镇府所在地 26 公里。总耕地面积为 1162 亩，其中 796 亩为水田¹。森林总面积为 6216 亩，最常见的植被树种为杉树和松树。历史上，城隍村是环江乡最贫困的村子之一。

由于城隍村资源贫乏，土地稀缺，从 2005 年 4 月开始引入的世行项目首先重点关注的就是贫困问题。因为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村民自给自足和长期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从一开始就让村民参与到问题识别、项目规划、实施和决策等一些列活动中。下面描述的就是城隍村村民自己开展贫困分析和项目规划的过程。

参与式培训和宣传

2004 年 8 月到 9 月 26 日，县、乡、村项目协调员参加了在县城举办的第一、二期世行项目“参与式方法应用培训班”。从县城回来以后，协调员挨家挨户宣传世行项目参与式规划内容。2005 年 4 月 29 日，村两委班子研究后决定，把村干部分为两组，由已参加过参与式培训的党支部和村主任各负责一组，分别下到各村发动协助、调查，并做好记录。

贫困村分类

2005 年 5 月，世行项目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召开。从 1136 人中选出 36 人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参加的有县、乡协调员，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妇女、老人、少年等弱势群体代表，其中有 16 位妇女。开始的时候，代表们对贫困户的分类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一共提出了 30 多条指标。代表们对这些指标逐一进行讨论，最后归纳、总结出 4 个最主要的指标：

- 道路条件

¹ 15 亩 = 1 公顷

- 是否有清洁的饮用水
- 居住条件
- 全年是否有足够的粮食

根据这四条指标，代表们将城隍村的所有自然村划分为以下三种：

- 普通村：村子道路全天候可通车；有干净的饮用水；房屋多为两层或更高的砖房；村里有一定数量的农业机械。
- 贫困村：道路情况差，吃水困难。粮食基本够吃，住房不是危房。
- 特困村：没有通车，远离学校和卫生所，吃水困难，口粮不足，发展缺少潜力。

让所有人明确了这些类型的划分标准后，代表们开始用黄豆（普通村）、石子（特困村）和玉米粒（贫困村）来投选每个自然村（自己的村子除外）应该属于哪一种类型。



地图标出了长北行政村内的贫困自然村，这将作为参与式贫困分析的一个部分（广西环江县）

摄影：Johanna Pennarz

贫困户分类

开始时，代表们对贫困户划分的标准很难达成共识。特别是妇女、老人、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意见和其他人尤其不同，因为他们都有一些受各自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的想法和观点。而来自不同自然村的代表也很难同意各村之间存在的差异。经过协调员和各位代表的集体讨论，终于做出一个折衷方案，让各村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立划分贫困户的标准。各村的标准可以有所差异，但必须考虑到劳动力数量、房屋和年收入等指标。

于是代表们回到自己的村子，重新召开会议，每户要求至少一人参加，特别是妇女。项目协调员先介绍了参与式方法的目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并强调了设立标准的重要性，有三个村子的标准做为示范介绍给大家。

标准建立后，同样通过投石子、玉米粒和黄豆的方法，将每个自然村都进行贫困分类，由工作组和各村代表（2男2女）将分类结果进行统计，交到村委汇总，并墙上公布，没有异议方能生效。虽然每个村子根据自己的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所选取的标准有所不同，但还是得出了以下一些共同标准，提交给村委会：

- （1）特困户：劳力少；重病户；危房；负担重；人均收入 100 元以下。
- （2）贫困户：房子一般；有外出打工；有劳动力；有些牲畜；人均收入 300 元以下。
- （3）一般户：房子是楼房以上；有较多的牲畜；有外出务工；人均收入 400 元以上。

把城隍村村民们自己设立的贫苦标准和政府的贫困线比较，我们发现城隍村贫困家庭的收入和国家的绝对贫困线基本一致，而城隍村的“普通户”标准和国家的“温饱”线标准基本一致。



地图标出了长北村大尧自然村贫困户分布，这是参与式贫困分析的准备工作之一。同时，也可以在图中标注出可以利用的重要设施，例如小学教室。

摄影：Johanna Pennarz

项目规划

2005 年 8 月，城隍村召开村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共有 58 人参加，妇女 21 人，还有老人、贫困户、少年等。会议主要目的是分析现状和识别贫困原因。与会人员使用问题树工具进行了贫困原因分析，优选出来的结果被公布在黑板上。只有完成这些必要的工作后，PRCDP 才能顺利进入下一阶段。

大部分代表认为：导致城隍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干净的饮水，村民常常因此生病，又没钱就医，导致劳动能力下降。代表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要有健康的饮水，同时发展养殖来增加收入。

通过代表们的投票排序，得出以下结果：人畜饮水排在第一，水利、养殖和公路排在第二，卫生、教育和能力培训排在第三。然后在墙上公布排序结果。

最后，通过群众的参与，列出本村的项目规划，产生出项目清单，并形成村级项目规划报告，上报县世行项目办。在村项目实施前，项目办要求必须经群众民主选举本村项目执行小组，并且成员必须有妇女代表和贫困代表。

项目的成效

目前，世行对城隍村的扶持包括 5 个饮水点、1 条水利渠道和 1 条村级公路的建设，均通过了工程验收。同时，城隍村还作为全县农业贷款发放的第一批示范村，有 42 户得到了世行贷款并用于香猪养殖、种桑养蚕；县、乡先后对农户进行了 4 期培训，内容为种桑养蚕、香猪养殖、社区能力、妇女保健等。现有 99% 的农户收到了很好的效益。

经验和体会

- 农户参与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划分，避免了外来人划分时由于对村屯情况不够了解而产生的偏差和偏见，也避免了村民对划分人员的不满，由大家自己划分出来的结果也更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
- 参与式方法不仅采用到项目规划阶段，并且贯穿整个项目过程。村民选出了优先实施的项目，而且确认了农户是项目的决策主体。农户对自己选定的项目则更有积极性去实施和监管。
- 为了确保将来农户能从世行项目中长期收益，有必要在地方动员，制度建设，整合政府其他项目和资源等方面继续努力和投入。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中国广西区环江县城隍村

覃祖荣

电子邮箱: songhk@ynu.edu.cn

第十六章 不同社区不同实施方式

陈春云

陈春云是云南省龙陵县扶贫办副主任，PRCDP 县级协调员。他的案例讲述了当地政府如何利用参与式方法解决棘手的投工投劳问题的有趣故事。

一把伞和曹家寨是龙陵县平达乡黄连河村两个毗邻的傈僳族社区，两个社区都没有清洁人畜饮水，主要问题都在于缺乏政府投资，以及当地社区维护不好。在当地村干部的协助下，两个社区群众通过讨论，将修建人畜饮水工程作为当地发展的优先需求。不过，这两个社区的基本情况是不同的。

曹家寨有52户农户203人，158个劳力。与一把伞村相比，他们有更多的劳动力，但没有种植任何特殊的经济作物。农业淡季他们通常都外出打工维持生活开销。他们打工的收入大概在每天20-30元之间。一把伞村有37户161人，78个劳动力。多数农户种植了山葵，这种作物每亩大概需要30-40个劳力投入¹。部分农户也外出打工，因此，劳动力短缺是个问题。

由于资金有限，PRCDP项目办人员只同意提供管道和水池的建设费用，同时提供技术支持。但其他所有的投入成本必须由当地社区解决，包括投工投劳和集资等。



龙陵县的傈僳族

摄影：Johanna Pennarz

曹家寨根据项目设计实施了项目，社区村民按照人口比例投工投劳。他们还修建了水池，包括炸石、搬运水管等。他们总的投入超过 180 个劳力。那些外出打工无法投工投劳的农户则自

¹ 1 亩=1/15 公顷

已雇工，或者支付相应雇工费用来完成各自分配到的工作量。通过这种方式，曹家寨村民只投工投劳没有任何集资就完成了项目建设。

一把伞村在建设初期共投工投劳至少 30 个。在运输建筑材料时，他们发现项目施工给妇女带来很大的压力。由于全村只有 78 个劳力，其中 21 个在外打工，剩下的 57 个劳力中有 34 个是妇女，她们是主要劳动力。同时妇女还要照顾山葵、做家务，所以无法承担其他更多的劳动。社区举行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大家决定改变原有的施工方式。通过举手表决的形式决定将项目施工承包给外面的工程队。妇女们同意按照每户集资 300 元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村民能够承担这个成本，因为他们从山葵销售以及外出打工中可以挣到相应的费用。最后，人畜饮水工程按照项目设计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



陈春云和村民们

摄影：Johanna Pennarz

小结

社区村民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处理好项目施工过程中预料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村民可以根据当地需求和困难调整相应的施工方法。这不仅保证了项目按计划施工，也满足了社区期待的目的。当村民在施工过程中能够发声的时候，他们就能主动自觉的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包括投工投劳问题。这个案例表明村民是项目实施的真实动力，如果需要，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施工计划。如果外来者强迫村民不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项目计划，不仅不能满足村民的愿望，还会增加妇女的工作负担，使项目在没有社区参与的情况下更加难以完成。对于当地人来讲，很难想象实施项目中的困难和障碍，尤其在他们从来没有实施过类似项目的时候。但是，社区经验越多，社区村民就会更加具有智慧决策并成为更好的管理者。这也帮助当地人强化了对项目的拥有感，进而使项目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从这个经验，龙陵县扶贫办和项目办认识到，社区应该拥有根据他们自身条件选择和实施项目的权利。龙陵县扶贫办和项目办也认识到决策是当地参与的关键。现在他们对参与的需求更加敏感，并将其应用到其他项目中。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云南省龙陵县扶贫办

陈春云

电子邮件：songhk@ynu.edu.cn



第四篇

中国流域管理项目： 流域管理中的 参与式方法

第十七章 简介

NICOLE KENTON

本篇主要介绍了中国流域管理项目(CWMP)¹——一个以社区为主导的监测评估试点项目。CWMP应用参与式方法来评估其在黄土二期水土保持项目中的减贫作用，该项目由世行资助。

这个大型流域项目的第一阶段，着眼于寻找恢复高原生态环境的解决方案。黄土高原覆盖了中国西北部六个省份，几千年来，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水土流失严重，黄河上游的某些肥沃土地也逐渐消失（见图1），环境越来越恶化。CWMP是黄土高原流域恢复项目第二期的一部分，项目区位于甘肃省。甘肃省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缺水。在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已经将甘肃省列为优先发展地区。

认识到贫困社区在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方面的角色和能力，捐助者开始思考，怎样与社区合作，才能既改善环境又降低贫困 (Taylor, 2005)。

CWMP用以人为本的方法研究流域恢复项目对生计的影响，主要着眼与通过参与式规划将这个项目所带来的效益有效地分配给贫困户。本项目的目的在于改进参与式监测评估系统，并以最佳实践的模式向其他相关的捐助项目推广。

2008年，CWMP完工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参会者包括村民代表和项目官员等。大家达成了“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有效管理和不同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主动参与，CWMP已经实现了其预期目标，重点是能力建设与信息分享，其成果具有很高的可持续性和推广价值”的共识。

那么，使用了哪些方法来确保项目成功呢？这些成功模式又如何复制到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其他项目中去呢？

现在我把回答这些问题的机会转给这个项目中直接在社区工作的人员。本篇是项目各阶段的一个总和，一共有五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水利部工作人员王越撰写的，她的第一篇文章总结介绍了CWMP的设计情况，第三篇文章从水利部的视角评价了社区参与方法的有效性。第二篇文章由来自甘肃省环县水保局的王保军撰写，概括描述了流域管理的创新性方法，包括社区参与监测评估中使用过的具体工具和方法。他也提供了一些案例来证明CWMP的成效，尤其是贫困户受益的情况。最后，来自中国国际农业发展中心的刘永功教授，从研究者的视角阐述了该方法在推广应用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教训。

¹ CWMP由DFID资助，实施期2003-2008年，更多信息见www.cwmp.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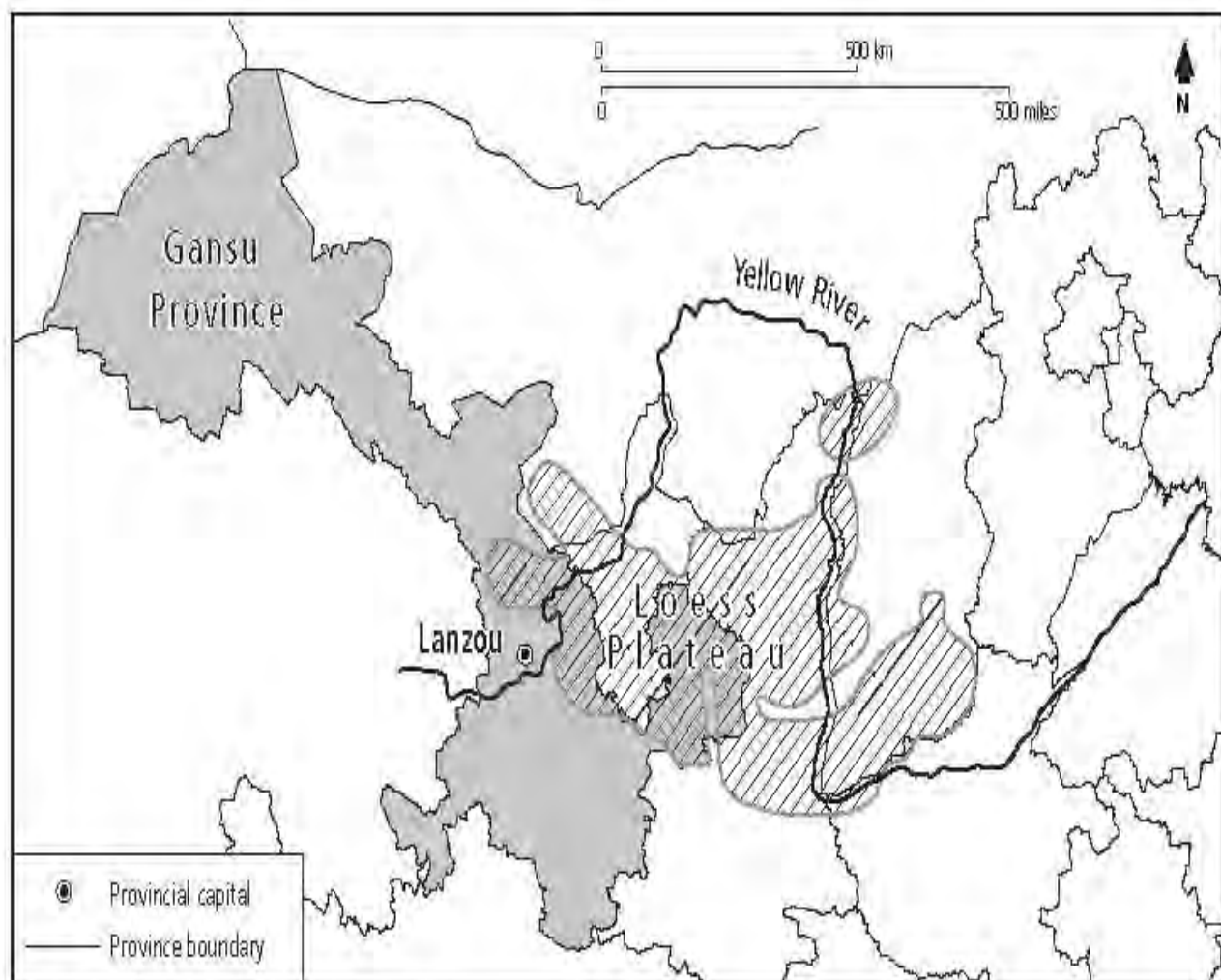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Cath D'Alton

Map 1: The locat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图 1 黄土高原位置示意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Nicole Kenton,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联合编辑, IIED

地址: 80-86 Gray's Inn Road London

邮编: WC1X 8NH, UK

电子邮件: nicole.kenton@iied.org

参考资料:

Taylor, J.G. (2005) 'Environment-Poverty Linkages: Manag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China' in *Reducing Poverty and Sustaining the Environment: The Politics of Local Engagement*, Bass S. et al. (eds), London: Earthscan.

第十八章 背景与方法

王 越

王越是中国水利部国际交流中心的处长，也是 CWMP 中央项目办的协调员。在这里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这个项目及其设计的背景信息。

CWMP 是作为黄土高原流域恢复项目的后续活动设计的，以总结项目的相关经验和面临过的挑战。黄土高原流域恢复项目主要关注退化流域的物理性恢复，尤其是通过梯田改造和造林方式¹。CWMP 基于以人为本的流域恢复原则以及流域社区生计改善的方法。

CWMP的目的是在甘肃省的四个地区（崆峒、静宁、华池和环县）示范创新性的参与式实践包括参与式小流域恢复规划、替代生计以及环境恢复等。项目也探索和构建一个参与式小流域规划和社区驱动的小流域恢复管理模式。这包括了整合减贫的水土流失治理、村民参与以及县级资源整合等方面。这些方法已经产生了综合的可持续的小流域恢复成效。

参与式小流域规划

参与式小流域规划将小流域作为一个单元（单位），社区作为主体，改善生态环境和农户生计作为目标，部门合作和资源整合为平台。它强调政府部门、相关组织和商业部门的主动参与尤其是项目区的社区和受益农户的参与。通过分析小流域存在的问题和问题根源、发展潜力与优势，寻找解决的办法，确定优先项目活动以改善生态环境和生计水平，并建立起有效的管理、监测和评估项目实施的机制。

项目设计

参与式小流域规划的步骤包括：

- 宣传和动员；
- 成立县级和村级参与式规划小组；
- 开发参与式小流域规划手册；
- 小流域的野外调查，通过社区实施规划，包括关键小组的访谈、问题识别和分析初步规划、资源整合和 规划完善 ；
- 提出初步计划；
- 整合资源，以及
- 确定最终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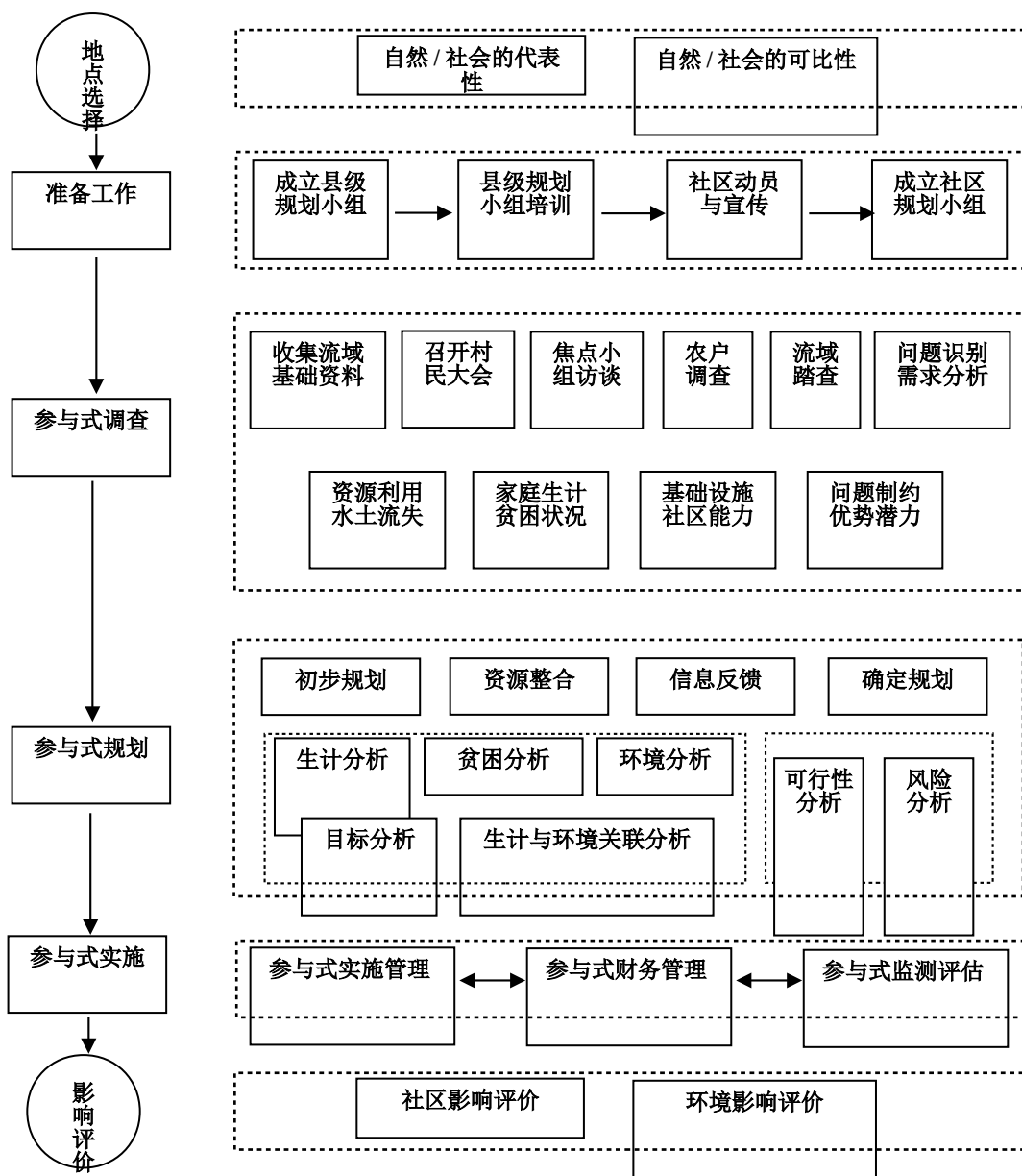
¹ 在无林地上建立新林的生产过程，来源：维基百科。

Diagram illustrating the Micro Watershed Planning process:

- County Project Leading Group** (县项目领导小组)
- Integrating Department Resources** (部门资源整合)
- Publish the Plan in Bulletin** (规划方案张榜公布)
- Community Planning** (社区规划)
- Community Planning** (社区规划)
- Community Planning** (社区规划)
- Planning Publicity & Mobilisation** (规划宣传发动)
- Participatory Planning Group** (参与式规划组)
- Micro Watershed Planning** (小流域规划)

通过应用参与式方法，项目开发了参与式小流域规划流程和框架（见图 1 和图 2），形成了社区驱动的小流域管理模式。

项目瞄准贫困农户，尝试建立他们的替代生计项目活动。例如，暖棚养牛和修建沼气池，帮助社区避免因放牧和种植导致的进一步的环境破坏，并贡献地表植物以及林地的恢复。坡改梯被用于控制水土流失以及提高农作物的产量。通过水坑收集雨水减少地表径流，同时改善社区农户的饮用水状况。



作为项目成果，项目区水土流失的状况以及林地和森林覆盖率已经得到改善，解决了 62% 的农户的饮水困难。人均收入从 925 元提高到 1365 元。通过这种方式，项目在减贫与水保方面建立了有机联系，贫困与能力建设之间也建立了联系。



坡改梯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重要手段（甘肃省）

摄影：王保军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水利部国际交流中心

王 越

电子邮件: yuewang@mwr.gov.cn

第十九章 创新的社区主导实践

王保军

王保军是甘肃省环县水务局的技术人员，他在本文中描述了他 CWMP 中获得的参与式经验和体会。

创新性的参与式流域管理实践

CWMP 由水利部实施。该项目引进了许多重要的创新方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流域管理方式。

将社区生计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

过去流域治理的传统方法是单一的，并只关注综合恢复措施，包括山坡治理、河道治理、造林和修建公路等。不过，这种治理方法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很少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需求。村民过度放牧、砍伐烧柴、开荒种地等破坏了环境，导致环境与生计的恶性循环。生计恢复活动也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在 CWMP 规划期间，项目就明确提出了关注改善社区生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项目引进了一个新的流域恢复模式：环境+基础设施+生计+能力建设。

流域管理的社区主导方法

传统的流域管理通常是政府驱动整个项目规划、实施、招标、监测和评估过程。社区仅仅是被动的参与者，为此导致一些项目活动不切合实际，村民对此很不满意，导致项目实施困难。CWMP 引进了社区主导方法进行流域管理，通过这种方法，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都由社区主导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就是指导、监督、协调和服务。

参与式规划方法

过去的流域规划主要考虑的是环境恢复效益，并且是在简单的调查基础上由技术人员确定计划。这些规划很少反应当地人的观点。CWMP 应用了参与式方法进行规划。这种方法赋权社区和村民，使得村民能够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方面。规划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形式，直接面对具体的农户进行开放和透明的规划过程，完全尊重村民的意愿并尽量满足村民的需求。通过参与项目规划，村民学到了很多方法，并应用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以及解决中帮助村民提高了能力，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和意识。

透明的财务管理

过去项目中的财务管理都是层层下拨，协调环节很多，导致实施速度比较慢，只有很少项目管理人员知道项目报账情况，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CWMP 的项目资金直接从中央项目

实施办公室到县项目管理办公室，然后从县项目办直接到农民那里或者承包商那里，环节减少使得操作速度较快。与此同时，整个财务管理信息全部在社区定期张榜上墙公示，因此无论是项目人员还是社区都清楚项目报账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社区成员也可以监测项目实施过程的相关成本情况。这意味着财务管理受到监督，任何违规行为都可以得到预防。整个透明过程使得社区很满意，不仅因为产出和效果，而且因为获得了对项目过程更好的拥有感。



实施农民需求评估（甘肃省）

摄影：王保军

社区监测与评估

CWMP对基于社区的参与式监测和评估非常关注，以确保当地需求能很好的识别出来，以及项目实施的质量得到很好的控制。

项目规划间的监测与评估

项目开始的时候，县项目办就实施了一个广泛而深入的项目动员活动，帮助提升公众意识以及社区参与对小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县项目办实施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回顾了项目方法，以及项目的理念和方法是否被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基于社区的反馈，对项目规划进行了修订。随后，村民被告知他们将直接选举成立监测队伍，以及参与式监测和评估的过程和方法，因此多数村民受到鼓励去监测项目，尤其是项目的实施。

这个阶段应用的工具包括：

📁👉 头脑风暴与反馈以形成需要讨论的所有主题清单。我们使用多种访谈工具，包括

自我介绍、游戏、抢答、提供小礼物、发放香烟和糖果等，以帮助创造一个宽松平等的气氛。使大家能够轻松自由的发言。村民被鼓励提出各种阻碍社区发展的问題。有人说，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听人说，从来没有机会在会上发言。我们的发言要么被忽略，要么就是因为说错了受到批评。但是你们就不一样，你们还给我们发烟发糖，把我们当朋友。我们感到很温暖，愿意告诉你们我们的想法。



深入分析问题。村民们针对罗列的主题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分析，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彼此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问题树和目标树，监测和评估的要点就是村民学到了分析问题，使用不同的工具，例如问题树¹，以及受到鼓舞去分析澄清这些问题。有的村民说道：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过去的的生活是如何的杂乱。我们的条件是如此贫穷但我们只恨我们命不好。很多人的态度都是随遇而安，很少有人有想法或者规划。通过分析，他们总结到：我们不仅知道了为什么穷，还学到了分析问题的方法，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意识，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村民们参与干草收割机的质量检查验收（甘肃省）

摄影：王保军

项目实施的监测和评估

《参与式监测评估操作手册》确定了项目实施阶段监测评估的基本原则，关注社区与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合作监测和评估。重点是监测评估不同项目活动的进展、质量和成效，主要方法包括监测评估卡、表格与账簿，以及标准化的签字等。项目办在社区公开了所有监测评估结果、省市县以及世行项目办的监测电话。村民们被鼓励相互监督，这帮助村民进行有效的监测评估工作，确保项目工程建设的进度、质量和效率，减少了类似亲戚或者好朋友之间的干扰、偷工减料、隐瞒信息或者使用劣质材料等现象。

¹ 参见PRCDP手册附件中的PRA工具，www.itad.com/PRCDP/。

社区监测与评估小组以及受益村民在公路建设、提灌站以及幼苗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参与对于改进建设质量和建立社区的拥有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提灌站建设中，所有的工人都是该项目的受益者。当他们挖坝基的时候，他们挖到许多风化岩石，按照技术设计，坝基必须使用浆石填充。但是，承包商往往为了省钱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监理人员的认可使用风化石替代。村民强烈反对这样做，并通过监督举报电话报告了县项目办，最后承包商不得不购买浆石进行填充保证了建设质量。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公路建设。当承包商没有满足建设标准的时候，村民监测评估小组以及受益户代表拒绝在验收书上签字认可²。在这种情况下，建筑质量便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村监测评估小组和受益户代表也监督树苗、切草机以及其他从技术中心采购的设备的质量。村实施小组询价，监测评估小组实施质量检查，采购根据竞标和等值低价原则进行。例如，切草机是通过地方询价采购的。在县项目办监督下，社区成立了由实施小组、监测和评估小组以及受益户代表组成的竞标评估小组，通知三家投标者安排产品和提交标书，以及进行现场展示。竞标评估小组通过现场检验、询价和协商尤其是售后服务等情况，最后确定了采购合同。



村民一起参与坡改梯质量验收（甘肃省）

摄影：王保军

基于农户的项目（例如梯田、牛棚、水池以及集流场），则是以不同方式实施的。由于村民集资困难，存在为了省钱降低建设质量的风险。因此，除了村监测评估小组外，县项目办必须实施一些交叉检查确保质量。其中一种方法是非项目村人员开展的参与式监测评估，所有的评估结果必须向所有的村民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公开并获得反馈，另外的方法就是由县项目办采取抽样方式检查，抽检结果也必须向村民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公开并接受质询。坡改梯项目通过的当地竞标方式采购进行。一旦承包商完成一个地块，村监测评估小组将进行面积测定并评估质量。在某个阶段，县项目办将与社区的三个小组代表一起实施总复查和验收，形成剖面图并填写监测评估表格⁴。村民的签字认可是财务报账的前提条件。他们将在社区内部公开结果并邀请公众检查项目。县项目办将根据认可的建设质量直接支付资金给承包商。

² ‘验收’ 是最后的质量和功能检查。

通过参与式监测评估收集到的信息显示，100% 的农户受益于CWMP，但是程度不一。例如户均获得梯田4亩，畜牧项目只针对贫困户，贫困户每亩坡改梯将获得额外50元补贴等。至少16.23%的CWMP资金都用于贫困户活动。

尽管项目区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依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缺乏配套资金支持项目，一些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还必须使用以确保配套资金的落实。其次还缺乏CWMP相关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而这些部门均有不同的工作标准和制度。因此参与式监测评估必须面对这些挑战。第三，基于社区的参与式监测评估虽然由社区实施得很好，但是工作团队在能力上存在不足，包括缺乏相关技术、知识，以及没有必要的补贴鼓励。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甘肃省环县水务局
王保军

第二十章 水利部的视角

王 越

王越水利部国际交流中心的处长，也是CWMP中央项目办协调员。她在本文中描述了不同级别的机构在态度改变中面临的挑战。

介绍

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促进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整合群众生活与环境保护工作。过去，流域水土流失治理通常都是侧重技术方面，很少关注贫困问题。CWMP在甘肃省的四个项目县实施了参与式的小流域恢复规划以及替代生计和环境治理工作。项目也通过整合水土流失治理与扶贫以及农户参与等方式探索和总结了参与式小流域规划和社区主导的小流域治理和管理模式，并取得了可持续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效。

挑战

项目实施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包括：

- 如何与地方合作伙伴一起应用参与式方法。
- 如何整合流域治理与扶贫？

经过五年的实践，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挑战，项目的重大意义包括：

1. 它遵循了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将群众生计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有机的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建成和谐社会。
2. 它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好例子。项目是基于社区主导的，它改善了社区自治能力，提高了农民的自我发展技能，使社区能够可持续的发展。
3. 它完善了政府的服务功能。项目设计需要协调不同部门并整合不同部门的资源，实现了从控制一切到提供服务的转换。项目办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指导村民改善其环境提高其收入，创造了项目科学和标准化的实施机制。

加强了社区自我管理

项目在整个项目周期中使用了参与式的方法，建立了三个参与式机制：

第一，民主决策机制。该机制是为了促进科学决策理念建立和设计的。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主要问题，例如集资、投工投劳、公共事业等，村实施小组首先提出决策程序和方法，在通过举办社区会议咨询村民意见后才开始组织实施活动，所有活动都基于村民的共识。

第二，民主管理机制。该机制的建立和设计是为了促进管理系统化。村民开会选举了三个社区组织进行项目的自我管理,建立了具有激励性的机制，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和绩效指标来评进行民主评估，并对项目绩效做出相应回应。它建立和改进了相关项目的管理机制，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立。

第三，民主监督机制。该机制的建立和设计是为了促进监督过程。县项目办、村民和社区的三个小组以及自我管理协会合作促进项目管理的民主化，每个项目活动都进行了监测评估，结果也进行了公示。整个项目过程瞄准整合公共宣传、技术培训、生计改善和环境恢复治理，以实现流域内社区和村民生计改善的最大化。

因此，项目加强了社区内部的社会管理体系，加强了民主化进程，实施了基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项目改善了项目建设的管理体系，例如农村基础设施等，村级财务更加透明。

在这个过程中，小组讨论、社区会议和排序打分作为关键的参与式工具得到很好的应用。小组讨论为全体村民提供了分享不同想法和后续维护建议的机会，社区会议促进了社区达成共识，例如实施小组成员的选举、集资标准的确定等等。



进行野外调查（甘肃省）

摄影：王保军

意识的改变

项目已经改变了各个层面人们的意识，无论是省级、县级、乡镇级、村级和社区，尤其是不同层面的关键人员。人们相信参与式流域治理管理是实现协调的、可持续流域治理的关键。项目也促进了经济增长、思想解放和能力改善，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

农民的意识更加开放，自从流域治理以来，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服饰、日常饮食、住房和交通方面的变化。他们看到了邻里和谐以及社区乡土文化的保护。村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改善，

他们主动参与决策和项目管理，颠覆了村民不关心社区事务的观念。村民现在能够全盘考虑公共事务并处理相关事宜，主动参与相关决策。

社区学到了许多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引进参与式理念和实施示范项目，越来越多村民建立了自己事情自己做主的理念，能够有效的找到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水利部国际交流中心

王 越

电子邮件： yuewang@mwr.gov.cn

第二十一章 经验与挑战

刘永功

刘永功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授，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执行主任。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乡村发展研究，并关注扶贫工作的规划、监测和评估，以及自然资源管理。此外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也为相关的国家和国际发展项目担任顾问。作为CWMP顾问，这篇文章是他所观察到的项目经验与挑战。

CWPM 在甘肃省平凉和庆阳两个地区实施。项目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 利用参与式方法开发流域监测评估体系；
2. 在选择的小流域地区示范参与式的流域管理项目活动；
3. 推广与复制CWMP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我在2004—2007年作为国内专家参与了CWMP，本文总结了我在咨询过程中发现的项目经验与挑战。

流域保护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CWMP项目省、县和项目流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 首先，作为项目区的甘肃省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属于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为了维持持续的生计，村民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包括在坡地上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这种对坡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严重的植物退化并随之产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如何将扶贫发展、生计改善整合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是CWMP的重大挑战之一；
- 其次，除了水保局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政府部门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与流域管理有关，包括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和扶贫办等等。不同的部门有其自身的针对流域范围内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和计划。因此，对于项目而言，如何协调这些具有不同发展目标和计划的部门和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很好的机构合作和制度安排是非常困难的。同样，开发出一个各个关键利益相关者都接受的监测评估体系以及流域管理框架与理念也是非常困难的。
- 第三，流域与集水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很多行政层面和行政关系。例如，水利部、地处西安的黄河中上游管理局，省水保局、县水务局、流域涉及的乡镇政府和行政村等。要协调这些不同层面的行政机构来实现同一目标对于项目来讲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对于不同层面的行政机构来讲，开发出一个共同的监测评估体系也是很困难的。



王保军和村民交流（甘肃省）

照片提供：王保军

项目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CWMP尝试了创新性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方法。最主要的是，项目尝试了参与式规划和实施方法，并贯穿整个项目过程。调查了解现有的机构安排和制度安排以及现有的流域管理实践活动，以改善监测评估体系，并引进先进的流域保护模式。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小流域管理涉及到多个关键利益相关者和不同层面的协调管理问题。为了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战略，CWMP顾问团队及其合作伙伴需要系统的了解与小流域管理相关的现有机构合作和制度安排情况：谁是关键利益相关者？他们在流域管理与扶贫发展中的使命和计划是什么？他们对可持续流域管理的态度和兴趣是什么？过去他们参与过什么活动？如此等等。机构调查对顾问团队来讲是一个向相关关键利益相关者宣传的很好机会，尤其是CWMP的理念、监测评估体系等，以确保理念的可持续性。回顾和了解现有的制度安排和实践经验也很重要，以确保改进后的监测评估模式以及CWMP模式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和提高。

社区与资源利用者的参与及其与项目的合作

小流域内的农户和社区是自然资源的利用者以及流域管理和保护项目的受益者，他们在CWMP中的参与和合作以及监测评估体系的开发是确保项目可持续影响的前提条件，也是解决流域保护与资源利用者生计发展之间各种（潜在）冲突矛盾的关键手段。参与式方法在整个项目中得到了主流化的应用。

（1）社区与自然资源利用者在监测评估体系开发中的参与。项目顾问团队与黄河中上游管

理局共同准备了一个管理指标体系（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经济、贫困与生计方面的指标，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这些推荐的监测评估指标首先咨询了项目示范流域区的社区和自然资源利用者。例如，华池县的范庄，崆峒区的胡山沟。与此同时，项目也通过互动参与的方式收集了有关针对社区贫困和生计指标的相关的社会经济信息。

（2）流域保护和管理规划中的社区参与和最佳实践。基于开发出的小流域管理干预监测评估体系，CWMP通过与示范村的村民、贫困户和妇女合作，进一步实施了参与式流域管理与保护规划。村民在咨询和协商过程中的积极参与，确保了“综合保护生态系统和改善自然资源利用者的生计”的目的。从方法论看，社区参与和合作降低了小流域保护项目中社区对项目缺乏拥有感的社会风险。另外，社区与自然资源利用者的参与也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项目规划和实施方法。

（3）机构与员工能力建设与政府部门推广应用CWMP模式机制化的态度转变。在项目实施期间，CWMP总是特别关注通过外包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举办有多个关键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研讨会和培训，来进行机构和员工的能力建设。例如，甘肃省统计局受托实施了两个小流域的参与式定量贫困调查，甘肃省水保中心开发了与生态和资源相关的监测评估指标，ITAD公司与综合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的顾问团队签订了合同，确保这些实施机构的能力和技能支持，尤其是参与式工作方法。县水保局和乡镇水保站的技术人员参与了示范小流域的选择，实施了调查和参与式规划。

CWMP的目的是“影响中国政府和国际捐助机构实施有利于当地贫困人群的流域治理方法”。由于政府组织在开发和推广新的流域治理模式方面担当主要角色，改变政府部门对创新的参与式流域管理方法的态度是CWMP项目关键的机构战略。通过与水利部和黄河中上游管理局的政策咨询、政策研讨会等，CWMP极大的影响了高层官员对参与式方法和关注贫困的流域管理方法的态度。

政府部门对创新的流域治理方法的态度转变，是未来长期推广和机制化CWMP在监测评估指南、社区参与式规划过程和生态补偿政策等最佳实践的前提条件。政府部门通过CWMP发生的态度改变也建立了与国际捐助者针对多方合作制定因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对话的政策框架。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中国农业大学综合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刘永功

邮编：100193

电话：+8610 6273308

电子邮件：liuyg@cau.edu.cn



第五篇

专业人员的经验： 教育和卫生领域 的参与式方法

第二十二章 简介

卢彩珍 JOHANNA PENNARZ

卢彩珍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山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包括：1) 乡村发展与贫困研究; 2) 社会性别分析; 3) 参与式研究，参与性与地方治理; 4) 自然资源管理与可持续生计，以及 5) 气候变化与地方适应性研究。她用定量和定性方法从事研究，在国际刊物中发表多篇文章。

人类自主选择的质量是随着更高的教育质量和更好的医疗水平而提高的（Anand and Sen, 1997）¹。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教育和医疗都面临着重大挑战，特别是农村地区(Khan *et al.*, 1999)。农村地区过去的医疗和教育都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来提供的。

自从 1979 年集体经济瓦解以来，地方的医疗和教育在资金和人员问题上就面临着严重挑战。教学质量偏低和高昂的学费是贫困儿童失学的主要原因。医疗部门的情况也类似，富裕地区的人们享受着先进的医疗技术，而贫困人群连最基本的医疗护理都得不到。医疗费用的增加迫使贫困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尽可能少的去医院。生病但没钱看病，增加了疾病在社区内传播的风险 (WHO, 2006)。²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多项目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十一五规划”（2006-2010 年），的出台，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本的教育卫生情况的关注。

1999 年以来，人们开始关心教学质量。2002 年以来，政府为所有城乡适龄儿童推出了义务教育。在“十一五规划”中，政府实施了义务教育财政改革来解决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这些措施包括，将目标群体定位为贫困学生（而不是以前政策所定位的贫困地区），对所有贫困学生施行“两免一补”政策（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寄宿生补助一定生活费）。³

由世行和 Dfid 资助的项目侧重于引进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方法，特别是教师和父母对质量更好的教学的需求。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教学质量得到了改善，就会有更多学生去上学。

“甘肃基础教育项目”是 1999 年设计的，2006 年完成。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功地示范了以一系列创新办法和手段来提高甘肃省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基本的方法就是关注学校发展，关注参与式培训方法，为弱势儿童制定具体措施等。项目理念包括让社区参与到新课程改革与开发中，这一理念后来被整合到了“九年义务教育”推广中。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所说的“学校发展规划”，它被认为是弥补自上而下的分配政策（通过五年

¹ 人类动因是人类生活选择和对世界资源利用选择的一种能力。来源：维基百科。

² 世界卫生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健康、贫困和经济发展》，2006 年。

³ 详见：世行，2008 年，《“十一五规划”回顾》；世行，2009 年，《中国——教育部门回顾》。

规划)和当地需求之间差距的重要工具。⁴另外一项重要创新是引进了参与式教学方法,这在李建儒的案例中有详细描述。

下面的三个案例展现了以需求为导向的方法是如何改变从业人员的态度、角色甚至是行为的。

于登海描述了一种能够使当地妇女参与到镇宁县公共健康规划的创新方法。文章探索了参与式机构建设、管理,以及将健康知识融入到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办法。在镇宁县,妇女并不是当地医疗部门的目标人群,只有村诊所的一两个医生是负责她们的。然而,这些忙碌的村医很少有时间为妇女做健康教育培训。那篇文章讨论了健康促进小组和“示范户”是如何帮助妇女关爱自己的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的。

李建儒探索了大班中的参与式教学方法是如何挑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的。她描述了她是如何从传统的家长式的教学角色转变到协调角色的。学生不再像过去一样被动学习,而是更加主动的参与学习过程。李建儒的方法的目标在于促进沟、缩短师生间的心理距离。通过将参与式引入到日常教学生活,李建儒旨在帮助学生打开思路,鼓励学生创新,并为未来带来更多的正面变化。

王俊,王晓东,杨寰,于飞,林书,林小杰、文怡和杨宇提供了一个有关成都同性恋关爱组织的案例。这篇文章反映了参与进程中更具决定性的转变。文章描述了男同是如何介入到解决同性恋群体需求和优先性的决策过程中的。案例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该项目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在开始就参与的机会,因此这个通常情况下的脆弱群体和边缘群体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和行动者。文章还描述了这些参与者是如何在参与过程中提高自身能力的。

更多信息, 敬请联系:

卢彩珍博士,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山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 昆明黑龙潭

邮编: 650204

电话: +86 871 5223014

电子邮件: lucaizhen@mail.kib.ac.cn

网址: www.chinaagroforestry.org; <http://cmes.kib.ac.cn>

Johanna Pennarz

ITAD, Hove,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址: www.itad.com

参考资料:

Anand, Sudhir and Amartya Sen (1997) 'Concept of Human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Papers,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12 P. 2029-2049.

Khan, Azizur Rahman, Keith Griffin & Carl Riskin (1999)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form and Glob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89

⁴ 世行, 2009年,《中国——教育部门回顾》(p 42页), 学校发展规划不应该仅仅考虑常规职能和日常办公费用, 还要考虑学校和社区的具体需求(比如留守儿童和女孩辍学问题), 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资源等。学校发展规划的预算可以上交到县级政府, 最终再上交到省级政府, 等着中央政府划拨资金。

第二十三章 通过参与提高农村

妇女健康水平

于登海

于登海是贵州省镇宁自治县卫生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06年，作为项目协调人，他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卫生与性别公平性”项目。这个项目由瑞典大使馆海外发展部赞助。他在文中回顾了他的项目经历。

介绍：

根据2005年的政府调查，中国农村60%的劳动力是妇女。然而，约70%的农村妇女患有各种妇科疾病。提高农村妇女的健康水平不仅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提高她们整个家庭的收入也有重要意义。

“卫生与性别公平性项目”于2006年8月至2008年8月在镇宁县募役、本寨乡开展。¹该项目的目的是示范一种妇女参与卫生规划的可行模式，以此提高卫生行政管理者和卫生技术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卫生服务更好地满足妇女的健康需求。

项目中用到的参与式方法

在项目中，参与式方法被应用来调动妇女参与项目实施的积极性，提高妇女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工作能力。具体的做法有：

让妇女参与项目的实施

在项目的开始阶段，以村妇女主任、村医为基础，通过全村妇女民主推选对集体活动积极热情、性格开朗、能够代表多数农民妇女的代表，组成村妇女健康促进小组；同时推选家庭和睦、在村寨影响好、思想活跃、有较好的人际交流能力和卫生意识的家庭为“健康促进示范户”，参与卫生知识宣传。

参与式的制度建设和维护

经村民大会同意，项目活动经费让村活动小组自主管理，由县、乡项目领导小组监督实施，

¹ 本项目由瑞典大使馆海外发展部资助。

经费的具体使用必须通过村健康活动小组集体决定，组长、经办人和管帐人签字生效。

村级健康促进小组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健康促进“示范户”“恳谈会”，通过“恳谈会”把性别公平、卫生健康等知识传送给“示范户”，他们再结合她们的实际，把所学知识传播给村民。

建立健康之家，识别地方需求

村健康促进小组以“示范户”为基础建立健康之家，不定时组织村民“恳谈会”，采用她们认为有效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学到的健康和社会性别知识传播给村民。同时收集村民卫生服务需求，通过沟通机制与卫生行政部门沟通，改善卫生服务，满足村民卫生需求。

让参与方式贴近群众生活

在开展项目活动期间，我们发现当地群众热爱唱“山歌”，于是组织村健康促进小组和示范户把卫生健康知识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同时带头歌唱，把单调的卫生知识宣传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中，使健康知识的传播更贴近群众生活。

图 1 把卫生知识编成村民喜闻乐见的山歌



因时因地，结合实际，开展多种形式健康参与活动

春节期间，外出打工群众返乡过节，每个村健康促进小组都积极组织外出打工农民召开“恳谈会”，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在“六月六”等节日，村健康促进小组组织大型山歌对唱、其间穿插卫生知识抢答等比赛活动。示范户们还在村民红白喜事期间，以及田间地头

上与村民以“恳谈”的方式传播健康知识。

为孕产妇提供医疗服务

村级健康促进小组自发组成孕产妇救护队，在妇女临产前由健康促进小组成员动员护送到卫生院分娩。孕期、产后由村医和“示范户”负责开展孕期保健和卫生知识宣传和服务。

提供专业的生殖健康服务

根据村健康促进小组的要求，县项目领导小组组织县妇幼保健院深入项目村开展生殖健康普查、普治活动。经过检查，大部分妇女患有不同程度的生殖道疾病。村健康促进小组根据生殖健康普查的发现，组织开展生殖健康知识宣传，对患有生殖道感染疾病妇女发给治疗药品，对病情严重的妇女动员到卫生院治疗。

项目成效？

农村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意识和能力增强

经过项目多轮培训，各村“健康促进小组”成员及“示范户”卫生知识得到提高，参加项目活动积极性高涨，各试点村村民在“示范户”的带动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把维护妇女权利和卫生知识传播给村民。项目调查评估资料显示，有 97.7%的人认为项目活动的开展对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有所帮助。

图 2 示范户：刘正敏的案例

案例：本寨乡奋箕村格娄组刘正敏，一位曾经在赶场途中遇到生人都会因害羞而脸红的普通农村妇女，在村健康促进小组的动员下参加“示范户”，通过培训，激发了农村妇女共有的善良、仁慈之心，经常帮助周围群众。

2007 年 1 月，同村韦××家小孩突发剧烈腹痛，刘正敏用参加培训获得的知识判断，小孩病得不轻，需要立即就医，于是叫上村医一起把孩子送到医院，因护送及时，患急性肠梗阻的孩子得到及时治疗，避免了严重的肠坏死，小孩很快恢复了健康；

2007 年4月，邻居韦××怀孕后，她经常主动上门，把自己参加“卫生与性别公平性项目”活动获得的孕期保健知识传授给她，并动员她到乡卫生院进行产前检查，临产时与其家人共同送产妇到县人民医院分娩。经过这些事，同村的妇女都非常信任她，有什么难言之隐都会找到她，希望从她这里得到帮助。

妇女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项目实施初期，试点村 71.6%的妇女患有外阴瘙痒、白带异常、腰酸或下腹部疼痛、月经异常以及尿频、尿急、尿痛等生殖道感染症状。终末评估调查结果显示，试点村有 50.8%已婚育龄妇女有生殖道感染症状，低于对照村 59.4%和基线调查的 71.6%，试点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率下降。

当地卫生机构对妇女需求的回应得以提高

乡卫生院为了满足试点村妇女卫生服务需求，加强乡卫生院妇产科、检验科的建设，并及时安排妇产科、检验科业务技术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提高其服务能力和质量。支持村卫生人员开展生殖道感染防治、咨询服务，以满足妇女卫生服务需求。

卫生决策层责任感增强，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改善

通过项目的实施，卫生决策部门加深了对维护妇女健康的认识，新修订的《镇宁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办法（2008）》，²对当年出生未能缴费的新生儿给予补偿；对农村双女结扎户、独生子女户，补偿比例上调 15%。同时把县、乡计生服务站纳入合医定点机构，扩大妇女生殖健康服务机构，大大改善了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筹资的公平性。同时为项目乡卫生院配发 B 超、化验仪器、产床及消毒车等医疗设备，并安排妇产科业务技术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

社区凝聚力增加

项目实施为项目村建立了新的人际交往的桥梁。加强了居民沟通，增进了感情的交流，也减少了矛盾冲突。据参与项目的群众反映，她们现在和邻居交谈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关系也更和谐了。

主要反思和经验

发挥当地政府在项目实施中的主导作用

项目实施初期，我们开展了县、乡领导和相关部门社会性别知识培训，目的是使其提高认识，积极支持项目活动。经验表明，这个策略十分有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村委会始终非常支持并积极参与项目活动，用丰富的组织经验帮助村活动小组开展工作。

专业的健康培训至关重要

“健康促进小组”和“示范户”人员都是村民自主推选出来的，但她们卫生知识匮乏，也缺乏工作技能。所以我们在项目开始阶段就为她们进行基础的健康知识培训，并把这些知识和当地的传统知识系统整合起来。

精心推选健康促进小组和示范户

项目一个重要的成功要素是推选健康促进小组和示范户。通过农户自主推选对集体活动积极热情、性格开朗、乐于奉献、能够代表多数农民妇女心意、卫生习惯良好的村民代表，参加健康促进小组和示范户，保障了项目活动的有效开展。示范户的言传身教可以逐渐改变村民卫生习惯。

尽管不少“健康促进小组”成员和“示范户”的文化水平较低，但由于她们采用贴近群众生活的山歌和面对面的“恳谈”，选择走亲访友、串门或田间休息地为“恳谈”场所，用典

² 自 2002 年起，中国逐步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型事例、“实话实说”进行交流，使得健康知识可以深入到社区家家户户。正是她们，通过将健康理论知识结合本地实际，逐渐改变了村民的卫生习惯。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贵州省镇宁自治县卫生局
于登海

第二十四章 大班额条件下的

参与式教学应用

——来自小学老师的经验

李建儒

李建儒是甘肃省玉门市第二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在参加 2006 年的中—英九年义务教育项目之前，她已经拥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自从参加这个项目以后，她就一直尝试将参与式教学应用到小学教育实践中。2008 年 10 月，她荣获了优秀教学一等奖。

2007 年 7 月，我参加了中英初级基础教育项目的培训。在那次培训中，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参与式教学的理念。我被它民主的内核、新的教学组织方式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深深地迷住了。为了探索这种参与式方法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潜力，我决定在我自己的学校开始一个试点项目。我决定把我从这次培训班上学到的一些方法应用到我所教授的语文课上。

“参与式教学不适合大班额教学。”这是许多参加过参与式教学培训的老师给出的论断。理由是班级人数太多，参与过程不易控制。但是，如果老师们简单认为参与式教学就是游戏、表演、分组讨论，那就错了。我认为参与式教学关键是要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主动参与、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

通过我两年的实践，将参与式方法应用到小学语文教学中，我发现参与式教学同样适合大班额的教学。下面是我从试点中获得的一些经验。

创设一个宽松环境，营造心理安全氛围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中，教师必须学会蹲下身子去看学生站在学生的角度观察世界、对等交流，要宽容学生的过错，欣赏学生的精彩，消除学生的疑惑，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望，开阔学生的视野，鼓励学生的独到见解，实现师生间的有效沟通，努力缩短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促成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

可在教学中采用如下方法：

- 创设宽松环境，激发学生兴趣
- 鼓励质疑问难，培养主动思维能力
- 体现班级民主，用语言激励学生参与

一些鼓励协助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方法：

角色扮演

我曾经试过一个“小医生”的角色扮演。让学生自己来当“小医生”，给错字的“病情”开出处方，让孩子们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趣味盎然的主动参与学习。



学生以“小医生”角色纠正拼写错误

摄影：李建儒

我的学生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个游戏是“小导游”的角色。在介绍一些风土人情、人文景观的阅读课时，让学生以“小导游”的方式来带领其他学生，通过图片或录像学习各地的风土人情。



学生以“小导游”角色通过地景影像学习

摄影：李建儒

“小老师”的角色扮演也让我的学生们很感兴趣。请“小老师”带着大家学生字，再由全体学生评判，这样的“师生反串”无疑会给课堂教学注入民主、平等、和谐的新鲜空气。

边做边学

在我的试点教学中，我还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参与式方法。

挑选精彩片段，让学生“画一画”

教材中不乏写景状物、文字优美的篇章及段落，让学生在理解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把“话变成画”。学生在参与读、想、画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更体验了语文课中的创造之乐，艺术之美。

动手实践，让学生“试一试”

过程的体验可以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比如，在教授《乌鸦喝水》时¹，先让学生做一做小石头使水位上升的实验，弄清这是为什么，自然就明白乌鸦为什么能喝到水了。

¹ 一个传统的中国故事。



学生实践乌鸦喝水的故事

摄影：李建儒

合作讨论，让学生“议一议”

怎样才能保证小组合作学习的效率？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是大班额条件下研究、改进的重点。我发现，要保障合作学习的效率，合理的分组、角色的指定非常重要，同时评估过程，而不是只简单对结果做出评估，也是成功的关键。

★ 让不同能力的组员一起工作

我将班上 64 名同学分为 16 组。每四人为一组，在四人小组中，安排一个高分生、中等生和低分生，做到组内异质。组与组之间的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学习成绩、思维程度、性别大致均衡，做到组间同质。组内异质有利于学生的相互合作彼此争论、互教互学。组间同质有利于各小组之间的公平竞争。

小组实行小组长负责制。自主分配角色，提出自律要求，为课堂教学中的合作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学生扮演猫和老鼠

摄影：李建儒

★ 有效的参与过程

要使每个学生在小组中充分参与，就需要教师在设计研究的内容时考虑到有一定的难度，问题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引起学生参与兴趣，引发学生思维的展开，并使学生通过操作、讨论等激烈的思维活动后，能尝到成功的喜悦。



在小组工作中，老师和学生互动

摄影：李建儒

★ 恰当的小组评价方法

教师需要开发出适当的评估方法。从我的经验来看，适当的评估方法应该是：

（1）评估小组而不是个人。

（2）注意对小组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反馈。

（3）评价方式应多样化。可以采用观察、谈话、作业分析、星级评定、考试等多种形式，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精心设计学习环节，创设积极探究情境，协助学生深入参与

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的进行学习活动。在兴趣的驱使下，学生自行查找资料，自行组织讨论，自己动手制作，这样学生对相关知识掌握了，探索能力和创新思维也得到充分锻炼。

充分利用课程资源，为孩子们创设探究学习的情境。

我在教授《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一课时，因为是一篇环保主题的文章，我就结合学校实际设计了一节《校园环境保护宣传》，让学生自选完成宣传画制作、设计宣传标语、起草倡议书、制作环境保护手抄报等形式的探索实践活动，推动学生全员参与，大大增强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课堂前后延伸，协助学生课外探究，拓宽学生参与的广度

有效的课堂教学要求课前参与、课上讨论、课后延伸的有机结合。这样就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同时我还协助学生在课外对所学内容进行深入体验、探究、创造，让语文走进生活。

结论：

综上所述，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协助学生自由地、主动地、深入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才能使学生在参与探索知识、获取知识的同时，情感得到陶冶、才智得到发挥、潜能得到开发、素质得到提高、知识得到积累。我坚信，只要我们真正领会了参与式教学的理念，大班额条件下的参与式教学就必然能够大放异彩！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甘肃省玉门市第二小学

李建儒

第二十五章 基于赋权的参与：

成都男同关爱组织

王军 王晓东 杨斗 于飞 林树 林小杰 温益 杨宇

王晓东是成都同性恋者关爱组织(CGCO)的负责人，王军、杨斗、林树、于飞则是部门负责人。他们一直负责实施 DFID资助的艾滋病预防项目。CGCO成立于2003年，是一个基于社区的组织，由当地的男同性恋者组建。赋权一直是该机构的指导原则。CGCO在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有关同性恋者权益和决策权等方面的角色一直在稳步形成，同时在建立中国男同性恋区域和全国网络方面担当领导角色（中国男同性恋健康论坛）。

赋权，目标群体参与和贡献的核心

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参与式方法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发展实践中。但是，目标群体的介入常常只是象征性的，作为决策者更是，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同层面的权利差异，许多参与式项目常常都是相对性的“参与”，目标群体被动实施，多数最弱势群体的地位和作为决策者的状况通常都是最微弱的。为什么要改善目标群体的参与的主要原因，就是目标群体实际参与并不多，并且没有从中足够受益。我们的项目就是要尝试真正做到这点。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计划署的总结和其他少有的报告 (Roey, 1999)，目标群体具备相应条件的参与或者获得参与机会，可以分为六类，参与层面由低到高的顺序中最真实的参与就是赋权。

- 目标群体作为知情者
- 作为贡献者
- 建议者
- 实施者
- 专家
- 决策者

不同层次的权力是不同的，目标群体作为知情者是最强的，而作为决策者是最弱的。目标群体从项目中受益很小的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定位在前三种身份，很少有机会成为实施者或专家。

真正的参与必须以赋权作为核心，目标群体应该在项目最初期就具有针对项目设计和实施表达其意愿的权利。他们应该被视为专家，他们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相关信息、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建议应该与其他政策和规划专家的意见具有同等价值。通过这种方法，目标群体成员就可以蜕变为项目的真实拥有者。他们能够逐步与其他支持机构和人员合作将项目思想融入其实际工作。只有这样，参与式方法才能可持续并发生真实的变化。

CGCO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案例。CGCO实施了艾滋病预防项目以及男同性恋社区的关爱工作。目标群体以自我管理方式参与到了CGCO的所有工作环节中。

怎样赋权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自我管理项目

当DfID首次开始准备支持成都的男同性恋社区开展关爱与艾滋病预防项目的时候，就决定了自我发育的CGCO应该全权负责项目的设计、执行和管理。DfID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监督和评估。

CGCO的核心成员已经非常熟悉当地男同性恋社区的情况，这成为项目设计非常重要和具有影响力的资源。项目在初期就成为具有高度接受度和认可感的项目。项目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和项目目标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同时能够避免可能阻碍项目目标群体参与问题的出现。许多男同性恋不仅接受CGCO提供的项目服务，而且作为志愿者主动参与社区项目工作。在过去不到三年时间里，CGCO为至少一万名当地男同和登记人员提供了超过200人次的志愿者咨询服务。



志愿者和社区代表在讨论表决组织管理制度

摄影：CGCO

利用男同群体的知识作为基础，CGCO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艾滋病预防和男同关爱模式。该模式扎根于男同群体，通过广泛的综合性干预措施和服务来实现。它不受限于常规技术理论和国际流行做法。该模式提升了艾滋病预防和男同关爱项目的标准，为其他国家建立了一个仿效的例子。

DfID 通过为CGCO提供专业技能支持、项目管理和机构管理的能力建设等，进一步贡献了目标群体参与的水平。对于CGCO来说，机构发展支持是非常关键的。



Photo: CGCO



Photo: CGCO

CGCO进行年度工作和财务报告会议，并接受大家的质询;CGCO通过组织有趣活动动员社区成员参与项目

通过开放和民主治理来扩大社区成员的参与

必须强调，类似CGCO的同性恋自我管理关爱组织必须强调来自目标群体持续的主动的参与。对资源和权利的控制必须减少（个人或者核心人员），它不应该是没有真实影响的空洞参与，不应该阻碍组织内部其他人员参与决策。尽管组织在成立初期就采取了包容性的方法，其领导人也主要来自社区成员，但仍然需要一个治理结构和程序确保社区成员分享社区权力。

CGCO 对此特别关注并得到了DfID的支持。CGCO通过社区大会制定了成员参与的制度和办法，触及了广泛的志愿者和社区成员代表，并由他们来审查和批准具体制度和办法。社区会议也选举了监事会来监督CGCO的日常工作。同时为了便于保存，CGCO也要提供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要求志愿者和社区代表提出建议。在年度会议上还要对优秀志愿者进行表彰。这极大的提高了社区成员参与的水平和工作热情。

让更多的目标群体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从2006年接受DfID支持开始，CGCO就开始涉足区域网络和政策制定工作。

首先，在DfID的支持下，CGCO对四川省的男同社区和艾滋病预防与男同关爱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基于调研结果，CGCO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提交了一个建议书，建议在全省实施一个艾滋病预防和男同关爱项目。四川省人民政府对此建议予以了高度重视，不久，项目在全省启动，CGCO对此功不可没。

CGCO也在DfID的支持下，在11个城市帮助男同群体建立了男同的社区关爱组织。CGCO为这些关爱组织提供能力建设以及帮助他们与当地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建立工作合作关系，并为其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服务。在全省推广这些工作的同时，CGCO特别注意参与和赋权的模式和过程，强化当地机构对项目的拥有感，确保这些机构日常工作的独立性。CGCO艰难的尝试了建立双边互助和平等合作的工作网络。

由于CGCO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和经验，因此能够参与高层的决策会议。2007年，中国艾滋病预防中心(NCAIDS)组建了一个由来自四个艾滋病社区的土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并与该中心合作形成了一个国家级的艾滋病预防和男同关爱项目。其中两个土专家都来自CGCO，并承担了主要工作。同年，CGCO的负责人王晓东作为专家组成员和男同社区代表应邀参加了NCAIDS的咨询会。2008年，CGCO受托起草了中国男同与艾滋病预防和关爱战略建议书。

CGCO也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启动了中国男同健康论坛 (CMTHF)。CMTHF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男同社区组织协会。该网络也是男同社区参与国家级相关决策的重要平台。CMTHF包括了全国至少20个男同社区组织。作为CMTHF的重要成员，CGCO提供了相应的工作人员，包括CGCO前对外工作部主任王军是CMTHF的秘书长。CGCO也为论坛提供必要的活动场地和硬件支持。目前，CMTHF的行政秘书也来自CGCO办公室。

实施基于目标群体需求的研究

DfID 也支持了目标群体关注的一些应用研究。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以及DFID的支持，CGCO已经实施了诸如男同社区规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传染风险因素分析和多种干预措施模式及其有效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研究结果为其他专家开展更多的科技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这是因为CGCO的研究工作反映了男同社区的实际情况，考虑了影响男同行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更具现实性和应用性。

现状

DfID不再是CGCO的最大资助者并将逐步退出，但是非常感谢其提供的工作模式以及能力建设。CGCO已经是一个独立性的机构，并成为中国艾滋病预防和男同关爱领域最突出的领导者。

CGCO今后的发展是成为更加专业的社会工作组织，这意味着要培训来自男同社区的志愿者成为全职的社会工作者，并建立更加熟练的工作部门，以及组织内部的人员和责任分工。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提高将要求目标群体接受更多的专业知识，社区事务将管理得更好，具有更好的参与。这将使得男同社区的关爱工作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结论

DfID支持CGCO工作的成功表明，参与式工作方法的核心必须是赋权，将权利还给目标群体，规划与实施过程必须关注目标群体。但是，权利的有效使用依赖于社区具备足够的条件包括能力和制度安排。因此，目标群体的能力建设是最为重要的工作，以确保能够治理和管理好自己的社区。

为了评估项目，我们需要观察和研究以下领域：

- 项目是如何改善目标群体能力的？
- 目标群体是否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并更好的利用了这些权利？
- 目标群体的参与水平是否提高了？
- 参与的范围是否提高了？（当地/区域/国家/国际层面的决策信息和知识状况？）
- 是否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在社区内部建立分权机制，是否发现了更广泛的社区参与？

- 目标群体的意愿是否实现了？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成都男同关爱组织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开寺街88号

电话 / 传真：+86 288662—7577

电子邮件： cd_homoheart@yahoo.com.cn

参考文献：

Roey, J. (1999)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Greater involvement of people living with or affected by HIV/AIDS (GIPA).' *UNAIDS Best Practice Collection*: Geneva, Switzerland.



第六篇

大规模推广： 参与制度化的途径

第二十六章 简介

JOHANNA PENNARZ

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参与式方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仅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还因为政府工作方式的繁琐与复杂。由于村级发展规划推广的失败（详见第一篇），人们普遍认为，参与式方法无法自上而下实施。它要求人们改变态度、思维和行为，并从实践中学习。

试点项目是中国学习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试点通常是规模很小但能够产生大范围变化的。中国政策喜欢用实际示范项目中的证据来支持政治议程。实际效果可以拿来作参考并进一步推广，以期产生进一步的变化。

昆明研讨会举办时，正是参与式经验在多个部门和机构中开始显现的时候。然而，将这些实践和行为制度化的关键一步还没有走出来。在昆明研讨会期间，与会者指出了大规模推广参与性的潜在好处和可能遇到的挑战。总体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比以前更加有利于公民参与。昆明研讨会注意到，中央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扩大政府服务职能”等政策都是推广参与性的有力因素。在这个议题下，王越的案例显示了，在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上，这一参与式试点项目是被看作合法的、有用的。与此同时，参会者也强调了推广参与式方法所面临的挑战。

对能力建设，以及大量的咨询的财政支持通常是不足的。邓维杰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政府的雄心壮志与实际可利用资源之间总是存在距离（详见本章邓维杰的案例）。

因此，先前参与式方法推广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力有限。广西区的案例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通过机制化学习的方法来克服能力障碍。广西的案例提出了一种创新性办法来解决能力有限，那就是将学习制度化。广西非常重视能力建设，以及通过权利下放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方法的学习。参与式方法已经在广西区得到推广，并开始影响其他扶贫项目（详见本篇中黄灿滨和周菁的案例）。

如同大多数通过很多层级传达下来的政策一样，上级提供基本的指导原则和目标，下级则保留相应空间确定详细的实施内容。广西区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遵从参与式方法的要求是如何从省级传入到县级的。这是通过一份官方文件推动的，这份文件在过程要求上是概括性的，但对双方的角色和责任是明确定义的。这种方法是讲求实效的：它给了地方政府空间来让他们设计出最适合他们的实际办法。通过给下级单位提供空间，让他们来开发具有创新性的实践，省级单位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并通过学习系统进行了分享。¹

在多部门合作的扶贫项目中扩大参与性存在着挑战，为了满足社区的综合需求和优先需求，

¹ 参见第33章——培训者秘笈。

不同部门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而挑战就在于如何协调这些不同措施。目前的财务制度不支持协调和跨部门项目合作（详见第三篇案例）。世行支持的CDD，提供了一种对社区直接进行报销的办法来克服这种公共财务限制。因为直接给社区报销，并让他们根据综合的发展规划来使用，这种办法解决了财务问题（详见本章李辉的案例）。

有关公信力的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地方治理是扶贫的一大挑战。以前的评估显示，大量资金分流到地方政府，但没有足够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监测能力来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详见世行/DfID报告，2009）。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Johanna Pennarz

ITAD, Hove,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址： www.itad.com

参考资料：

'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 agenda' *An assessment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World Bank

第二十七章 社区主导式发展在中国扶贫中的实践与探索

李 辉

李辉是国务院扶贫办(LGOP)外资项目管理中心(FCPMC)的副处长。FCMC 负责在国家层面协调管理整个中国的国际援助扶贫项目、实施示范项目（例如 CDD 示范）。因为其过程将影响到相关政策，这个层面的工作意义重大。在世行资助的 CDD 示范项目中，李辉出任了国家级协调员。她的案例介绍了项目执行中的机构障碍（类似第三篇中的一些描述）是可以通过创新方法克服的。

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强农业生产，确保农民受益和社会的安全稳定。¹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扶贫的进程开始加速，在2001-2005年期间，扶贫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社区层面，至少还存在五个问题和障碍：

- 传统扶贫项目中社区的参与还很低，多事情况下的社区参与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户的集资以及投工投劳的问题；
- 社区能力还很低，社区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以及自我监督方面还很不充分；
- 针对贫困社区的社区发展基金严重不足；
- 缺乏瞄准贫困群体的情况依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 社区层面缺乏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文本框 1 社区主导发展模式 —— 世界银行

社区主导发展模式（CDD）是一种支持参与式决策、地方能力建设和社区控制自然资源管理的一种发展方法。这个方法具有五个基本支柱，包括社区赋权、地方政府赋权、社区中心、公信力与透明度，以及边做边学不断提高。基于这些支柱，CDD 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并具有广泛影响的社区动力，并为社区提供相应的工具，使社区成为自我发展的代理者（自己代表自己）。对 CDD 的支持通常包括：社区小组的能力建设、通过政策和机制改革创造工作环境条件（分权、部门合作等），以及加强地方政府合作关系，包括建立基于社区的组织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世行项目框架下，CDD 项目通常都是通过社区基金获得财务支持，社会基金直接支持小型的社区管理项目，允许社区贫困户主动直接的介入社区发展活动。

为了澄清社区贫困方面的问题，国务院扶贫办与世行合作启动了社区主导发展示范项目。该

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www.gov.cn/english/official/2005-07/27/content_17712.htm

项目启动于2006年5月，投资额度大概为4400万人民币，覆盖四省 / 区四县60个重点贫困村（广西区靖西县、四川省嘉陵区、陕西省白水县和内蒙古翁牛特旗），完成于2009年6月30日。该项目包括三个主要领域：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基金，以及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改善等。本项目的具体目标就是应用社区主导方法通过动员社区潜在的社会资源和改善当地治理水平，来开发、探索和建立可持续的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机制。

项目的创新和主要活动

基于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为其提供创新地位的精神和原理，以及基于国际上社区主导式发展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项目的创新和主要活动包括：社区基金控制管理、监测过程、透明、支持体系以及能力建设。下面将有更加详细的描述。

• 控制社区基金的权利

-  村民自主讨论形成基金管理方法，并民主选举了管理人员；
-  建立了专门的社区监督小组，随时检查基金的使用情况；
-  在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组，社区建立了各自的项目账号来管理这些基金；
-  在符合社区所有相关要求的情况下，县项目办必须无条件将资金一次性拨付到社区账号中；
-  账号、存折和密码由三个不同人员掌握，项目资金只有在三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支取出来，以确保资金安全；
-  社区必须迅速了解资金使用情况，并监督资金的使用。

• 决策权

CDD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由社区做出全部决定的扶贫项目。它赋予社区最大的权力来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社区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建立了项目机构，这些机构包括项目实施小组、项目监督小组和自然村的项目管理小组。这些项目组织负责项目的实施、组织、管理、后续维护管理以及项目的监督和评估。社区形成了系统的社区公示、举报等制度，所有主要事务必须通过社区大会讨论确定。

• 开放和透明的公示与举报机制

公示制度在整个项目期间都要有效运行，使得所有应该公示的内容都公示给全体社区村民。在项目设计阶段，资金的使用和相关的决策都在社区范围内公示，以确保社区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其次，社区还专门建立了一个举报机制，负责举报的人员名单都提交给了世行、中央项目办、省项目办和县项目办，相关信息（联系人员名字、地址、电话和传真）社区都知道。举报的渠道也是公开的，并有相关的程序和制度规范举报行为，以保护合法诉求、促进快速反馈和行动。

表 1 传统模式和CDD模式在参与方面的比较

内容	念力村(CDD项目村)	其龙村（传统项目村）
1. 规划阶段		
受访村民介入规划阶段的%	100%	69%
基线调查	98% 受访村民清楚项目目的、内容和投资情况。	31%受访村民清楚项目目的、内容和投资情况。
项目管理制度的开发	100%介入相关讨论	24%以不同方式介入
2. 实施阶段		
当地村民优先需求？	98% 认可	35% 认可，但是27%认可上级的安排
项目经费管理	98%满意透明度	35%满意透明度， 27% 一无所知
当地参与的兴趣	83%受访者有兴趣	24% 受访者有兴趣，但是只有34%村民接受过访谈
社区集资	100%认可（限其优先兴趣）	14% 认可，但是45%不认可，或者认为很困难
3. 监测评估阶段		
监测	98% 介入监测， 100%清楚资金被社区监测小组很好的监测	24%介入监测，但是29%清楚资金被社区监测小组很好的监测
项目拥有感	100%认可	31%认可
举报途径	96%知道举报电话， 85%知道从哪里获得电话号码， 85%对此满意	27%知道举报电话， 22%知道从哪里获得电话号码， 33%对此满意

• 社区服务体系来支持社区能力建设

CDD项目认识到了社区对CDD的理想意愿与社区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项目建立和改善了针对CDD的社区服务体系，来加强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监督的能力。项目给每个行政村安排了一位协调员，宣传相关的项目制度和信息，并为实施社区工作提供支持。县项目办的主要功能是服务、协助、指导和监督，并负责对协调员的检查和工作验收。项目创造性的引进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县项目办和协调员提供的培训和技术指导服务，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计划、行动援助和世界宣明会等。县乡层面的项目支持小组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为社区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服务。

• 探索新的改善能力的机制

CDD项目探索了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能力建设的新机制。通过这个持续的实践，社区与农民积累了相关经验，逐步建立了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监督的能力。项目

按照项目周期执行，目的是通过重复项目申请、评估和选择、实施、管理和监督过程逐步改进社区能力。社区组织变得更加强大。

项目成效与影响

经过三年的示范，项目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包括社区生活条件的改善，生产能力的加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关系和谐，多数人群参与的愿望得到推动，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得到显著改善。

- **基于社区的决策已经得到加强，社区更加具有拥有感**

由于社区获得了相应的权利，进行有关项目的讨论和决策，他们变得更加主动与积极。社区改变了传统的“等、靠、要”的习惯，开始变得更加拥有责任感。正如广西靖西县一个村民所说：过去都是政府修路，他们让我们参与他们的的事情，所以我就要求付我们报酬。现在是我们要修路，政府是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了。广西区靖西县传统项目运作方法和CDD运作方法在进行扶贫项目的两个村之间比较（念力村和其龙村），显示了CDD项目村具有高水平的社区参与性。²(见上表)。

- **基于具体社区的决策已经深入贫困户并反映了他们的需求**

社区控制资源并进行相关决策，这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这是以人为本的，尊重农民意愿的，解决了农民最关心、最紧急和最需要的问题。它使得政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人们的需求更加一致。我们在广西区的调查发现，至少98%的受访者相信项目实施的都是项目社区最需要的，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100%的村民主动集资来支持项目的实施。陕西省白水贺家卓村的村民指出，项目的程序虽然很多，但是这个过程帮助村民解决了具体问题。

- **基于社区的基金管理更加具有成本效益**

通过将项目资金管理权直接交给社区，社区的责任感和拥有感得到加强。社区主动整合内部资源包括投工投劳，集资、技术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很多社区自建项目的成本更低，资金使用的效果更高。例如，广西靖西县项目村的水池建设项目通常需要15万元，由于村民投工投劳，成本只有4万元，不到原有预算的30%。技术部门对其建设质量给予很高的评价。

- **内部外部监督确保了资金的安全**

社区举报机制也体现了项目存在的挑战：有些社区基金被社区实施小组内部少数人控制，基金的使用不透明，项目实施的质量很差。项目施工队的选择也不透明，村民对施工工作存有疑问。省、市、县项目办对此实施了详细的调查并有效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因此，社区的兴趣得到了保护，自信得到巩固。

- **过程方法加强了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² 调查由广西区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在2008年9月23-24日利用问卷表进行的。这两个村位于两个邻近乡镇，社区基本条件类似。例如，地理位置、民族、生产和生活条件、贫困状况、生活习惯等。两个社区都实施了公路项目。念力村共发放49份问卷表，回收47份，其龙村发放50份回收，49份。样本农户占全村15%，问卷表在相对富裕、中等和贫困户中随机选择发送。

社区承担了广泛的项目管理工作，他们建立了社区监测小组和公示举报制度并实施实际的监督。社区也通过财务管理培训、投标、工程设计、监督管理和其他管理技能、种植养殖技术等改善了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陕西省白水自然村的实施小组指出，现在我们自己能开发项目建议书，我们学到了很多有关财务、投标、采购，以及工程方面的知识。以后，即使没有社区协调员的支持，我们也能实施项目。

• 项目过程加强了基层民主建设

诸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以及自治管理和监督等实践已经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此外，更多诚实、有能力和热衷于公共事务的人被鼓励参与社区公共事务，项目管理机构逐步变成村委会的一部分。因此，基层社区广泛的民主得到加强，更多的社区成员介入到这个过程中。

• CDD项目减少了冲突，促进了和谐发展

开放、公正和透明的理念得到了遵循，公示和举报制度在项目期间得到应用。这也确保了社区决策、项目管理和监督等制度得到执行。因此，项目避免了个人干预公共事务，通过这个过程，项目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尤其是对项目机构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和项目实施的信任。政府不再为群众做决策，而是为社区提供服务和支持。广西区靖西县念力村的支书说道：通过这个项目，我已经变得更加有威望。项目是开放和透明的，群众信任我们，没有人再骂我们。通过实施和管理委员会以及项目实施小组的建立，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因为他们会组织群众召开会议并实施项目。此外，所有人通过讨论贡献他们的思想和建议。许多村民说，未来的项目也可以采纳CDD方法来做。

经验和教训

通过三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相信，社区主导式的扶贫发展模式可以有效的解决中国在瞄准扶贫对象、参与和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经验非常值得推广和应用。示范项目的主要经验包括：

- **良好的动员宣传是关键。**CDD项目使用多种手段向社区宣传项目的理念、方法和内容，例如召集村民大会、建立公示牌、社区广播、入户调查、小组讨论、动员支委成员等关键团队等。通过广泛的信息宣传，社区了解了项目的核心与精髓，社区得到很好的动员来参与项目。
- **充足有效的培训是基础。**国家项目办培训县级项目办和非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培训县项目办，社区项目协调员培训社区基层组织和社区。多视角和多方法的培训包括CDD项目理念和方法、项目流程和要求、参与式工作方法、技术、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和采购等。培训用不同方式进行，例如专题培训班、野外（会议）培训、野外调查和结对教育等。
- **各方意识必须改变。**政府必须考虑群众并建立以服务为本的意识。同时需要清楚各方的责任，加强彼此关系并确保相应标准等。农民必须改变他们的意识。通过转移财物管理权和引进竞争机制，社区的等、靠、要思想已经变成“自己事情自己做”。
- **制度是保障。**清晰的项目核心内容和项目过程的管理制度确保了CDD项目的顺利实施与推广。这包括明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责任、确保各方将决策权移交给社区。形成明确的基金的管理方法是非常必要的，确保社区的财务控制权利。最后，确保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是非常必要的，包括竞争制度、公示和举报制度等，以确保公正、公开和

透明。

结束语

CDD方法已经开始在扶贫发展工作中，甚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初见成效。并为更多的农民、研究人员和各级政府所认可和欢迎。短短三年时间，CDD已经从四个县60个示范村扩大到九个省140多个县1000多个村，并从扶贫领域推广到其他与农业相关的社会经济领域，以及从外援项目推广到政府项目中。不过，是否能够推广应用到扶贫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甚至政策层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践。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

李辉

电子邮件：sarahui@sina.com

第二十八章 广西参与式学习体系

黄灿滨 周青

黄灿滨是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也是广西 PRCDP 的项目经理。周青是该中心的一个项目官员，主要负责 PRCDP 的筹备和相关的培训工作。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开发了一系列参与式工作方法的培训教材，包括：1) 参与式乡村规划手册；2) 参与式项目管理与监测手册；3) 参与式验收和评估手册。这些手册被广泛应用于广西参与式项目的管理中。在本文中，黄灿斌和周青总结了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如何通过分权和以行动为导向的方法来将参与式学习制度化。通过这些方法，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成功地将参与式方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应用，并对国家的扶贫项目产生了积极影响。

背景介绍

2005 年，广西 PRCDP 开始尝试在项目设计、规划、实施和管理中使用参与式工作方法。该项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提高项目组织机构和地方村民的参与技巧。通过组织和建立参与式方法学习体系，使参与式理念和方法持续运用于项目建设，在项目实施管理工作中发挥显著的作用。下面描述的就是如何建立这样的参与式学习系统，以及该系统在项目实施阶段和项目结束后如何发挥作用。

加强机构建设，稳定协调员队伍

从项目准备伊始，广西 PRCDP 项目区、县、乡的各级项目实施管理机构，都极其重视队伍建设，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出台了一系列补充和稳定协调员的措施。尽管历经了政府的多次换届工作，但每个县、乡机构都能保证有参与式骨干协调员坚守在项目管理的岗位上。

加强协调员队伍培训，提高其参与式技能和工作能力

培训包括协调员技能培训、规划能力培训、实施管理过程的参与式培训、监测和评估的参与式培训等。同样重要的是有会必讲参与式，让讲项目参与式成为一种工作“习惯”。

不断总结和交流，推动项目区参与式工作全面开展

总结交流参与式村级规划的经验 and 典型案例，形成可供推广的方式方法，编写《广西项目区参与式村级规划操作手册》，指导项目区开展参与式村级规划工作。同样，通过总结和交流参与式项目实施的经验和案例，制定《广西 PRCDP 社区参与式项目实施管理操作指南（试行）》，并以正式文件下发各有关项目机构执行，规范项目实施的参与式工作。

建立项目参与式交流平台，不断推动参与式学习体系建设

通过项目参与式，实施案例汇编、出版项目工作简报、扶贫信息网站交流、召开工作会、交流会、专题研讨会、省际、县际的学习考察、举办培训班等方式，不断推动参与式学习体系建设。



广西瑶族社区，瑶族曾经是广西最贫困的民族之一，居住在边远的高海拔地区

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吸取国外的参与式工作经验

广西各级项目管理机构始终与英国 I T A D 公司保持密切的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参与式培训项目、环江 E A T S 项目、项目社会影响评估等工作；广西外资项目管理中心还多次组织各级项目协调员与香港乐施会、香港社区伙伴、国际行动援助、世界宣明会等国际组织开展经验分享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协调员们学到了不少经验和值得交流推广的做法。

项目推动了赋权和能力建设，调动了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社区农户对项目的认同感

项目过程中，社区农户有机会通过各种途径了解项目，发表意见和建议，对部分项目或项目环节，可以直接参与决策。使社区农户有更多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选择自己认可的东西或方式，并感受到自己能“当家作主”。同时，在这种过程中，锻炼了农户的表达能力和与管理者的沟通、协调能力。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是农户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这种主动学习的过程将有利于社区的自我反省和为其他社区提供参考。

项目准备过程中，社区农户主动与项目办联系，积极申请项目早日实施；并积极做好土地占用协调、劳力组织等工作。实施阶段，对需要社区承担的工作，农户主动投劳、集资，所有工程项目没有因为社区扯皮问题而影响实施进度。同时，对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农户们也积极协商，如龙胜县小江村为了公路问题，社区内部开会协商多达 10 多次。在工程完工后，大家都一致认同社区应该有相关的管护制度，以保证项目成果能持续利用。并且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管理出工出钱。

文本框 1: 广西项目如何界定参与的角色和作用

广西项目操作和实施管理手册中明确了对参与的要求，县、乡项目办人员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实际操作中做的比这些还多”。并且六个项目县在实施过程中，都在探索农户参与的具体操作办法。这些项目按项目主体可以分为：1) 县项目办牵头发包，施工方实施，乡项目办和社区农户代表参与招标和检查验收；2) 乡项目办牵头发包，施工方实施，县项目办和社区农户代表参与招标和检查验收；3) 社区自己牵头发包，施工方实施，县、乡项目办给予协助，并参与检查验收；4) 社区自己负责实施，县、乡项目办给予协助，并参与检查验收。无论上述哪一种实施方式，都有社区农户（代表）的参与，并且各县都在探索总结不同的参与方式下，项目的效果和管理的有效性。

在项目实施和监测的重要环节上，项目办对农户的参与起到协助和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协助农户选择项目和确定项目优先次序；协助农户在项目实施地（一般为屯），成立实施管理小组，小组成员由农户选举产生，并协助社区管理小组组织农户讨论项目实施方式，项目规模小，社区技术人员多的村，自己实施项目，例如，建盖卫生室。

建立社区参与质量监督和验收制度。实施过程中，社区管理小组基本上每天有人参与监督进度和质量，关键的技术环节上，县上派技术人员监督把关。社区监督过程中，发现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县、乡项目办，项目办将委派协调员或技术人员了解和处理村民反映的问题。

项目办协助社区建立了社区项目执行小组验收制度和后续管理制度。承包项目必须经过社区评价和验收合格后，才能由县乡组织正式验收。从制度上保证了农户参与监测的权利。三江县，在社区参与外包工程监测验收方面，以及推动社区建立后续管理制度方面有一整套的程序和制度。

参与式工作实践，使各级项目机构人员认同参与式理念和做法，推动了项目的发展

当地政府项目官员的态度产生了很大改变。县、乡项目协调员通过介入 PP 过程，对当地社区和贫困农户参与项目实施有了新的认识，具体包括：由不相信社区的分析能力转变为承认和尊重社区的能力；由不想同社区沟通转变为自觉向社区学习，倾听社区的意愿；由不敢赋权转变为由当地人自主决策。

协调员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县、乡项目协调员通过 PPA 和 PP 过程体会到，项目协调员应该具有几种角色：协调员是协助者；协调员是催化剂；协调员是服务者。

对国内扶贫开发机制改进及创新的影响

在广西，参与式的理念、方法已经得到政府领导广泛认可，因此，政府要求扶贫办的扶贫项目也要借鉴世行项目的一些参与式方式。例如：各种基建项目的物资采购，验收等都应有农户代表参与。还鼓励农户通过参与式讨论解决土地流失和赔偿纠纷等问题。

广西 PRCDP 参与式学习体系还借鉴了诸如培训、实际行动、经验分享、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等能力建设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协调员队伍在不断壮大，参与式方法随着项目实施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拓展。广西参与式学习体系对于以社区为中心的贷款性质的大型综合扶贫项目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积极探索。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 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项目管理机构的健全和稳定，为项目参与式方法的运用和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 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社区农户积极参与到需求评估、计划、实施、监测及评估有关的决策和行动中，以促使社区从认识、能力、自我发展上得到真正的改变。为 PRCDP 参与式学习体系建设和参与式项目实施提供群众基础。
- 搭建好各种交流平台，加大培训工作力度，不断推动参与式学习体系建设，提高项目管理机构及社区实施项目的能力，是保证项目参与式方法持续应用的关键。
- 健全的各种参与式制度保证，《广西项目参与式村级规划指导手册》、《广西项目操作和实施管理手册》和《广西 PRCDP 社区参与式项目实施管理操作指南（试行）》，为在以社区为中心的贷款性质的大型综合式扶贫项目中推广参与式工作提供了制度保证。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

黄灿滨

电子邮件：hcanbin@yahoo.com.cn

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

周 青

第二十九章 适应政府系统的参与式方法：

汶川地震重建项目

邓维杰

邓维杰是四川农业大学的副教授。他在中国的参与式发展领域已经工作了十多年，并以培训师的身份参与了很多的国际援助项目 and 政府项目。在这个案例中，他介绍了政府项目与国际援助项目中能力建设的不同方法，提出了对参与式方法进行调整应用的建议。

背景

我曾经作为参与式方法的培训师长期参与中国的相关项目工作，并与政府扶贫发展部门合作多年。我参与的中国流域管理项目和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就是这种类型的工作。最近，我应国务院扶贫办的邀请，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有关参与式方法的培训。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这种培训要求对常用的参与式方法进行调整，以适应政府工作体系的特点。

培训方法的调整

实际上国务院扶贫办尝试应用参与式方法已经超过二十年，而我也一直介入其中部分项目活动。但是，参与式培训方法的应用通常都是基于国际援助项目中资助者的要求进行的，因此它比单纯的政府项目具备更多的工作条件（见表格1）。在这种条件下，常用的参与式培训方法包括小组练习、角色扮演、热身、游戏和有组织的辩论等。所有这些工具都要求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在政府系统框架下开展培训的条件就完全不同。很多时候政府要求的培训对象都是规模巨大，但是资金和时间都有限。同时，组织和协助成人学习研讨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应用参与式培训方法的空间和机会是有限的，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和游戏等。但是，还是有不少参与式学习的工具和方法是可以应用到这种环境中的。

表 1 国际培训项目和政府培训项目比较

国际项目中的培训	政府项目中的培训
每个培训班人数少，通常不超过40人；	每个培训班人数通常很多，有时甚至上百人。
参与者具备相似的背景，例如都是村民、都是乡镇工作人员或者县级政府人员等。	参与者背景广泛多样。
初级官员是主要目标对象，很少是高级官员。	参与者来自不同层面的政府部门（省、市、县甚至国家级政府部门），并且是同一的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比较宽裕，通常是3-5天左右。	培训时间有限，往往是以会代训。
培训空间很大，方便组织小组练习、座椅便于移动等。	通常都是标准的大会议室，桌椅都是固定不动的。

汶川灾后重建项目

本案例描述的是参与式方法是如何应用到政府体系下汶川灾后重建项目中培训活动中的。

2008年，汶川县及其邻近区域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两万多人因此丧生，上千万人受到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及时提供了援助和支持，不仅包括紧急救援，还包括恢复重建。此外政府与民间社会也动员了大量力量参与此项工作。为了尝试综合的灾后重建工作，国务院扶贫办于2008年后期在汶川地震灾区的四川省、甘肃省和陕西省的十九个样本村启动了参与式灾后重建规划、实施和监测示范项目。为了分享相关经验，改进第二阶段另外四十个灾后重建示范村的灾后重建工作，国务院扶贫办于2009年3月4日在四川省举办了“国务院扶贫办第二批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实施与管理”工作会议。

我作为培训协调员应邀承担了参与式监测与评估（PM&E）环节的培训。当时的培训环境条件为：

- 参训人员超过两百人，来自国家、省级、市级和县级扶贫部门；
- 部分参训者已经具有参与式方法的经验，但绝大多数对此基本是没有任何实践经验；
- 针对 PM&E 的培训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培训场地是一个大会议室，所有设备（桌椅）已固定不能挪动；
- 会议只提供了大白纸、一个黑板、A4 打印纸作为培训材料。



大规模的参与者和正规的座位安排对参与式培训活动提出挑战

摄影：邓维杰

国务院扶贫办明确要求参与式方法应该应用到这两个小时的培训活动中，以促进参训者的参与和有效分享。国务院扶贫办特别强调参训者应该在汶川灾后重建的规划、监测和评估方面的社区参与方面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很明显，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参与的好处，并希望其他机构也能够第二批贫困村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应用参与式方法。本次培训会议的目的就是关注参训者对参与性的意识和认可。毫无疑问，本次培训会的条件是不能满足一个有效的参与式培训的要求的。尽管参训者众多，但组织者并不希望本次培训变成一个过于正式的演讲式的培训。常规情况下，这种培训都是培训者滔滔不绝的演讲并占据多数时间，而参训者总是处于被动的倾听状态。而我们需要将这个过程协助成一个主动互动的过程，让参训者能够主动的贡献和分享其经验。

基于这些要求，我针对性的设计了两个小时的PM&E环节，并利用参与式方法实施了如下步骤的培训：

1) 参训者按排就座，就座顺序是常规的官方会议的方式（详见上面照片所示）；

2) 作为破冰游戏和活动，我从一个矩阵数字练习开始，请全体参会人员通过自定的简单数字按照要求进行简单的加法，最后全体人员都得到了一样的结果。然后我请大家思考：为什么全体人员各自选择的数字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大家开始议论纷纷，整个会场变开始热烈起来，讨论的气氛已经建立起来了；

3) 随后，我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进行大会讨论，并将刚才的练习与大家都从事的扶贫工作联系起来，促使大家意识到：贫困的结果或者贫困的表现是一样的，但是导致贫困的原因尤其是根本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如同刚才大家的练习一样：结果一样，但每个人的数字是不一样的，但具体是什么数字只有你们自己清楚。因此，对于贫困的根源，只有贫困群体自己最清楚。结果全体参会者都认同这个理念，承认贫困群体比外界人员（官员）更清楚自己的生活状况。这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目标群体必须介入到相关扶贫工作的规划、监测和评

估过程中。这使全体参会人员对社区参与方面达成了第一个共识;



培训研讨会中的大组汇报

摄影：邓维杰

4) 紧接着，我把主题转向灾后重建的参与式监测与评估上，并通过大会讨论形式分析了“社区能否监测评估灾后重建？为什么（无论是能还是不能）”。多数参会人员都认为社区不能参与灾后重建的监测，因为他们认为村民并没有有关参与式监测评估的知识，只有技术人员或者专家才能实施监测评估，而不是重建社区的村民。与此同时，其他人员认为村民绝对知道他们需要（重建）什么？也知道他们到底从灾后重建中得到了什么（利益），尽管他们并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

5) 随后，全体参会者被分为左右两组：左边一组是认为社区有能力进行参与式监测评估的，右边一组则是认为不能的。然后我请两个小组继续讨论他们的理由，并整理成几个关键要点之后，请两个小组的代表进行辩论：当一组陈述完一个理由后，马上请另外一组进行反驳，两组轮流进行，整个过程都是在我的协助管理下进行的。整个过程非常热烈，两个小组成员非常关注自己所在小组的论点并希望得到大家认可。通过整个过程使大家对参与式监测评估有了更多的理解，也对灾后重建的成效有了更多的关注。最后，两个小组达成了共识：社区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监测评估灾后重建过程与成效，这其实就是参与式监测评估。我然后指出，实际上，参与式监测评估已经在2008年年末国务院扶贫办第一批灾后重建示范项目中应用了，本次参会人员中就有部分是参与式监测评估的实践者，分别来自四川省、甘肃省和陕西省的灾区，因此我们可以与他们有更多交流，学到更多有关参与式监测评估的经验和教训。

6) 然后，我以省份为标准，将四川省、甘肃省和陕西省的参会人员分别分在一组，请各省内部分享交流国务院扶贫办第一批灾后重建项目参与式监测评估的经验和教训。参会者认识到，大量的资金投入并没有产生显著的示范，但是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过程为大家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大家一致认同在灾后重建的监测评估中应该有更多的参与性。来

自第一批灾后重建示范村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在2008年灾后重建的监测评估中的经验和教训，并解释到，其实参与式监测评估并不复杂，协助好过程就很简单，但监测评估的协调员必须学习一些协调技巧；

7)最后，我通过图片展示的形式介绍了2008年8-9月第一批灾后重建参与式监测评估（基线调查）的情况，这个介绍提供了很实用的进行参与式监测评估的基本步骤和框架，进一步减少了大家对参与式监测评估的担忧，帮助参会者认可参与式监测评估是完全可操作的。来自参会者和国务院扶贫办的反馈显示：这种参与式的培训效果比以前的常规培训方式好很多。有的参会者指出，之前的培训参会者之间以及与老师之间缺乏互动。培训中的参与性方法使得人们认识到学到新概念（例如参与式监测评估）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这个过程是主动学习过程而非被动听的过程就行。真实的案例和回顾性讨论帮助大家建立了基本的理解和认同，帮助大家克服了对参与性的误解和担心，而这些通过传统“讲课”的方法是很难达到的。

国际经验显示：参与式方法只有在参与者比较少（通常是二十人左右），才可以发挥很好的效果，但是这种要求在中国的政府体系中很难实现，因为很少组织如此小规模但又涉及到不同层面部门和人员的会议或者培训。“以会代训”是中国政府常用的一种培训方法，很多项目或者工程都是如此，例如“灾后重建工作会议”参会人数都是上百人。我想说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尝试利用参与式方法而且效果仍然不错，只要这些参与式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应用得当的话。我发现，以下参与式工具在政府体系的培训工作中是比较有用的：

- 破冰行动：用于鼓励全体参会者从开始就进入参与的状态（开始有兴趣）；
- 头脑风暴：是所有的参会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和针对具体主题的想法，有利于参会者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参与进来；
- 卡片：方便所有参会者分享其个人观点（匿名）；
- 结对讨论：有利于参会者之间分享的简单方法，尤其是传统就坐方式情况下的交流；
- 同源分组讨论：同组人员来自同一地区或者机构，但是分享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 辩论：建立大家参与的气氛，同时很容易澄清一些问题或者概念；
- 案例：侧重便于大家理解的经验或者教训；
- 图片之声：便于参会者有机会理解图片反映的过程，并佐证协助者提出的观点和方法。

本案例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协调员必须充满自信，敢于在充满挑战的环境条件下灵活应用参与式方法提升培训效果。对于培训者而言，了解受训者的背景、培训设施、培训空间等情况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培训者（协调员）才能据此实际情况设计和安排一个恰当的培训策略和操作方法。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邓维杰

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

地址：都江堰市建设路288号，611830

电子邮件：dweijie2007@yahoo.com.cn

第三十章 走向公众的环境影响评价：创造

参与的新空间

LILA BUCKLEY

Lila Buckley 是 IIED 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之前她在北京环境研究所任执行主任助理。她曾经在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清华大学 IUP、美国的 Middlebury 学院学习。本文第一次发表在 2006 年第 8 期的《中国环境系列》上，由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题目是“中国环境影响评估中的大众参与”。

在资源稀缺的中国，人们脱贫——而且再也不陷入贫困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参与到资源可持续管理上。在那些大多数人仍然依靠农业或以土地为基础的其他生产活动来谋生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长期以来，解决中国的自然资源匮乏和环境退化不仅是生态问题，而且是大众参与问题——这也成了贫困与富有的分水岭。在这种背景下，环境立法，比如环境影响评价法(EIA)在政策上为加强大众参与提供了机会。

像本期特刊所刊登的其他参与式扶贫案例一样，中国制定 EIA 法律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财政支持（世行资助），需要采取独特的试点工程来试验参与式过程，需要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在法律草案的起草过程中就进行参与。这个过程导致中国 EIA 立法时，要求一系列的大众参与，而 EIA 法律与参与式扶贫的关系还在探索中。在起草阶段就引进参与式方法，EIA 法律为参与式方法不经小规模示范就整合到中国的发展机构中创造了机会。

在本文中，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式经验，我是从参与 EIA 法案起草的那个非政府组织的主任那里获得这些见解的。这个组织叫做全球环境研究所（GEI），2005 年—2008 年，我曾作为执行主任助理在那里工作过。尽管中国在公众参与的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部法律有助于解决中国其他层面的发展和扶贫问题所面临的参与式过程的公信力问题。

中国EIA和公众参与的对接

尽管实施发展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概念已经在中国的政策层面存在三十多年了，但是，公众参与的手段和途径仍然大大滞后。中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引进参与式方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些非政府组织中，其中之一就是GEI，一个总部设在北京，成立于2004年的环境保护组织。GEI的发起主任金嘉满女士回忆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PL）的一部分，EIA在1979年第一次进入政策范畴讨论时，支持者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工具，同时，还能减少当地人与开发者在资源使用上的冲突。但是，金女士解释道，早期的EIA只是一种说辞，既没有具体的条文也没实施办法。从理论上说，应用这条法律的渠道在十年以后才打开，在EPL的修订版中第一次提到了个人的环境权利，第六条清楚地写到：“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遗憾的是，这条法律也没有具体的实施条款，因此也被忽略了，金女士说。又是一个十年以后，EIA的概念在1996年被国务院在“建设项目中的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的第二条再次引入，但是仍然没有公众参与的机会。

尽管起步缓慢，这一政策终于在1994年接到了一些地气。1994年，法律开始允许非政府组织注册了。第一批合法成立的机构对环境问题比较关注，根据金女士的说法，这些机构开始把政策和受污染、环境退化影响日益严重的社区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在官方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第一次使公众合法地参与到了环境保护中来。金女士回忆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进入行动，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抗议也越来越多，最后推动了EIA立法中更多的公众参与。”

这种公众参与增多包括2002年出台的EPL修正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国家将支持公司、专家和公众使用恰当的方法参与环境影响评估。该法案还第一次提到了利益相关者论坛、公众听证等概念，以及与大众参与相关的其他方法。2003年，政府通过了新的独立的EIA，正式内容和草案大不相同，新法律将EIA的范畴扩大到所有的发展和建筑项目，从法律上保障了公众有权对所有发展项目和发展计划的分析、预测和环境影响评估过程进行参与。随着所有项目和过程都要求实施EIA，保护评估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权利，为了实施有公众参与的具有实际意义的EIA，概念性框架已经建立。

国际合作与参与式决策

随着这个法律框架的正式实施，GEI发现自己处于更广泛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而且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也范围更广，包括政府官员、建筑公司、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SEPA，现在的环保部）的EIA中心签署协议，实施一个关于中国公众参与的项目，GEI受邀参加。

在草案起草的一系列会议中，参与者们讨论了公众参与EIA的意义和操作方法。金女士记得她建议真正的公众参与必须包括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这个建议收到很多消极反应。“我感到很孤单，”金女士回忆到。她发现自己和GEI的处境很不妙，她的组织和她的想法都被看成了对发展和进步的威胁。“当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和公众参与在环境立法中是如此陌生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帮助政府实现它的目标。”金女士解释说，讨论组中的很多人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强调公众参与是不现实的，这使得她在启动会议上感到非常沮丧。

“尽管我感觉到中央政府很想出台这些法规，但我知道真正实现和实施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回忆说。

该启动小组面临的挑战是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的一个缩影，当时的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公众都感到他们的话语权非常有限。尽管这个启动小组举步维艰，他们还是成功地

形成了草案，这个草案在征询公众意见，以及进一步的修订后，最终在2006年3月由环保总局正式颁发。

“过渡性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阐述了公众参与EIA的目标、范围，以及开发者、环境组织和公众的权利和义务¹。一年以后，“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条款发布，又提供了一个发展项目对环境影响的信息披露的标准框架。

中国EIA依然面临的挑战

尽管EIA过程中已经将重要的公众参与纳入其中，许多挑战依然存在。今天的法律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清晰、具体的步骤和要求，但是，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灰色地带。举例说，该法律没能正式委托具体部门或者澄清公众参与的司法权，也没有确定参与者行使否决权的范围和权利。¹另外，也没有为听证会上的公众参与和EIA过程的监督提供人员支持和专家协助

²



围绕资源利用的冲突已成为发展的焦点，社区能够认同政府的决定是重要的

摄影：Simon Lim

在机构层面，实施EIA的组织结构依然很弱，存在着人手不足以及不恰当的集权管理等。环保部EIA中心的员工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环境科学家，他们负责撰写与EIA相关的条文，向独立的EIA机构发放许可证，监督区域EIA办公室工作等。区域办公室依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地方政府往往更重视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独立的EIA机构依赖发展商才能维持生存，因此在评估期间，腐败之门大开，为了把大的环境问题说小，这些机构经常随意

¹关于“过渡性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法”，更多信息详见Moorman J.L. and Z. Ge, 2006

²关于披露信息的非官方翻译，详见 www.law.yale.edu/documents/pdf/Intellectual_Life/Ch_OGI_Regulations_Eng_Final_05160_7.pdf

出口要钱。

参与式扶贫的机制化道路

这些文件虽然记录了中国可持续、公平发展的重要步伐，参与式进程和参与式能力建设的机制化依然是个难题——特别是在贫困人群中。

在过去几年里，多个利益相关者一直通力合作，向具有破坏性的公司施加压力，并培养地方社区的参与能力。举例说，在为新闻工作者和草根组织召开的能力建设研讨会，模拟了针对EIA的听证会以建立相关能力，并探索相应办法来促进环境破坏地区的当地居民参与发展决策。另外，非政府组织一直通过信息披露和诉讼方式来直接对付对环境有破坏的行业。一个叫做绿色选择的非政府组织联盟一直关注全球供应链，促使这些大型企业基于环境绩效来采购。

在EIA问题上，新闻媒体通过对公民和非政府组织赋权，也证实了自己是一个有用的机制。举例说，在这项法律出台不久，新闻工作者就促使公众对圆明园的生态环境退化，以及北京周边的一块湿地进行关注，两个例子都说明，知情的公民、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可以团结起来终止一些不合理的发展项目。

这篇短文让人们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国立法进程有了一点了解。GEI在起草EIA法律上的参与，为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决策创造了空间。但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家未来的法律起草，不能被视为终极目标。实际上，非政府组织是不能代表公众的声音的。相反，GEI的经验强调的是决策过程中更多人参与的潜力以及需求。中国的EIA法律法规需要加强。但是，单纯改进法规并不能实现公平发展。现在的挑战是为公众决策创造更广泛的空间，以及为所有的人民（不仅仅是一家非政府组织）提供知情参与的机会。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Lila Buckley
Senior Researcher on China
Agroecology and Food Sovereignty Team
Natural Resources Group
IIED
80-86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1X 8NH, UK
电子邮件: lila.buckley@iied.org

参考资料：

Moorman J.L and Z. Ge (2006)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cess: Comparing China's EIA Law and U.S. NEPA', Vermo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 8.



第七章 结论

第三十一章 改善政府与公民

之间的互动空间

JOHANNA PENNARZ

本期《参与式研究与行动》呈现了中国各部门、各机构和各区域在经历、使用参与式方法时迥然不同的经验。本期的稿件基本都是围绕政府与参与式方法的关系的，以及如何从政府主导型方法走向更可操作更可靠的参与式方法。尽管一些实践和反思活动看起来很基本，但从中得出的经验对于在中国背景下更大范围内讨论治理问题意义重大。本期中的文章都围绕着如何改变政府与社会关系这一主题进行的，这也是中国整体发展与改革议程的核心。因此，它将直接影响到几亿人的幸福。

新问题

本期稿件显示了参与式方法对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影响，文章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包括：

- 角色不明、责任不清：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新的合作形式要求社区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社区通常并不明白这些责任都有哪些，而政府也不愿意放弃控制权。对于承担了责任的社区来讲，他们有一种感激和兴奋的感觉（见娜体的文章，第一篇第4章），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官职的人来说，谁应该承担责任（见覃国政的文章，第一篇第5章），以及如何承担责任（见第一篇第6章宋浩昆的文章）都存在着疑问。
- 透明度和公信力是对社区和政府都有影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促使双方在项目过程中进行了合作。双方都认为参与式方法是实现资金更加透明分配和使用的关键。¹这在覃祖荣、杨刚和宋浩昆的案例中都有很强的体现。希望扶贫资金的使用更透明和更具有公信力给社区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都带来了压力，这些压力既来自上面（上级政府部门）又来自下面（社区层面）。
- 政府愿意与贫困户合作，但是，他们很难找到有效的方法。目前的挑战在于，项目组不应该把社区当作一个整体，而是去找到并帮助社区内的边缘群体。特别是在多民族聚集地区，协调员需要找到恰当有效的方法进行沟通，很多时候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而这些中间人通常是有权利的社区代表。对于协调员来说，调节资金分配的内部纠纷，

¹ 对 PRCDP 的影响的评估发现，社区把透明度的改善当作参与式过程最重要的结果（ITAD，正在进行中）。

在社区内达成共识都很有挑战，而通常情况下，社区领导是不希望通过政府官员的介入来解决问题的（详见覃国政的文章，第二篇第10章）。

- 与此相关的是公平问题。社区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主体，内部有公平分配利益或者相互交换的机制等强大的价值观作为均衡力量来发挥作用。因此，社区内部的包容性和分配问题（例如项目利益）都很少有人提起。人们常常认为社区愿意按照他们自己的平等方式和做法来实现公平受益，因此很少考虑社区内部精英主导的问题（详见王建萍的文章，第三篇第12章）。
- 与当地特定文化和机构相关的问题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协调员常常在文化和语言障碍中挣扎，这使得与社区的沟通和合作变得异常困难。在少数民族社区中，人们长期习惯于自生自灭，与政府的互动是有限的、有争议的，因此，彼此之间缺乏信任 and 了解。² 本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的很多案例都是关于参与式过程是如何改善彼此关系，并建立相互信任与理解的（见李辉的文章（第四篇第27章）、覃国政的文章（第一篇第5章），以及第二篇中的所有文章）。
-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认知公正，并如何将其融入实践中（见Maruja Salas的文章，第32章）。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对贫困情况认真了解以后，认真对待贫困人群的看法，并开发出可持续的扶贫策略。参与式贫困分析的实践使得对贫困具有更加真实和针对性的了解，并将贫困户的视角作为中心（详见覃祖荣的文章，第三篇第2章）。



广西区环江县的苗族妇女正在参与一个参与式贫困监测活动。

摄影：邓维杰

² 对于东南亚大陆（包括中国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史，详见 Scott, 2009。

新趋势：什么改变了？谁改变了？

参与式方法的引入已经有大约二十年时间，而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中。本期《参与式研究与行动》提供了大量的采用参与式方法的生动案例。尽管缓慢，但改变正在发生，而且这些改变是通过变革性实践，以及与与政府的直接合作发生的，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并非没有紧张情况出现。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参与式方法正在整合到政府的政策和实践中（详见第六章文章）。³参与式方法的解释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中国政府明确地想将参与式的讨论与其政治议程联系起来。这就出现了对参与式解释的中国特色。⁴。政府议程在某些时间段上给基层草根组织或者自我管理组织强大的支持，动员了群众，建立了各种协商沟通机制⁵。最近议程中出现的新的情况是改善对特困群体的服务，这也回应了公信力



社区所有农户都在和一家生产茶叶的厂商的合同上签了字，以前只有社区干部签。

政府改革已经创造了相应的空间，使地方利益相关者逐步承担更多的角色。然而，对于贫困社区来讲，很难在这个空间中获得自己的位置。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很难有效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问题的一部分，也常常被当作拒绝权利下放的借口。这期《参与式研究与行动》把现存的权利关系作为重要变量进行了反思，但没有从根本上进行质疑。有些文章提到了双方角色、态度和思维的改变，以及社区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推动自身的发展。社区内部的权利关系得到了应用，但并没有转变根本。深层的专制范式认为社区领导和精英阶层是广泛参与的关键角色。对于政府和社区关系而言，政府要把责任下放，要为社区创造

³尽管参与式办法的有效性仍然缺乏足够证据，但早期 PRA 网络的反思研讨会提出了一些（详见 A. Wilkes 的序言部分）。CDD 示范项目已经组织了一次调查来评估 CDD 方法的有效性（详见李辉文章，第 6 篇第 27 章）。最终的综合的关于 PRCDD 中参与式方法的评估（基于 5 次的年度调查）还没有完成。

⁴之前关于参与的讨论，通常集中在该概念的“怪异”以及对中国的参与式实践的理解和应用的“差异性”上，这使得参与式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很难被采纳和传播。（详见 Plummer and Taylor, 2004）。

⁵参见卢彩珍的例子，2010。

发声的空间。调整这个循环的典型的中国式方法就是提供一种去政治化的主要关注技术问题的治理讨论。在讨论中，政府保留了确定参与空间的决定权。

因此，就像本刊所记录的，对实践提出问题的反思性方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加大了讨论的空间，只要是在一线涉及到参与式实践的人员，不管是有权的还是没权的，都要让他们发出声音。现在重点已经从进行实践转换到了对实践进行总结。分析总结这些经验已经成了那些想立即介入或者从中学习经验的人的变革性体验。一旦那些影响人们对参与性的思考和实践的根本问题阐述清楚，开放讨论的机会就会逐渐增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讨论已经越来越关注，将参与的基本原理转变到为特困人群和最为边缘人群服务的实践中来。真正的参与是基本价值观的内化，讨论也随着推进，从机制性应用工具变成创造性协商的实践、进程和关系。⁶ 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变化也成为了进程推进的一部分——他们提供了解释并定义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动空间变化的理念、概念、价值和实践。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Johanna Pennarz

ITAD, Hove,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站: www.itad.com

参考资料：

Caizhen, L. (2010) 'Comparing participation in China to the participatory discourse in development studies', ISS Dev. Issues Articles. Den Haag.

Plummer J. and J.G. Taylor (2004)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Earthscan: London.

ITAD (forthcoming) Towards a more responsive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 Participatory impact evaluation of PRCDP (final report). ITAD: Hove.

Scott, J.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⁶参与式实践的象征性应用常常被解读为能力问题（详见 Plummer and Taylor, 2004）。



第八章

培训者秘笈

第三十二章 为什么要进行参与式研究，如何 进行参与式研究？

MARUJA SALAS

MARUJA SALAS 是一位秘鲁人类学家，从 2000 年起，她就在中国西南部，与一些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一起研究原著民知识和参与。她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努力为培训者、研究者、农村社区创造参与式学习的机会。她的实践领域包括在大学里教授参与式研究和行动、设计社区规划程序、协助不同类型的决策等。她的参与式理论受到了拉美学派思想的影响，此学派代表人物是 Paolo Freire 和 Orlando Fals Borda。在概念上，Maruja 认为人们都是知识实体，人们可以通过行动-反思-再行动的过程为自己赋权，而且，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凝聚力，可以把思想和社会从不公平中解放出来。学习参与式方法是最终实现创造性改变的过程。

在培训中，我的建议和认识论的两个问题有关：为什么要进行参与式研究？如何进行参与式研究？¹ 这些建议是针对在参与式行动研究中负责对发展工作者进行能力建设的培训者和协调员的。

采用参与式方法进行培训的主要原因在于，你们和你们的协调员都相信**认知公正**。你们也曾亲眼看到，没有提前听取所有利益相关者意见，就制定出来的计划，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你们一定不想重蹈覆辙。你们要确信，当地人民的洞察力以及他们的实际努力才是发展的决定因素。

参与式研究培训是一种让“**知识就是力量**”变成现实的教学法。² 这就意味着如果人们表达出了他们的想法并进行反思，就有很大的潜力将学习转换成行动。在这个方法中，受培训人的自愿学习是必要的。参与的哲学基础是自由选择，这一权利在发展中经常被忽略。认知公平意味着学习就是让受培训者体验到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是无价的，从而同意改变是能够发生的。

行动、反思、再行动

从行动-反思-再行动（ARA）中创造机会，不断学习。这有助于培训人员改变其传统的发展研究方法。ARA不再利用收集数据，然后由专家分析数据的传统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在生活

¹ 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本质和范围的一门哲学。它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知识？知识是怎样获得的？我们怎样判断自己获得了那些知识？在这个领域里，大多数讨论都有关知识的本质和与其相关的真理、信仰、理由。它也同时探索获得知识的手段，对不同的知识流派进行质疑。来源：维基百科。

² 教学法是学习如何成为老师或者学习教学的过程。从广义概念上看，这个词语指教学的策略，或者教学的风格。来源：维基百科。

中推进人类发展的互动方式。此种方法允许人们通过自己的洞察力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不失为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去发现不同行动者获得事实真相的方式是何等变化多端，而人们对此种复杂性的理解又是多么不同。

把ARA和你们的培训相结合，将可利用时间分成45到90分钟的课时。和队友一起，利用练习、游戏、小组合作，逐渐探索培训过程中遇到的概念和方法。比如：

- 介绍参与式研究的概念。
- 利用30分钟时间，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层次探究。
- 想象每一个语句，使其可视化，如：“知识是一种社会结构”；“知识就是力量”；“参与涉及到对不同想法的理解”；“真正的参与是头脑、心灵、行为的参与”；“投票是在某一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最好办法”；“没有人什么都知道，但每个人都知道一点”。
- 要求参与者表达自己是否同意一个观点，并解释为什么。
- 就参与式研究概念的不同观点进行重复讨论。
- 经过几轮研讨，要求参与者共同分享其结论：将全体人员分组，用十分钟时间互相交换意见，得出结论。
- 要求所有人将其结论作为下一单元学习的提示录。给每一组一张长卡片和一支笔，让他们清楚地写下其结论。邀请每组走到讲台上，大声地读出结论，然后将其卡片挂在黑板上。

ARA以一种互动的方式为理智地处理问题提供了机会。它帮助人们得出结论，协助下一步的发展。让受培训者体验ARA，允许他们把经验教训可视化。这种方法很灵活，像实际生活一样，可以不断反复。这种培训是有力量的。它帮助人们构建自我意识，预见受培训人员在这个领域运用知识时会遇到什么问题。

探索认知时间、空间、知识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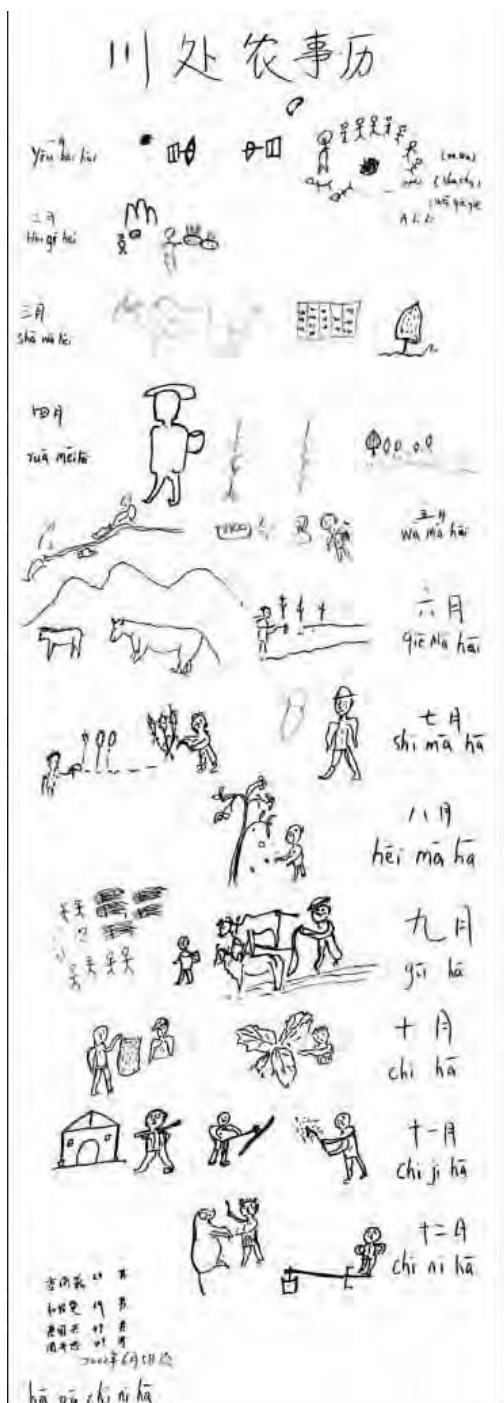
以下参与式工具启发受培训者思考每个人生命中都不可或缺的三种元素：时间、空间、知识。

时间工具

时间工具是用来阐述人们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或者按照其他的周期来怎样安排其生活的。受培训者可以发现，对很多社区来说，这种周期和他们的生活轨迹十分不同。例如，一个农事年历是对一个社区耕种活动的总览。

空间工具

空间工具是用来展示人们在他们的家里、花园里、社区里、地区、世界上、太空、甚至你完全没概念的地方里是如何生活的。例如，横断面图能让你更多的了解资源和庄稼作物是如何随纬度变化而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以及社区人们是如何利用他们的。



傈僳族日历，标明了每个月的农事活动

人们是如何认识事实真相的。





3, 四川美姑县彝族毕摩（萨满）自传。右侧是彝族的民族想象力及历史的基本组成成分，形成了彝族文化。

三角测试法或“三”的原则

“三”的原则被Robert Chambers称为“三角测试法”，是我在作为培训者时学到的方法。

3

- 培训至少要由三部分组成：概念、方法、练习。
- 每个接受训练者至少要学会掌握三种覆盖时间、空间和知识的工具。
- 每种工具都有三个重要方面：目的、优势、局限。
- 每种工具都要为训练者行动-反思-再行动提供至少三次机会：在介绍话题时、在可视化练习时、在讨论结果时。
- 一种工具至少要展现三幅事实的图画：过去、现在、将来。
- 每种工具至少要用探索三代人的想法，比如说年轻人、成年人和老人。

³ 三角测试法常常用来指在研究中使用多于两种方法进行两次或三次检测结果。如果不同的方法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人们会因此更加自信。用三种方法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得出两种相似答案，或者三种不同答案，调查者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设置，或者方法要重新调整，或两者都重新考虑。来源：维基百科。

- 出于政治原因，在社会中至少要咨询三个不同种类的人群，比如说发展工作者、科学家、农民。
- 至少要对三种拥有不同社会力量的人群进行研究：无权者、掌权者、正在获取权力的人。
- 调研对象至少包括三类“认识者”：掌握一般知识的人、专家、其他人认为的智者。
- 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三”的原则的培训建议，请把它加入列表里。

最后.....

一个培训者应该认识到被培训者作为“知者”所做的智力上的贡献。这也帮助受培训者认识到在现实中经验是多么有力量，并且反过来把其他人作为“知者”。

谢谢，祝你们好运，做个开心的培训人。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Dr Maruja Salas

Gomaringenstr. 6 D-72810 Gomaringen Germany

电子邮箱： mas49@gmx.net

第三十三章 学习比培训更重要——

PRCDP 的经验

JOHANNA PENNARZ

由于项目规模（覆盖3个省份的18个县）和项目工作人员的数量，进入实施阶段的PRCDP面临着巨大的能力建设问题。项目组很快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将参与式学习的过程和实践制度化。于是，“学习系统”这个想法诞生了。

什么是学习系统？

学习系统意味着将学习过程制度化，并使其作为机构发展的一部分。学习系统的目标是在参与过程中建立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和能力。学习系统的关键因素有：

- 强调行动和练习：**实际应用从田野中获得的经验是参与式学习的中心。在培训中练习使用各种方法和工具，以及参与者之间互相交流经验，都有助于人们理解参与式方法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对项目有好处的。

- 对实践经验不断反思和分享：**不断的反思可以加深已有知识，对实践进行总结，将经验进行分享。反思时，既要观察行为模式和假设，也要分析失败和成功，从中抽象出较为深刻的见解和结论。在参与过程中，记录良好的实践行为是学习的重要步骤。有同样背景且志同道合的人群一起反思是最有效的方式。个人可以也应该进行不断的自我反思。如果人们在工作中逐渐养成对手头工作反思的习惯，就会成为反思型参与实践者。在这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个人的知识得到提升。

- 为未来发展积累经验，并将其付诸于行动：**对挑战、成就、最佳做法的反思可以为将来积累经验教训，然后将其付诸于行动。学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培训-行动-反思的循环，而应该是一系列学习过程。在反思后，应该将所学应用在进一步实践上。学习系统最重要的特征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从较低水平开始，旨在不断提高机构各个方面的水平。原则上，这是个无限的过程。学习不是被迫的，而是能力建设和机构改变的系统方法的一部分。

PRCDP中的学习方法

通过持续不断的记载、项目内部以及项目之间分享经验与实践，PRCDP提供了学习的平台。学习系统的目的是在PRCDP内部增长经验型知识和能力，使人们在参与减少贫困的过程中增强

创新能力。PRCDP学习系统的主要成分是：

- **对协调技巧和方法进行系统训练：**在项目地，县工作人员已经为村、镇协调员提供了几轮训练。他们运用新的训练材料，因材施教。
- **在协调员中进行横向经验分享：**项目所在省、县定期召开会议、研讨会来分享经验，并组织到其他的项目省和项目县进行参观学习。



在PRCDP中，政府项目官员在苗族社区进行田野实地训练 摄影：Johanna Pennarz

- **地方“试点”中的创新实践：**PRCDP鼓励创新和将实践过程记录下来，并通过定期会议、简报、进度报告等形式进行分享。对好的实践行为的记录（见表格1）是支持创新和学习的重要工具。
- **对可持续的和逐渐提高的参与质量进行监督：**外部协调员通过年度调查监督参与的质量。监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县级协调员进行意见反馈。

文本框1：什么是“好的实践行为”

“好的实践行为”指的是在特定情况下，有效支持发展过程的切实可行的一种方法，通过评估、验证、记录后可以在其他社区、县和省份应用的。

同行评审良好实践行为，是PRCDP参与式方法中学习和分享过程的一部分。评审时，不仅要关注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原因是什么，还应该明确在什么程度上，一种实践方法应该让其他实践者和决策者知悉。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Johanna Pennarz

ITAD, Hove,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站: www.itad.com

参考资料：

- 《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参与性手册》（见194页），其中包括大量的好的实践行为的记录。¹
- 四川、云南和广西三省项目的外资扶贫中心准备了大量的良好实践行为的记录。²
- 昆明研讨会提供了大量的好的实践行为的案例研究，一些案例已纳入本期的《参与式学习与行动》。
- 广西办公室向本期《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提供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学习系统的经验的，见（第五篇，第二十八章）。

¹ www.itad.com/PRCDP

² www.fcpmc.org

第三十四章 符合中国国情的培训：

给培训者们的一些建议和资源

王建萍 邓伟杰 孙大江 JOHANNA PENNARZ

介绍：

要成为一个好的参与式培训专家，不仅要熟悉参与式理论和工具，更要在了解被培训机构和对象的需求，以及当地文化、社会和经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仔细分析，才能设计出好的培训项目。本部分包括中国参与式培训专家们的培训经验、开发的教材以及一些有用的资源和链接，可供从事参与式的专家、培训者和项目官员参考。这里介绍的培训教材和出版物都是由一些中国目前在参与式方法方面比较领先的研究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开发出来的。这些机构在过去几十年内，在把参与式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在中国更大范围内的普及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机构的发展和它们所采用的培训策略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这些机构主要致力于将P R A（参与式方法）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和方法从国外翻译进来，同时也把一些国外参与式的成功经验介绍到国内。这个阶段的一些培训多是邀请一些国际机构的培训专家来华开展的，例如来自联合国，美国或英国一些大学的专家等。

从本世纪初到2010年左右，基于多年的项目经验，一些中国的机构开始总结，反思和开发一些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和最初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培训教材相比，这些本地开发的教材在结合P L A理论与中国实际方面更有优势，也更具可操作性。这方面一个较好的例子是西安陕西妇女与家庭研究会开发的《中国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手册》。他们将一些更实用的方法，如“同伴教育”，“关注中学”等，和传统的P R A方法结合起来，因此更具可操作性。

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机构开始朝能力建设的专业化方向发展。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应运而生，从设计培训项目，开发培训教材和课程，全套都能自主完成。如北京农大的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和西安的妇女发展培训团队等，都有一批高质量的培训队伍。他们有能力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选择适当的培训方法和培训内容，为培训对象提供非常有效的能力建设经历。例如西安妇女研究会开发的《女村官手册》，就非常具有针对性。

这里提到的机构除了用不同的方法将P R A的方法融入他们各自的项目活动，项目实施策略，目标人群的选定等方面，其中大部分的机构往往也为各种国内国际发展项目提供咨询

和技术支持。例如贵州师范大学的社区环境与发展中心；甘肃的农村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等。

通常这些机构会为地方项目伙伴，农民组织或村民等提供一些参与式的培训，来作为项目能力建设的一个部分。所以，为这些培训所开发出来的教材往往有明确的针对性，而且是以培训对象为主体来设计的，通常采用一些简单的图表或图示来解释。这些培训也更多地关注参与式工具的介绍和使用，而不是理论探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类培训教材仅为培训所用，而没有正式出版或提供给更多的读者的原因。

也有些机构更偏重教育和研究领域。如北京农大的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和西安的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因为这些机构的培训对象多为培训师，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或项目官员，所以他们开发的PLA教材也更加全面和完整。

因为目前在中国具有丰富发展项目经验，和国际发展机构和国内政府组织都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机构并不多，所以他们将参与式方法融入正式的政府体系，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参与式方法的能力是有限的。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选择通过发展咨询、研究，为政府官员提供培训等方式来扩大参与式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去宣传PRA的概念。这类机构包括北京农大的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和云南的参与式发展协会。

在这里提到的大部分培训教材都不是只简单提供对PRA概念、理论和工具的介绍，还将PRA理论和一些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以满足各种特别的培训需求。这些培训材料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培训者们是如何尝试采用各种方法，将培训对象与学习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有效提高他们的能力的。

下面我们给出了中国一些参与式培训机构的背景介绍，它们的主要使命，关注的领域和开发的一些培训教材等。每个机构的联系方式也附在介绍的背后。在联系部分，我们还给出了一些有用的资源，包括和中国PLA进展相关的一些书和文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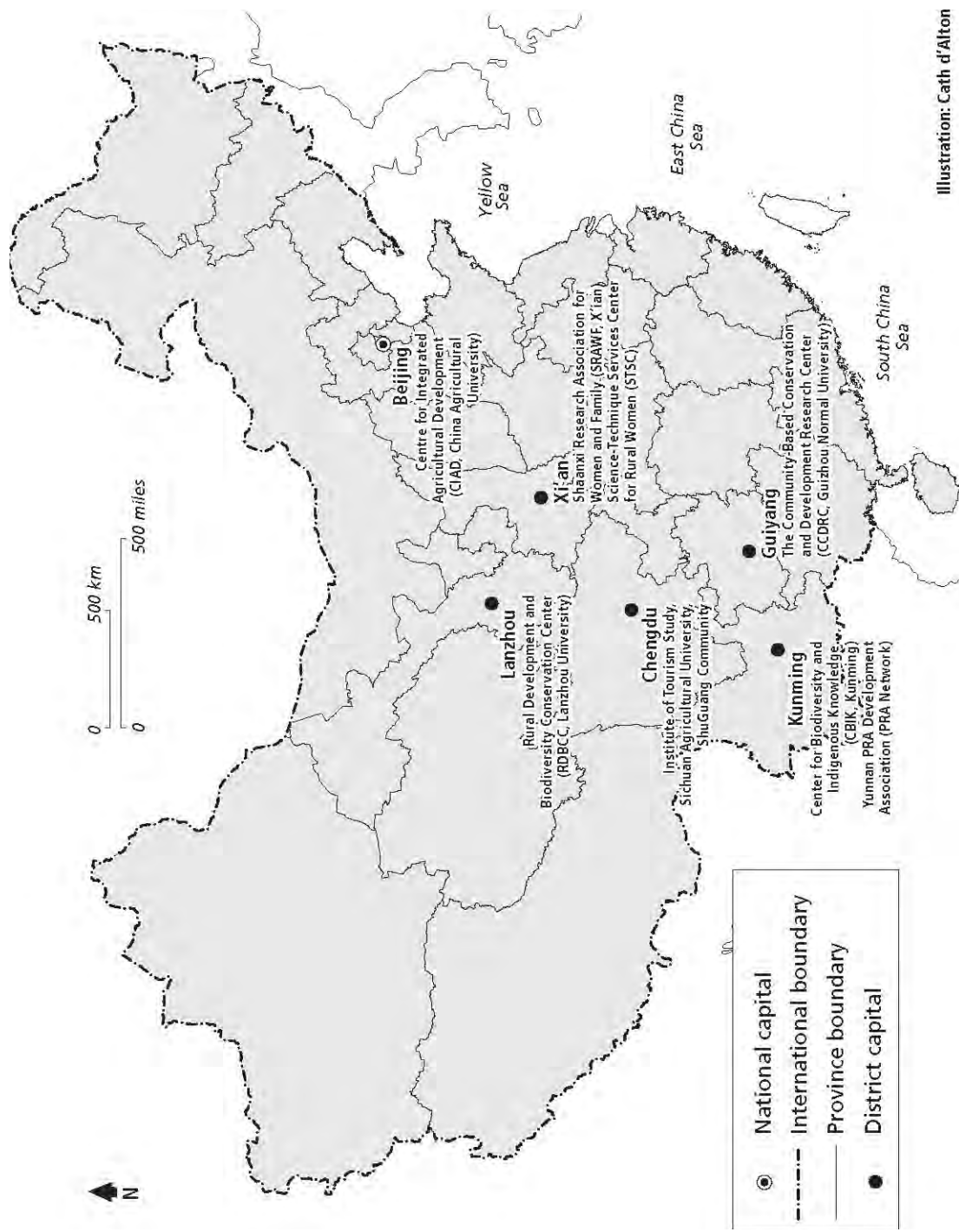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Cath d'Alton

联系方式:

王建萍 副教授

中国云南大学

电子邮件: kmynwjp@yahoo.com.cn

邓伟杰 副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旅游研究中心

都江堰市建设路288号

电子邮件: dweijie2007@yahoo.com.cn

孙大江 性别研究专家

云南社科院

电子邮件: dajiang38@hotmail.com

Johanna Pennarz

ITAD, Hove, UK

电子邮件: Johanna.pennarz@itad.com

网址: www.itad.com

中国背景下的培训： 给培训者的提示和 资源

中国农业大学综合农业发展中心

中国农大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成立于1988年，它是中国最早将农村发展研究、培训和咨询服务融为一体的非盈利机构。有40多人的专业工作团队，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是推动中国参与式方法制度化的领军机构。在过去的22年中，综合农业发展中心与许多国际发展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在国际和国内的农村发展研究领域建立了较高的声誉。

主要活动包括：

发展研究：

为中国农村发展探索适合的方法和道路

发展培训：

为农村发展的相关工作者提供参与式方法的培训

发展咨询：

为政府组织提供发展政策咨询；为中国农村发展项目提供总体项目咨询；除了提供咨询服务和方法论创新研究工作，综合农业发展中心的经验证明了培训是一种向目标群体传播知识的有效途径，也是发展项目、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等制度建设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要方法。

在过去20年中，中国农大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已经为政府官员、学者、技术人员、社会工作者、非政府机构人员、农民和社区领导等各种群体提供和多种多样的培训，培训的领域包括：

- 参与式发展研究的方法与工具（农村发展参与式研究）
- 性别与农村发展
- 地方资源管理
- 扶贫和农村发展中的小额信贷
- 为培训者提供的发展规划和社区工作培训
- 农业技术推广
- 称述和矛盾缓解技能培训
- 跨文化交流
- 商业管理的领导才能和战略规划

培训方法：

参与式和互动培训被大量使用于中国农大综合农业发展中心的培训中，包括：

- 多媒体演示
- 用插脚板、计划卡纸等将培训内容可视化
- 参与式培训班
- 集体讨论案例
- 案例社区的实地考察

联系方式:

李晓云博士、主任

中国农业大学综合农业发展中心

中国北京西圆明园路 2号

邮编: 100193

电话: +86 10 62731061, 62733098 传真: +86 10 62731027

邮件: Xiaoyun@cau.edu.cn

西安陕西妇女与家庭研究协会

西安陕西妇女与家庭研究协会(简称陕西妇研会)成立于1986年, 现有100多位工作人员, 其中专职工作人员20名。妇研会的主要宗旨是帮组农村妇女应对贫困、健康、教育, 以及参与社区事务决策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旨在通过提高妇女权益, 为遇到婚姻和家庭问题的妇女提供感情和法律方面的支持; 妇研会还致力于在中国提倡性别平等, 为关注家庭暴力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支持等。

培训项目和教材

在过去20多年中, 为了将参与式方法、能力建设和赋权等概念融入项目, 妇研会先后为为团队成员、志愿者、项目管理者、政府官员、地方合作伙伴等目标群体举办了50多次培训。与此同时, 妇研会还为培训开发了一系列地方教材, 诸如:

- 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手册
- 农村妇女健康学校教辅手册
- 提高妇女参政决策能力手册
- 社区能力建设手册

妇女发展

在原有的农村社区发展团队、健康发展团队和公民社会团队的基础上, 妇研会在2008年成立了专门的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致力于性别发展和为妇女提供专业咨询。在2011年, 性别发展培训中心成立了专门的培训团队, 承担培训设计、开发培训教材和课程等工作。4年过去了, 性别发展培训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性别发展领域研究和交流的领军机构。

联系方式:

陕西妇女和家庭研究会
西安和平路93号, 世纪广场桃园大厦502室
邮编: 710001
电话: +86 29 7427076, 7427026
传真: +86 29 7427078
电子邮件: gaoxian@public.xa.sn.cn
网站: www.westwomen.org

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

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成立于1997年，是由西北农林大学的一群女农业技术专家发起的。目前该中心有128名志愿工作者，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农业科技专家。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的宗旨是通过推广基于性别的参与式技术的应用来促进妇女发展。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希望借助参与式学习的过程，来传递农业技术和推动妇女平等。该中心自从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培训工作。过去10年中，先后举办了38次培训，包括为农技推广部门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性别敏感的参与式技术培训等。该中心还为62个村子开展了农村妇女领导才能培训，在87个村子开展了参与式农民协会培训。

该中心开发的培训教材主要有：

- 性别敏感的参与式技术推广培训教材，2002年，西北农林大学学报
- 参与式农民协会培训教材，2010年，西北农林大学学报
- 参与式性别与妇女领导才能培训教材，2010年，西北农林大学学报
- 参与式技术推广的理论和实践，2009年，西北农林大学学报

联系方式：

赵惠燕教授，西北林业大学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电话: +86 29 87092085

网站: <http://en.nwsuaf.edu.cn/>

兰州农村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农村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成立于2004年。目标是将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有机结合起来。该中心已经参与了多项发展项目，得到了中国国家环保局、中国国家哲学和社科基金，以及欧盟、C A R E 等国际机构的支持。农村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参与实施的项目包括兰州西固区公众参与的环境影响评估、社区参与的自然资源管理、参与式的自然保护区社会影响评估、社区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甘肃自然保护区的参与式管理以及社区参与式保护的评估等。

培训及培训教材：

过去几年间，该中心开展的培训有：

- 大学生参与式社会调查
- PRA概念和方法
- 参与式生物保护

开发的培训教材包括：

- 社区参与式林业资源管理案例研究
- 林区社区参与式规划
- 中国农村农业自然资源评估
- 中国农村生态系统评估
- 农村环境科学
- 参与式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扶贫中的应用

联系方式：

卫惠兰教授，兰州大学农村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主任

电子邮件： huilanw@vip.163.com

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作为一个会员制非盈利组织于1995年成立于中国昆明。它包括来自于20多个不同组织的100多名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发展工作实践者和资源管理者。关注的重点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生计发展，以及社区和流域水平上的自然资源治理的传统知识和创新。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目标是与云南山地民族共同工作，探索可替代的发展途径，通过应用云南山地民族的传统知识、宇宙观和创新知识去增强他们的生计和保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也希望促进当地的不同部门、不同文化间各级乡村社区、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对话。为达到这一目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致力于推行多学科研究、提倡参与性发展、促进流域治理和生计发展的能力建设。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宗旨：该研究会特别关注中国各民族的生计发展以及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设想在未来的中国：人们生活在一个生物多样和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通过建立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社区村民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和谐的伙伴合作，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生计发展和自然资源得到尊重、改善和可持续治理。

服务于上述宗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使命如下：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在未来中国，在不同的乡土文化、科学文化、语言和知识体系的民族之间，通过多学科研究、能力建设和促进不同文化间对话的参与式方法，使各民族群体能够增强其文化传统，找到改善其生计和提高生物多样性的新途径。

一本由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开发的关于参与式的培训材料：

从2003年到2006年间，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在云南的林业和畜牧业部门大力倡导参与式方法在技术推广中的应用。参与式技术发展最早源于上世纪80年代“农民第一”的概念，后发展为以农民为中心的研究或参与式研究，逐步为大众所接受。

《参与式技术发展田野手册：联系地方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为可持续生计服务》，本书作者是三个来自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专家：Maruja Salas, 徐建初和Timmi Tillmann。

该教材旨在为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社区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能力建设提供参与式技术的培训。该书是基于参与式技术在云南西双版纳州热带丛林中的8个少数民族社区应用的经验上完成的。这些社区的生计正在经历着来自外部推动的巨大改变。参与式方法倡导加强地方传统知识的应用、建议保护和应用那些适应当地社区社会文化和生物物理的地方智慧。这本教材列出了参与式技术的六个主要步骤，并进一步强调了地方传统知识的应用在中国西南地区改善农民生计水平所能发挥的潜力。它还提供了一些比较实用的参与式工具，通过倡导传统知识来实现在西南和更大区域内的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本书不仅列出了参与式技术的每一个步骤，还指出了如何建立相关发展制度，去促进基于当地农户和少数民族自己的知识和决策之上的生计提高。

联系方式: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云南昆明严家地中环大厦3楼

650034

电话: +86 871 4123284, 86-871-4123519 传真: +86 871 4124871

网站: www.cbik.ac.cn/Get/English/index.html

参考文献:

Chambers, R., A. Pacey and L.A. Thrupp (eds.) (1989) *Farmer first:*

Farmer Innovation and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London

Hoffmann, V., K. Probst, A. Christinck (2007) *Farmers and researchers:*

How can collaborative advantages be created i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4:355-368

Jiggins, J. and H. de Zeeuw (1992), '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Farming for the*

fu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ow-external input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Macmillan: London, UK.

Van de Fliert, E. and A.R. Braun (2002) *Conceptualizing integrative,*

farmer participatory research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rom

opportunities to impact.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9(1):

25-38.

云南参与式研究协会

过去十年间，随着大众对社会经济发展项目必须考虑当地群众的需求和愿望这一认知的不断提高，采用参与式方法来推动中国政策改变的努力越来越多。P R A作为一种强调地方群众的需求，赋权老百姓使其能够有效参与到发展和规划进程中的一种手段，日益受到重视。

P R A的概念最早进入中国，是由Robert Chambers先生在云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次培训上提出来的。在1994年10月，云南参与式网络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在2010年3月，协会改名为云南参与式发展协会，被政府正式批准，标志着参与式方法在中国的实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云南参与式发展协会开发的培训资料：

● P R A培训手册（中文）

这本手册由云南参与式网络的多个成员完成。这本手册介绍了如何通过参与式方法赋权社区和个人。作者主要是云南几所大学的教师和研究者，过去10年，他们在云南有丰富的P R A实践经验。

这本手册填补了中文文献中PRA培训教材的空白。对设计和开展PRA培训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导。基于作者们在中国西南农村应用PRA工具的经验，这本书为培训者们提供了一个如何使用教材去创造生动、有效的学习过程的大纲。它也提供了几个具体案例，来说明在实践中对PLA的认知、设计和实施过程。作者列出了具体的方法，实例和经验及挑战。这本书中列出的方法和工具都在云南举办的多次培训中检验过，包括社会性别和主流化培训、项目培训、农民协会培训等。

虽然这本教材最初是为PRA培训设计的参考书，但也可用于作为P R A工作的指导书。



● 整村推进、扶贫和发展规划（中文）

整村推进项目是中国政府在2001年提出的一项重要扶贫项目。该项目旨在改善乡村面貌，缩小城乡差距和建设和谐社会。

本书由两位P R A专家，云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宋浩昆和王万英女士编著。他们认识到，

将参与式方法融入整村推进项目，可以加强社区的参与，使社区更好地从这个重大的事件中获益。

本书的方法论部分列出了一系列让村民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的方法，具体给出了与整个规划过程相关的行动、参与人、产出、和行动建议。本书从开始的项目策划、村民大会，到贫困户会议、村民代表大会，一直到可行性研究、初步规划、规划调整到修正、检查和报批等的整个规划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给出了具体的方法。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村民如何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整个的规划过程。本书也对规划中讨论的主题、参与的原则、方法和工具做了分析。

本书中描述的规划过程已经在云南农村的几个案例中经过实践。发展工作者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利用这个框架去设计和实施适合他们项目特点的参与式行动，还能够据此建立起培训员工、监督和记录相关工具和策略实施的管理体系。

通过将参与式方法融入具体的乡村规划，这本手册填补了中文培训教材的一个空白。它为地方社区的参与式规划提供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的指南和规划的框架。

联系方法：

云南参与式研究协会
云南民族大学至真堂701室
电话/传真: +86 871 5031503
Email: ynpra@163.com
网站: www.ynpra.org.cn

贵州社区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社区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该中心的主要宗旨是探索参与式理论、方法和工具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通过与地方自然保护区的合作，该中心过去承担了多项与社区为主体的保护与发展项目，同时还与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如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贵州环保局等密切合作，在贵州推动PRA方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应用。

培训方法：

贵州社区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采用参与式的方法，开发了以社区为主体的可持续资源管理、环境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发展，特别是自然保护区内或周边社区的发展等一系列项目。为了培训和提高环境保护部门工作人员的能力，该中心开发了一整套简单、实用的分析和培训工具。培训的主题包括：PRA工具、项目管理、参与式监测与评估、性别培训和领导才能培训等。

贵州社区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培训教材：

- 农村发展和管理手册（2003年）
- 广西扶贫10年规划中的PRA培训教材和课程（2002年）
- 项目管理手册（2006年）
- 贵州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管理手册（2008）

目前，贵州林业部门和自然保护区已经逐渐产生对参与式环境保护感兴趣，并开始开展一些相关培训。

联系方式：

贵州师范大学社区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电话：+86 851 677634, 6754106

传真：+86 851 6779634

邮件：gzpra@public.gz.cn

联系



欢迎来到《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的联系信息部分。我们希望在此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参与式资源。也使读者们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为读者提供关于培训、出版物和网络的最新消息。同时我们也需要您的帮助来保持联系：

- **网络。**你和与参与式学习有关的地方、国家或国际网络有联系么？这些网络主要提供什么？培训？简报？还是共享的资源 / 图书馆？经验分享论坛？请告诉我们这些网络的详情和联系方式。
- **培训。**你知道最近有什么关于参与式方法的培训和课程么？你是培训师吗？你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培训材料吗？
- **出版物。**你知道任何关于参与式方法论的出版物和它们的用途吗？你（或你的机构）有出版的书、报告或录像愿意和大家分享吗？
- **电子信息。**你知道任何关于参与式的网上会议或在线文件么？
- **其他信息。**你有任何其它有用的信息么？请告诉我们。

请回复至: *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Action*,

IIED, 80-86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1X 8NH, UK.

电子邮件: pla.notes@iied.org